知識分子與中國

訪問錄

李怡

七十年代雜誌社



史華茲・竹內實・徐鑄成・徐復觀・勞思光・楊逵・劉賓雁・余英時・（昨日之路）段世堯・林孝信・郭松棻・程明怡・王春生・崔少明・陳治利

訪問錄

知識分子與中國

李怡

七十年代雜誌社

給 [illegible] 藏之 李怡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 香港

知識分子與中國（訪問錄）

編著：李　怡
出版：七十年代雜誌社
香港灣仔洛克道150-158號祥友大廈2C
電話：5-8932369
承印：嶺南印刷公司
德輔道西西安里13號地下
版次：1983年11月初版

定價：HK$16.00　　**編號**：008

目錄

昨日之路——七位留美左翼知識分子的人生歷程 165

前記

本書收集了十五篇訪問記，是我近年來訪問一些知識分子的紀錄，因為談的多是與中國有關的問題，所以書名就叫做《知識分子與中國》。十五篇訪問記中，有八篇是對話的形式，被訪問者多是比我長一輩的人。另七篇是根據訪時的印象及談話內容而寫成，夾着一些個人的描述與議論，被訪者都是與我同輩的人，而且近十多年來有着頗為相似的心路歷程。

訪問這十五位知識分子的時間，是從一九七九年下半年到一九八二年，而大部分的訪問又是在八一、八二這兩年進行的。

為什麽這幾年我會做起這一類的訪問呢？

正如我在另一本書的「自序」中曾提到過，儘管我對中國的難以割捨的關切從童年時候開始，但直至一九七六年四人幫被捕以後，我才在自己編的雜誌上執筆寫起中國問題的專欄。主要的原因是出於業務的需要——一時難找其他的寫手。經過兩三年，我的專欄寫作固然使我增加了對急劇變化的中國局勢的了解，同時也從衆多資料的閱覽中，從逐漸顯現的中國三十年、特別是文革十年的眞面目中，產生了對我長時期以來的信仰與信念的衝擊。我在反省，也在探索，不僅為了要找個人的思想出路，同時也為了要對讀者負責：我是雜誌的編輯，要把眞實的情形告訴我們的讀者，要忠於自己的認

識與職守。

了解事實，是一個層次，更重要的是通過現象去認識深一層的意義，也就是要從廣度和深度來掌握對中國問題的基本認識。在這方面，我自覺不能光靠個人去研讀、去了解、去深思，我書讀得少，人生閱歷不足，因此還得求教於有深厚學問及有豐富人生閱歷的人士。一九七九年我訪問美國資深學者史華茲教授，一九八〇年訪問了日本資深學者竹內實教授。八〇年底開始，我又在兩年內訪問了六位中國知識分子。

一九八二年五月，我乘着赴美之便，訪問了七位與我同輩的左翼知識分子。他們這些年來也在探索，也在反省，也在思考。他們的經歷，他們的心路歷程，及他們今天對事物的看法，無疑使我深受啓發。

當我把這十五篇訪問記彙編出版時，我重讀一遍，不能不感到，它是我過去所出的書當中，最有價值也最有意義的一本。十五位知識分子，對中國都是如此關切和了解，態度又那麽坦誠，其中大部分都有獨到的、不凡的見地，儘管他們之間的見解並非一致，而我們也不一定要同意每一位的見解，但他們以自己的學識和閱歷凝聚而成的智慧的語言，不少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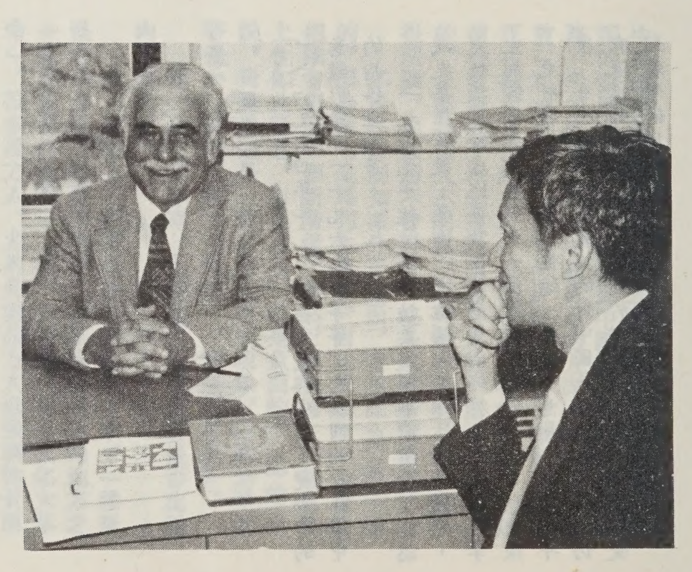
作為訪問者，我在十五篇訪問記中，主要是提問題及引導談話，只是偶爾講幾句自己的看法。我的意見，在這本書中最不值得重視。我對這本書的貢獻，只是把被訪者對中國問題的眞知灼見、以及他們的身體力行，帶引出來。有價值的東西是屬於他們的。

在寫這篇序的時候，我不覺油然想起每一個訪問的當時情形，這種誠懇的、在思想認識上的交流，是一次又一次難忘的經驗。

我要趁本書出版的機會，再次感謝所有接受我訪問的人士，感謝為本書的一些訪問整理記錄稿的同事和朋友。

史華茲
談中國的民主化

日期：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地點：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
記錄：周鄉橋



前言

史華兹（Benjamin Schwartz），一九一六年生，是畢生在哈佛大學從事中國學研究的資深學者。在哈佛取得學士、碩士、博士等學位後，一九五〇年起在哈佛任教至今。訪談時史氏任歷史與政治系威廉士講座教授。

史華兹教授長期以來，在哈佛的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主管中國研究工作，號稱「費正清的直系的學者」。在美國的中國學權威中，不少人是他的學生，以至學生的學生。作爲漢學家和人文科學的自由主義學者，史華兹教授在美國享有崇高的權威地位。他的重要著作，如《中國共產主義與毛澤東的興起》（一九五一年）、《尋找富强：嚴復與西方》（一九六四年）、《共產主義與中國：變動中的意識形態》（一九六六）等等，是美國的中國學中的指導性論著。

一九七九年秋，我初訪美國，事前即盼望能認識史華兹教授，並作一次訪問。但在訪問過程中，史教授却謙虛地垂詢我的意見，終於由史教授的學生周鄉橋先生整理出一份對談的稿件。文章刋出後，史教授後來又提出他的一些補充意見。事隔幾年後，今天讀來，史教授的對中國民主化的見解，仍有深遠的意義，而我的過於樂觀的看法，似乎已受到現實的嚴酷的考驗。

李：史教授覺得，中國建國至今三十年，她的基本的發展方向應該是肯定的或否定的？

史：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不能簡單以「肯定的」或「否定的」來作答。中國經過了百年來的動亂，現在達到了穩定的局面，這是積極的方面。面對着種種的客觀問題，中國仍然能夠發展她的經濟，並達到了某種程度上的平均分配。雖然在「大躍進」之後，還有現在，很多人對經濟情況很不滿，但我們要考慮到中國有那麼多人口。所以我覺得中國能夠達到某種程度的平均分配，雖然不一定是權利上的平等，但這仍是應該肯定的。

我會害怕中國會盲目地追隨蘇聯。

我不是一個馬列主義者。我不認為受馬列主義教條的支配一定是件好事。自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六年這一段時間，我和很多西方人一樣，非常害怕中國會盲目地追隨蘇聯。雖然產生了不少成果，或許其中部分成果的產生是由於中國民族主義的因素。但直到一九五五年，大多數外國的觀察家，似乎都覺得中國越來越想學蘇聯。五五年之後，雖然有不少負面的發展，但至少你感覺到中國正在尋找自己的道路，毛主席亦在尋找中國自己的方向。無論對「鳴放」和「大躍進」作如何評價，但至少你覺得中國正在探索自己的將來。現在也有同樣的感覺，這是值得鼓舞的。我想這是應該肯定的，而不是否定的。可能有些人不同意一些具體的發展，但事實已很明顯，中國將不會再盲目地去追隨任何模式。

不過在壓制知識分子方面，我不認為是正面的。因為我不是馬列主義者，因此我相信一個政治組織會變成一個新階級，當然，毛主席在某種意義上也如此說過。以上這些，都是負面的。總的來說，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現象，不能簡單地答是「全好的」或「全壞的」，而是兩者俱有。

李：這三十年來，中國對世界的影響是否比對內還要大呢？

史：事實上，西方也在不斷改變之中。一種奇怪的現象是，對西方來說，中國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是毛晚期的思想——從「大躍進」至「文化大革命」。很多西方人，尤其是對西方太過强調物質消

費而感到迷惘的年青人，他們相信毛主席的確找到了一條服務社會的無私的道德的新道路，例如强調赤脚醫生、土法上馬，不全靠科技，他們對毛晚期的思想感到嚮往。所以現在對一些間接攻擊毛晚期思想的文字，他們覺得很迷惑。西方有一種天真的想法，以為中國已經體現了毛的烏托邦。而現在中國在西方的影響，可能大不如前了。我想中國的外在形象和內在形象並不一樣。

當然，那些一向反對任何形式的共產主義或者極權主義的人，他們對中國始終都是否定的。我剛才說的是一些對中國抱有好感的人，他們以為毛在現代化方面已找到了一條新而又無私的道路，但現在却又感到迷惘了。

李：我自己半年前到中國去了一趟，發現了一個很大的問題。在四人幫倒台之後，中國批評了過去的很多做法，尤其是批評了一些理論上的問題，提出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似乎理論問題在討論過程中被輕視了。過去的理論，甚至有被全面否定的傾向。在這種情形之下，我最大的担憂，是中國比以前少了一種精神支柱。當然，從物質方面來看，中國是相當落後的，平均每年每人生產值是四百多美元，美國是八千多美元。如果在物質上得不到滿足，在精神上又沒有出路，對人民來說，就沒有什麼推動力了。不知道史教授認為是否可以純從精神上找出路，或者覺得只需發展經濟便可解决問題，又或者覺得中國在發展經濟時，也需要有一種精神力量來支持？

史：我也有同樣的担憂。不單是對中國，對西方也是如此。令我担憂的一件事，是關於中國現在所談的「現代化」問題。如果說中國以前聽蘇聯專家的話聽得太多，那麼，現在的中國很有可能聽美國專家談「現代化」聽得太多。現代化是什麼？我覺得，中國需要對「現代化」這一詞下不同的定義。我不是一個經濟學家，可能經濟學家會不同意我的看法。如果現代化是用消費的水平來衡量，那麼是否希望把中國變成第二個美國呢？是否「現代化」是指中國的每一個農民都有自己的汽車？這不僅很難辦到，而且也不一定是一件好事。所以在中國，「現代化」可能需要重新下一個定義，意指滿足一些基本的需要，如基本的保健，而不是像美國

或法國式的消費社會那樣。如果要學美國學法國，至少在未來的三、四十年內，從目前的中國情況看，是很難達到的。所以，我們是否先要把「現代化」的意思搞清楚呢？

是否非要有一種大家同意的精神教條不可？

從生命的精神意義來說，「現代化」是否指所有人都要接受一個無所不包的教條呢？中國有一段很長的「政教統一」的傳統。當然，馬列主義也是另一種「政教統一」，因為它宣稱可以解答人的一切問題。我覺得在政治方向上，應該有某種共同的協議，但在精神領域方面，應可以有不同的態度，即使在古代中國，雖然是「政教統一」，但仍然有很多不同的思想派別，例如佛家、道家、儒家，即在儒家之中，也有不同的支派，例如在宋代，有朱熹、葉適、陸象山，他們很不相同。是否非要有一種大家都同意的精神教條不可呢？可能在如何發展經濟方面，我們需要有一種共同的協議，但是否需要一種統一而又絕對的教條呢？歸納起來，是以下的兩個問題：

第一，「現代化」是否一定要複製西方模式？在目前中國的客觀限制上，看來不大可能。

第二，需要有一種精神的方向，但是否一定要把「政」和「教」合而為一呢？

李：我認為，似乎從來比較有遠見的、進步的力量都是來自民間，而不是來自當權者的。或者在歷史上，美國亦是如此。掌權的人，往往對自己所做的看得不清楚，而真正看得清楚的，是在民間。然而過去幾十年來，不只是中國，甚至其他共產國家，當權的人都認為比老百姓更正確，看得更遠，好像進步的力量是在當權者這一邊。我覺得這不是一件好事。不知道你怎樣看這個問題？美國是否這樣？蘇聯是否也一樣呢？假如中國要進步，是不是也應該相信民間的力量，或者尊重它？而不是那些掌權施政的人，覺得自己是偉大的人物，比所有人都英明？

史：自古至今，那些掌權的人，都希望繼續擁有權力，這是普遍的現象。

毛的一些思想仍然很有用，我是指毛晚期的一

些觀點，毛晚期認為：共產黨可以變成一個新階級，而毛的應付辦法是實行精神改造、思想改造。其實在某種程度上還可以用毛的思想來支持一些政治民主化的活動。如果統治集團變得僵化，只會維護自己的特權，那麼不應只靠精神改造或靈魂改造，也要靠外在的約束，法治的制衡。事實上，中國目前正在討論的也就是這些，我在《七十年代》也看過很多討論這方面的文章。我覺得毛晚期的一些論點確實可用來支持發展政治民主的力量。

傳統文化的正面價值不應太低估。

對於傳統文化，也不應太低估。現在有一種把所有的傳統文化，看成全部是封建的東西的傾向。事實上我們在傳統文化中也可找到很多正面的東西，例如傳統中國裏有賢臣批評天子的事情，可能在不得要領時，皇帝可以把臣子的頭砍掉。但古代中國確實有這種冒死進諫的「士的勇氣」。雖然他們沒有什麼法律保障，但這種傳統是好的一面，我們不能說所有中國的過去都是一團糟。大儒如王陽明、朱熹都主張臣有諫上的職責。

另一方面，在傳統中國裏，有一點與共產主義不同的思想，那就是「道」和「理」是凌駕於皇帝之上的。馬、列、斯（大林）主義的一個問題是把真理和領導者絕對地連起來，在傳統中國却非如此。現在的馬、列、斯主義之中，領袖決定一切，領袖定什麼才是「真理」，在他們之上，便沒有什麼「真理」可言。我們不能說錯綜複雜的傳統文化都是壞的，雖然此中有很强的官僚主義成份。如果把傳統文化說成是一無是處，那實在令人感到非常悲觀。總可以在傳統文化中，挑選出一些正面的東西來吧。

李：傳統文化中，自然可以挑出正面的東西。但是，若從對整個現代中國社會的影響來說，我認為傳統思想的負面作用比較大。更準確地說，我認為傳統思想中的一些頑固社會影響，是中國現代化的巨大阻力之一。在整個中國社會裏，有多少是受傳統思想影響的？有多少是受共產主義思想影響的？有多少又是受西方自由主義思想影響的？它們的比例又是如何？這些問題似乎是很值得研究的。

史：我在哈佛講授一門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的課，是討論知識分子的。不過知識分子在社會中畢竟還是少數。我以為在五四運動時期，西方的一些自由主義思想，尤其是言論自由，思想自由，確實在中國產生深遠的影響。回顧一下，即使那些後來變成共產主義者的知識分子，例如一九四九年之後的費孝通和胡風，他們雖然認同社會主義，反對西方資本主義，但我認為一些西方的思想，仍然對他們產生不少影響，譬如說「人權」的概念。在一九五六至五七年「鳴放」這一段時間，這批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知識分子，因為有一次暢所欲言的機會，他們也藉機表白了出來。最使我感到驚奇的是，這些思想不知如何已從老一輩傳到了年青的一輩。這是怎樣發生的呢？這些思想怎會從五四傳遞到新一代的身上呢？但事實上確實如此，因為現在中國的年青一代正在大談「人權」、「法制」。我不曉得這些思想是否深植於廣大羣衆的腦海中，因為畢竟我們現在談的還只是少數的城市知識分子而已，但在這個圈子中，一些思想還是傳遞到下一代去的。我當然不是指他們接受西方的自由經濟思想，或者說他們會接納資本主義，我的意思是說：他們受了「人權」等概念的影響。或者應說是「民權」，因為「人權」好像指的是「個人的權利」。而這類思想概念，確實從西方而來。

李：不知道你怎樣看待今天中國的民主運動？或者是人權主義分子？美國的自由主義者，是否基本上不大支持中國的民主運動呢？他們似乎採取了不同的標準去對待中國的民主運動，和對待蘇聯及其他共產國家的自由主義分子。這是否受了美國政府的政策影響？

史：我對於中國現在發生的事情感到很興奮。我首先想說一句：我不認為自由主義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因為問題實在太多。

中國比蘇聯走得更遠。

我覺得現在中國發生的事情，在某種程度上，比蘇聯走得更遠得多。現在中國大陸公開提出來的問題，即使在今日蘇聯，也只能在地下刊物中出現。但我們往往有一種憂慮，就是懷疑這些運動究竟有多少力量？而這些人是不

是太過暴露自己？因為我覺得，「現代化」和「自由化」不一定是一回事。中國的領導完全有可能決定推行四個現代化，但同時對於所謂「自由化」並不十分熱心。我不想太誇張現在中國的「自由化」運動，原因之一是我担心這種運動很快的會被鎮壓下去。換言之，這些運動並沒有很强的力量基礎。當然在蘇聯，情況不一樣，那是有一些個別的知識分子，跑到西方來，變成熱門新聞。我並不知道美國政府方面有什麼政策，影響人們不支持這種運動。我倒想問問你，你覺得美國政府有這種政策嗎？

李：我想在美國這種制度下，美國政府不會反對美國的自由主義者做任何事情。我直覺上感到，由於中美關係良好，似乎美國的新聞報道和自由主義者並不像對待蘇聯的異己分子一樣，來支持中國的民主運動。

史：在蘇聯方面，有很多異己分子我們已經是耳熟能詳的了，例如蘇辛尼津、梅德維特夫（Roy Medvedev），而且也看過他們的文章……。

李：舉個例子來說，像魏京生、傅月華事件，美國的新聞報道，除了懷疑這事件與當權者中的某集團有什麼關連，並用權力鬥爭的框框來報道分析之外，我好像沒有看到他們有强烈表示過什麼關心和支持。或者我在這方面看得不多，知道得不多。

史：我想美國政府要和中國拉關係並不是為了她的自由化運動，而是為了抗衡蘇聯。即使中國的自由化運動中斷了，只要中國願意和美國合作，兩國的合作還會繼續下去。這是政府方面。

在這裏，我要分別美國政府的政策和大衆輿論，兩者並不一樣。可能你說的是對的，我想我們是應該對這些事情廣為報道，很遺憾還沒有做到。我們很多人感到担憂，担心這些抗議的中國人會危及自身，恐怕這個運動會突然逆轉，那麼有美國人大力支持會更累事，因為給人的印象是那些資產階級的美國人在干涉中國的內政。中國目前發生的事情實在令我個人感到興奮，我覺得有些方面在中國比在蘇聯走得更遠。不過我們總是担心，一覺醒來，情隨事遷，讀報時發覺整個運動給壓下去了。因為中國在推行四個現代化的同時，是還可以鎮壓「自由化」的。不過我同意你的批評，我們應該對

這些人提出的言論大事宣傳一下。

李：你能否對「現代化」和「民主化」下一個定義呢？尤其是在中國這種情況下？

史：我們西方受韋伯（**Max Weber**）的思想——而不是馬克思——影響很大。他提出了「合理化」（**rationalization**）的概念，例如在工業和官僚的合理化上，就是提高它們的效率；又例如軍隊的現代化，當然與自由化沒有必然的關係。現代化對中國來說是件好事，我希望在現代化的當兒，不要忽略了農業方面。

關於是否給予專家、知識分子多一些自由，就可以促進現代化，這個問題是很值得商榷的。在蘇聯，我們可以看到政府給予專家、工程師一些特權，但同時對一些文化、一些搞理論的知識分子進行攻擊。他們將「專業的知識分子」（**functional intellectual**）——即是專家、技師——和「文化的知識分子」區分起來，給前者以特權而壓制後者。像薩哈羅夫（**Ardrei Sakharov**），他認為蘇聯的經濟發展受阻，是因為沒有自由的緣故，故此在他看來，現代化和自由化有一定的關連。假如一個政權覺得自由化太過危險，它可以一方面實施現代化，另方面同時抑制自由化。

在民主化方面，中國會否比蘇聯更有前途？

李：你覺得在合理化、民主化、自由化這幾方面，中國、蘇聯、東歐國家，或其他以共產黨作為領導的國家當中，在未來的發展，哪一個國家最有希望？最有前途？有些人覺得中國現在進行的改革，即使改革得最好，充其量也不過是發展到像蘇聯或東歐那些國家一樣。不知你認為中國會不會比他們更有前途呢？

史：當我看到中國目前的情況時，我是感到特別興奮的，因為她除了現代化之外，還加上某種程度的自由化。當然，這是在中國具體情況下的自由化，我不認為中國有必要或有可能變成第二個美國或瑞典。中國就是中國。假如中國能夠把某種程度

上她所稱的社會主義和某種程度的自由化結合起來，那麼她的發展將與東歐國家不相同。當然，即使今日的蘇聯與斯大林時期也已不一樣了，但她仍舊是那樣極權。我想假如中國走自己的路，她會提供一種完全與別不同的形象。東歐有些國家，例如匈牙利，也在悄悄地進行自由化。如果中國能融冶現代化和自由化於一爐，那麼它會有與別不同的發展。但假如中國只是現代化，那麼結果可能會和東歐國家差不多。

毛主席的另一項正面的意見是，他認為中國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既然都是農民，就得特別重視農業問題。西方有一些現代化的理論，認為現代化就是農村人口的逐步減少。在美國，農民人口佔多少呢？很少吧。

李：百分之六左右。

史：假如這就是所謂的現代化，那麼我不知中國在最近將來，如何可以使人口都移到都市去。如果中國能夠一方面實現現代化，另方面大部分人口仍居住在農村裏，那麼，「現代化」這一詞實在需要重新下定義了。

如果中國能夠達到某種程度的自由化，我覺得中國可以提供一個全新的現代化模式。

李：中國的民主運動是不是真的比蘇聯走得更遠呢？我對蘇聯的自由化運動認識不多，我的粗略印象是：蘇聯的自由化運動的主流，是要向西方資本主義那種自由主義看齊，而中國的民主運動，我看過了他們很多刊物和大字報，我覺得他們對現在中國政治制度的批評，還是在不否定中國要走社會主義道路這個前提下提出來的。例如他們並沒有說不要無產階級專政，而是他們覺得不應由無產階級中的少數特權階層來專政，應由大多數人來專政。他們要求真正的民選，反對自上而下的「等級授職制」。他們並沒有否定馬克思主義或社會主義的前提，所以我不認為他們對自由化的要求要比蘇聯走得更遠，或者更接近西方。我覺得他們還是站在社會主義那一邊。他們提出的主張，與蘇聯的異己分子提出來的很不一樣。是否你認為因為他們是站在社會主義前提下提出問題，所以是進步的呢？或者你認為他們提出的方式更加公開化，所以比蘇聯進步？另外，如果要堅持目前的政治和經濟制度，

是否仍可以實現合理化、民主化和自由化這些目標？

史：在蘇聯的異己分子中，從蘇辛尼津到薩哈羅夫，也有很多不同的觀點。例如蘇辛尼津就是主張回歸到俄國的傳統精神中去。並不是所有人都提倡西方資本主義。

毛主席常說：蘇聯現在已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了，是否你也同意呢？

李：我記得他曾說過的是：「現在的蘇聯是資產階級專政，是大資產階級專政，德國法西斯式的專政，希特勒式的專政。」

我想他所指的是國家資本主義，而不是指像西方的資本主義。

史：老實說，我實在很難分辨出「國家資本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這兩者的分別。是否純由領導人的主觀態度而定呢？西方有不少人替社會主義一詞下了很多不同的定義，例如其中有些人說社會主義就是有一個分散的社會，每間工廠自行管理。「社會主義」一詞，已不再有明確意義了。另一方面，我也不大清楚「無產階級專政」指的是什麼。如果說社會主義是指國家擁有生產工具，我相信大部分中國人都會贊成，但如果你問蘇聯人，他們也會宣稱他們的國家也是擁有生產工具的，如此一來，這樣的討論便會變成含糊不清、模稜兩可了。

在《七十年代》和中國大陸的刊物上，我看到一些很基本的問題被提了出來。這類問題，我不認為在蘇聯的刊物上曾經有人提出過，即使在赫魯曉夫當政時期，也沒有公開地被提及過。當然我不是說在蘇聯的地下刊物也沒有出現過。我是覺得目前在中國有一種很自由的討論氣氛，至於明天將會怎樣，我就不得而知了。

最近有不少中國的學術交流團訪問哈佛，我有機會和一個研究中國哲學史的學者交談，我問他：把中國思想史，硬性地劃分成唯心主義或唯物主義實在是太機械化了。那位學者回答說：我們也在討論這個問題。我聽了大感驚奇。因為這是中國一個重要的教條，當你在談及傳統中國某思想家時，習慣上要先分清他究竟是唯物主義者，或是唯心主義者。現在已有些不同了，這便是我所說的中國大陸

立場出發。如果中國要走美蘇軍事現代化的道路的話，它會發覺目前很多問題無法解決，其中最大的就是人民生活的問題。現在中國與其他國家的差距很大，人民生活若無法改善，那麼這個社會就會很動盪，不能穩定下來。社會要安定，不能單靠口號，一定要使人民覺得生活是穩定的、發展的。如果把太多的金錢力量放在軍事上，要使中國趕上美蘇那樣，我想在很長的一段時期中，老百姓的生活就很難有改善的希望。中國應該在美、蘇、日本等國的關係上，尋找一個平衡的力量，使她的安全得到保障。

史：你說你覺得美國方面對於中國的自由化，或如你說的「民主化」並不太感到興趣，事實上，我以前的學生，現任職於《紐約時報》的伯特菲爾德（Fox Butterfield）也寫過不少這方面的報道。不過我們確實並不十分了解其中個別的人物。如果能不單是從《七十年代》，甚至從中國大陸的官方刊物上，翻譯一些討論，或者說服一些報刊，刊登現在中國提出的一些問題，會是很好的。我會再查一查在蘇聯赫魯曉夫自由化的時候，《真理報》是怎麼的一個樣子。不過依我記憶所及，即使在赫魯曉夫時期，《真理報》也從未提出像現在中國所提出的問題。如果如你所說，那種運動不單是在知識分子中，而且已經在人民羣衆中傳播開去，那實在是很感人的。這可能是由於中國文化傳統和俄國不一樣，或許在中國傳統之中，比俄國傳統更能給予人民多一點自主權。

我最近碰到一個人，他認為中國自由化有一個危機，是西方思想中一些被認為是墮落頽廢的東西，例如有關性、跳舞等，假如傳入中國的城市，很多中國人會大感憤怒。而領導層之中，有人也可以利用這些西方腐敗的傾向來攻擊任何形式的自由化。聽說中國已有一些舞場，可能有些人，不單是從共產主義者的角度，甚至從傳統中國道德的觀點來看，會感到憤怒。不知你有沒有所聞？

來自傳統道德觀念的對自由化的攻擊。

李：因為在中國發生這些事情是很新奇的，所以報道很多。也許有人利用這些來打擊民主化的運動，但作用不會太大。因為實際上並沒有很多這樣的活動。西方記者報道最多的時候，不久在香港電視上也可看到這些跳舞鏡頭。我想西方記者大感興趣，故報道得特別多。我到北京時也看過，很少人在跳舞，很少人穿很漂亮的衣服。當然男女之間的距離已拉近了。《北京日報》曾提出批評，說學習西方不應該學習這些，然後《中國青年》雜誌寫了一篇文章，說一個人的思想意識與他的服裝沒有直接的聯繫。所以我想比較進步的一種力量，即使在大衆傳播媒介中，也在很强烈地防止這種攻擊。事實上誠如你所說，有些攻擊是並非從共產主義道德的角度，而是從封建傳統道德的角度出發的。這也就是我認為傳統思想對現代化的負面作用較大的原因之一。隨着開放政策，會輸入一些西方生活方式，這些方式中的腐朽的一面當然也可能出現，但影響範圍極小。對這些現象進行批評是可以的，但某些攻擊的目標是要否定整個開放政策，這就是現代化的阻力。所幸這些攻擊被制止了。也許過去二十年的「左」傾路線造成的傷害太大，給人們的教訓太深，因此一切來自極左方面的攻擊都會受到抵制，不會影響太大。對於這點，我還是比較樂觀的。

史華茲教授的來信

李怡先生：

重讀跟你的對談，對於我的一些比較混亂的看法得到了你準確的歸納，請允許我向你衷心致意。同時，覺得當天你所提出的若干問題，我沒有作充

份的回答。下面我將對在對談中缺乏足夠說明的某些地方作一點闡述，未知你們是否可以考慮刊登？

敬祝編安！

史華茲（Benjamin I. Schwartz）

勒魯瓦・B・威廉士歷史及政府學教授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 * *

正如一般對談那樣，讀過我跟《七十年代》月刊編輯的討論記錄後，發覺現在我對李先生的觀點較當時更為了解。我發現他堅持用「民主」這個詞而我則一再採取「自由」這個詞；他堅持一切好的事物會來自民間，我卻一再談知識分子角色。是否說我對民主不感興趣呢？我是否只關心知識分子而不關心人民的境況呢？

對後一點，我希望對自己的不平衡的說法作點補充。既然我相信人權和民權都是好事，我當然也相信它們無論對全體人民或對知識分子都是好的。例如，只要人權和民權包含了並非任意決定的法律程序，以及在涉及法律的問題上保障個人權利，它們則肯定和全體人民有關。而且，我採用的「知識分子」這個名詞，並非指「階級地位」。在我來說，任何人只要能夠清晰地表達他的思想便是個知識分子，當然包括李一哲在內了。我强調知識分子，基本上因為我深信不管他們的社會出身怎樣，在任何現代社會裏，如果知識分子無法發表言論，去反對一個由少數特權階層組成的政治領導的看法，那麽就沒有民主可言。

為何我要堅持「自由」這名詞呢？因為我基本上相信沒有若干程度的自由，就沒有民主。我也很明白，中文「自由」兩個字有若干自私或個人主義的貶義。但我相信，在二十世紀，用民主和人民的字眼，可以與任何程度的眞正民主無關（當然，我

得承認純粹雅典式的民主可能在什麽地方都找不到）。主要在於「人民」這個詞的意思是什麽。可以把「人民」當做一種抽象、統一的存在，任何人都可讚「它」是正確的、永遠先進和智慧的；也可以把人民看作一切有血有肉的個人和具體組成人民的團體的總集合體。從後者來說，人民會有利益及意見上的矛盾；從一處地方來的「人民」，不必一定認同其他地方人民的利益。我們知道具體的人民可能聰明也可能愚蠢，可能先進也可能反動，可能正確也可能錯誤。從這個角度來說，毛主席認為可能有「人民內部矛盾」的意見，可以拿來支持民主。盧騷是首先提出人民乃統一和絕無錯誤的存在這個觀念的始祖，他也相信具體的人可能會犯錯誤。因此，在他的心目中，人民的「共同意願」的觀念，是超乎組成人民的活生生的人的集合體。他甚至說，當大部分具體的人民支持某「錯誤」觀點時，這種觀點不能說是代表人民的普遍願望。列寧在他的小册子《怎麽辦？》中，談的不是人民，而是工業無產階級。不過，他也堅持作為具體的人的無產階級很有可能給誤導，除非他們得到一羣有較高智慧的「職業革命家」的領導，這些革命家能正確理解作為抽象、統一存在的無產階級的共同意願是什麽。「共同意願」因此與組成人民或階級的現實具體的個人分離，而體現在一小撮領袖身上，他們以某種方式「有機地」代表了全體人民。令人感到興趣的一點是，《七十年代》編輯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定義，他說專政應由大多數人來專政，他們要求眞正的民選，反對自上而下的「等級授職制」。然而列寧與盧騷一樣，拒絕接受他稱為「機械性的大多數」。跟盧騷一樣，他認為被選出來的大多數，也有可能犯錯誤，而他把決定他們錯誤與否的權力握在自己手中。由此看來，少數特權階層體現了無產階級(或人民)的普遍意願這個概念，其實是源於列寧本人。暫時不討論究竟「少數人權利」被剝奪的情況下民主是否仍然存在，我這裏希望提出的問題是，要是大多數人（由具體的一個個人組成的大多

數）沒有犯錯誤的自由，「大多數人的統治」是否仍然存在？應由什麽人來決定人民大多數的對錯呢？由誰來決定某種態度是否符合「無產階級專政」的原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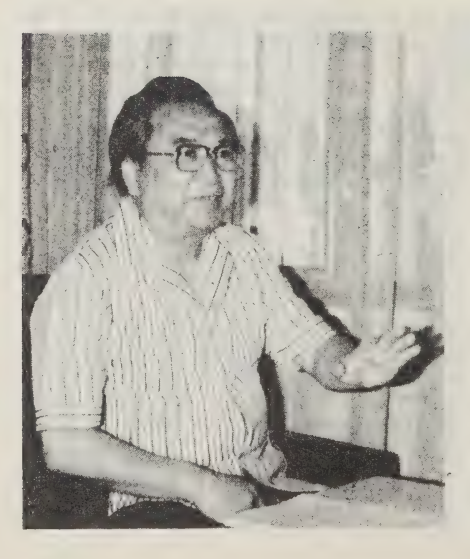
因此，當我表示中國的自由化似乎較蘇聯走得更遠，我同時亦暗示中國民主化也走得較遠。我仍願意重申，某些蘇聯的離心分子也許為他們個人的解放而投向西方，但離心運動的領導人物——像薩哈羅夫、馬特維也夫、辛也夫斯基、蘇辛尼津等，很可能相信他們代表了蘇聯人民的眞正利益，就像中國的李一哲及其他人一樣。

（小唐譯）

竹內實
談中國局勢

時間：一九八〇年七月一日
及七月二日下午

地點：香港華都酒店



前言

自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幫下台以來，我即以「齊辛」的筆名在《七十年代》月刊撰寫中國問題專欄。這些專欄文章陸續被翻譯介紹到日本的報刊上去，還出版了幾本日文書。為此，日本一些關心中國局勢的讀者，知道「齊辛」這名字的比知道我本名的要多。

一九八〇年夏天，日本《週刊朝日》的編輯委員川口信行先生來信，提出在七月初陪同日本資深的中國學教授竹內實來香港，邀約我與竹內教授作一次有關中國局勢的對談。竹內教授的名字我知之甚久，他監修的《毛澤東集》十卷是我珍惜的資料，並為此早就對他的治學精神感到欽佩，能夠有機會同他結識並對談，自然是我所願意的，儘管我自感在識見上恐不足以同竹內教授作對等的討論。

結果，對談在一九八〇年七月一日及二日進行。由川口信行先生引導討論。內容圍繞着當時（一九八〇年夏）的中國局勢。其中有不少話題是有時間性的，但就整個討論、特別是竹內教授的見解來說，今天看來仍不會使人感到過時。

竹內實教授，一九二三年生於中國山東省，後移居東北長春，一九四二年回日本。一九四九年畢業於京都大學文學部，曾任東京都立大學助教、副教授，現任京都大學教授。著作有《毛澤東：詩和人生》、《現代中國的文學》、《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的視角》、《同時代的中國》、《魯迅視角》等；譯作有李劼人著《死水微瀾》，陳若曦著《耿爾在北京》；並監修《毛澤東集》十卷。

川口信行先生，生於一九三二年，一九五八年東京大學文學部畢業，同年入朝日新聞社，先在《朝日雜誌週刊》工作，後轉《週刊朝日》，訪談時是《週刊朝日》的編輯委員。

川口信行：今天請齊辛先生和竹內先生一起座談有關當前中國的一些問題，如像關於重新評價毛澤東的問題，中國現代化的方向和可能性問題，以及二位願意談到的其他有關問題。由我來扮演一個司儀的角色，主要請兩位發表高見。有時我也會提一些通俗的問題，請教二位。

四人幫以後，中國用了十個月時間給鄧小平平反，又用了三年半時間為劉少奇平反，現在剩下重新評價毛澤東的問題，對此，請齊辛先生先談談看法。

中國的局勢是流動性的

齊辛：剛才川口先生說，中國在四人幫被捕後，用了十個月時間為鄧小平平反，然後用了三年半的時間為劉少奇平反，對毛澤東的重新評價和非毛化到現在還沒有展開。給我的印象是川口先生認為，四人幫以後就一直要往這個方向走的，只是花了很多時間才走了第一步，第二步……。

我自己的看法則不是這樣。我覺得四人幫倒了以後，中國還是一個可以變的、不能肯定其趨向的局勢，或者說還是一個流動性的局勢。即使是在鄧小平恢復工作的問題上，當時也還是具有流動性的，它可以向四人幫的路線、或者文革期間毛澤東的路線流過去，也可以向恢復鄧小平工作的方向流過去。整個局勢一直到現在還是流動性的。所以，並不是說四人幫一倒台，華國鋒就確定了要恢復鄧小平的工作，要為劉少奇平反，要重新評價毛澤東。如果是這樣，開始那幾個月就不會那樣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了。

這裏的所謂流動性，它取決於幾種因素。首先中上層，尤其是上層的意見始終不是完全一致的，上層領導的組成也一直在發生變化。大量老幹部恢復工作以後，也使得政治、思想和組織上發生了變化。在這個變化中，一些剛一開始時很明確地提出來的東西，到後來就看出它的不對了，這不僅是指吳德講的「繼續批鄧」，也不僅是指毛選五卷裏還在批評劉少奇，而是指比較大的，如中共十一大提出來的政治路線，五屆人大提出來的經濟指標，等等。十一大怎樣看文化大革命，怎樣看毛澤東繼續革命的思想，五屆人大提出來的經濟發展規劃有多大，所有這些後來都作了很大的修正。因此說，這種流動性既有組織的、思想的，也有在實踐過程中發生

了問題而在不斷修正中的。在這種情況下，就很難說是不是一定會重新評價毛澤東和什麼時候重新評價毛澤東。但到現在，大概會有這樣的事情出現了。

竹內實：按理說，既然開了黨的代表大會，它提出來的路線就應該有一定的持久性，但實際上改變很大，如十一大以後，變化就很大，齊辛先生講的是對的。我回顧了一下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發現有一個規則，即是說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可以說是為大會前的黨內鬥爭作結論的場合，而大會又是新的路線鬥爭的開始。如果認為開了黨代會，以後就可以按大會的方針去做了，那就誤會了。

齊辛：事實上，在中共歷史上，黨代表大會的重要性往往比不上一些中全會。如這一次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比十一大重要得多。當年九大開了以後，第二年的九屆二中全會就比九大重要。

人的頭腦裏的流動性

竹內實：所謂流動性，我看有兩層意思：第一是表現在路線上的流動性，表現在人事方面，如書記處的設立，政治局常委的更替，由此可以看出以後往哪個方向發展、變化。第二種是個人頭腦裏的流動性，這是頭腦裏想的事，外表看不見，但有一些事例可以說明，如華國鋒一向被人認為是文革派，但是他後來逮捕了四人幫，當這種事情發生的時候，可以說華國鋒的頭腦裏有一種流動性。再舉個例子，當初鄧小平復職前，他曾寫信給華國鋒，表示要把工作做好，表示效忠，如果鄧小平以後所做的有什麼不同，這就表示鄧小平頭腦中的想法有了改變。

齊辛：中國在這幾年裏，從批判四人幫開始，否定了過去的許多政策措施，在否定過程中，就產生了許多新的想法，這是造成人的思想流動性的第一個因素。在這段時間裏，中國與外國改善了關係，交流增加了。隨着科技知識的輸入，意識形態的東西也大量輸入，這也引起了許多思想上的變化。如已有不少人在思考過去的價值判斷是不是正確的？資本主義的一些經濟政策、經濟措施是否也可以借鑑？中國過去的政治是不是民主的？資本主義的民主是不是也可以借鑑？至少在形式上能否借鑑？這些隨着對外交往增加而產生的思想上的變化，也是整個社會變化的一部分。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過去中國社會

裏束縛思想最厲害的兩種因素發生了變化。這兩種因素分別是：一，每件事都要看符不符合馬恩列斯毛的言論準則，這就是說，先有一個理論，然後用這個理論來框住實踐，符合的就是對的，不符合的就是不對的，一切以毛澤東的言論作為檢驗真理的標準。第二種因素是長官意志，什麼事情都要看上面怎麼講，而不是看實際上是不是需要這樣做。但自從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北京《光明日報》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並由此引起的一系列討論開始，就從政治上突破了這兩個框框，使整個社會意識產生了很大的變化。「真理標準」的討論，其政治作用，實際上遠遠超過理論上的意義。

川口信行：講到人的頭腦中的流動性，對於一些具體的人的變化，不知齊辛先生有何看法？

「中國青年」事件反映了變化

齊辛：譬如一九七八年九月發生的《中國青年》被扣壓事件，可以說明這種變化。當時華國鋒正在國外訪問，黨內抓宣傳工作的是汪東興和他手下的大員李鑫，他們認為那一期《中國青年》上牽涉天安門事件的文章寫得太過份了，就扣下不准發行。從表面上看，他們是要等華國鋒回國以後再處理，但很明顯，不講別人，至少在汪東興看來，華國鋒回來以後是會同意他的意見的。結果華國鋒回來後並不同意他的意見，而讓這一期《中國青年》發行了。從這件事，我們可以看出，在真理標準討論以後，華國鋒的思想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竹內實：造成流動性的這些因素本身也是流動性的。舉例子講，過去毛澤東還在的時候，中國的情勢取決於最高長官毛澤東的意志。過去林彪講我們為什麼能夠發動文化大革命，這是因為我們有毛主席在。如果沒有毛澤東就沒有文化大革命。現在毛澤東不在了，負責人不同了；過去最大的長官是毛澤東，現在沒有了，也就不會再發生同樣的事了。

齊辛：現在最大的長官是沒有了，事實上也沒有人能像毛澤東當時那樣有那麼大的權威，但有兩點是不能忽視的。第一，對於重新評價毛澤東，對這個長官以前的話怎樣看，這還是個有爭論的問題。第二，儘管沒有了這樣的長官，但許多中下層幹部仍習慣於上面怎麼講我就怎麼做，所以很多事他要看上面發展得怎樣。長官意志可以說是一種傳統的

封建思想的影響。這種因素還存在，還沒有流走。

竹內實：你認為中國今後將如何重新評價毛澤東思想？將會用什麼方式評價毛澤東思想？

評毛與毛思想的問題

齊辛：胡耀邦最近對南斯拉夫通訊社記者的一次談話中談到了評價毛澤東的問題，他說，毛對中國革命和中國黨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他同時也犯了錯誤，尤其是在他的晚年。這些錯誤給中國黨和人民帶來了不幸。談到毛澤東思想，胡耀邦表示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在哲學、黨的建設、軍事理論、文化等方面）對中國的幹部仍有指導意義。在去年葉劍英的國慶講話中，對毛澤東思想的解釋已與過去不同，他說毛澤東思想不是毛澤東一個人智慧的產物，而是黨的老一輩革命家共同創造出來的。這種講法不能說沒有道理，但我總覺得有些牽强。按這樣講，華國鋒、鄧小平他們再繼續發展下去，就還是毛澤東思想了。我想在目前情況下，無論在中國內部還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一般都把毛澤東思想當作毛一個人的思想。對它作一種評價，實際上必然要對許多錯誤的、不符合實際的東西加以否定。或許是害怕這樣做會引起很大的問題，所以現在中共可以說毛澤東本人有錯誤，但不去損害由黨的老一輩革命家共同創造的毛澤東思想。毛澤東的著作言論中，合理的部分是毛澤東思想，錯誤的就不是毛澤東思想。然後劉少奇、周恩來所講的話裏，對的是毛澤東思想，不對的就不是毛澤東思想。大概是用這種辦法來解決理論上的困境。我不認為這是一種實事求是的做法。

竹內實：齊辛先生不贊成把互相矛盾的思想包括在毛澤東思想裏面，可是我對這個情況反而感到興趣。中國的思想史正體現出各種矛盾的思想。對日本人來說，老子的《道德經》是中國人的思想，孔子的《論語》也是中國人的思想，但如果仔細分析，道家和儒家思想是不同的，他們之間有互相矛盾抵觸的東西，但都同屬中國思想史的範疇。

齊辛：我並不反對有不同的思想同時存在。我只是反對硬把不屬於同一個人的思想說成同一個人的思想，反對為了一時的方便而把非毛澤東思想也說成毛澤東思想的做法而已。

竹內實：我贊成這種看法。談到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如果說毛本人將會被批判但不會觸及毛澤

東思想的話，那麼「四個堅持」當中的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一項是否不致改變呢？

齊辛：中國現在的做法是毛澤東個人可以適當的批評一下，但毛澤東思想要繼承。問題是什麼叫毛澤東思想，按中國過去一般的定義，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就是毛澤東思想。但是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內容很多，你選擇哪些來與中國革命中的什麼樣的實踐去結合？過去，毛澤東在他那個時期，根據他所選擇的馬列主義理論，跟他所認為應該做的事結合起來，所得出的結論，與以後你所選擇的馬列主義理論和你所面臨的中國的具體問題相結合所得出的結論，兩者可能是完全相反的，那我們是不是把兩者都當成是毛澤東思想呢？這是個很大的問題。可見中國在這樣的問題上，理論上還比較貧乏。不知竹內先生對此有何看法？

竹內實：談到這一點，我就聯想到當年蘇聯批判斯大林。蘇聯曾經丟掉了斯大林，保留了黨。之後中共召開八大。八大採取了一些與蘇聯對斯大林的批判相一致的方針，限制了毛澤東的權力。但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又採取了相反的方針，保留了自己，丟掉了黨。我看即將進行的評毛很類似過去蘇聯的做法，批判毛澤東，但保留黨的權威。不過中國進行毛澤東批判的時候，恐怕不會像赫魯曉夫那樣不留情面吧！

有人說毛是傑出的農民領袖

齊辛：剛才竹內先生講到中共八大，八大時中共認識到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改造完成以後，主要精力應放在發展生產、搞經濟建設方面。就是說國內的急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已經不存在了。當時提出這些也是有馬克思恩格斯的理論作根據的。但第二年，一九五七年就發生了反右運動。反右以後，毛澤東又强調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是長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他也有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理論作根據。也就是說，在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上面，一九五六、一九五七、一九五八這三年的歷程就有很大的差別。我指出這一點就是要說明，對於建立政權以後的許多問題，中共一直沒有一個比較穩定的看法。現在有些人認為，毛澤東是一個傑出的農民領袖，這意思似乎是說，毛澤東在通過農民戰爭建立政權這方

面，是可以充分肯定的，而建立政權以後在行使政權、搞無產階級專政這方面則並不肯定。

竹內實：馬克思主義是很重實踐的，現在中國方面也在高唱實踐，毛澤東也寫了《實踐論》，在這一點上，我認為是符合馬列主義的。但是我記得恩格斯講過，合乎自然界的規律的，也就適合於人類社會。但人類社會有一件事不同，人類有主觀能動性，人類有意志。由於主觀的因素不同，人類根據自然界的法則去實踐，想要達到一個目標，但結果常常事與願違。按我看，目前中國所談的實踐，似乎沒有這樣的觀點，毛澤東的《實踐論》中也沒有這樣的觀點。

川口信行：劉少奇平反後，要重新評價毛澤東，不知這事會怎樣進行下去？

評毛是審判四人幫前的必要步驟

齊辛：我看評價恐怕只能是原則性的，而不可能是具體而微的。從大的方面肯定毛澤東的成就，從大的方面承認他有錯誤，使以後不再像以前那樣，似乎毛澤東是碰不得的。這個評價很可能是為審判四人幫而必需採取的一個步驟。四人幫在毛的晚年為什麼可以這樣猖獗，審判中必然會碰到這個問題。江青等一定申辯，他們的所作所為是得到毛的同意的。這就不可避免地要牽連到毛澤東。承認了毛的錯誤，四人幫的牽連毛澤東的申辯，就等於他們說他們的所作所為是得到林彪、陳伯達、康生的同意那樣，不能成為脫罪的理由。如果不在大的方面承認毛的錯誤，這種審判幾乎就無法進行。

川口信行：在法庭上審判四人幫，就要追究犯罪行為，這就勢必牽連毛澤東，今後相信有關的人也會受傷，如華國鋒。華這些人不知會不會被追究？

齊辛：我猜這次審判不會是很細緻的，是不會糾纏細節的。從西方的法治標準來看，這不會是一次公正的審判，只能是一次政治審判。因為此中涉及許多人，甚至包括周恩來、葉劍英等人，審判中把每個人的賬都翻出來，這在中國是不可能的。即使是秘密審判也不可能。因此它只能是一次粗線條的審判。許多人，包括華國鋒，當時在做些什麼，就免提了。

不能太深刻地追究毛的錯誤

竹內實：據說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反對斯大林的時候，有人寫條子問赫魯曉夫：「當斯大林犯錯誤的時候，你在幹什麼？」赫魯曉夫拿到條子後，讀了一遍，就問：「這條子是誰寫的？」台下默然，沒有人出來說這條子是我寫的。於是赫魯曉夫就說：「當時就像今天這個情況。」這是蘇聯民間流傳的笑話，不是真的。但寓意不錯。這就是說，太深刻地追究毛澤東的錯誤，就可能牽涉到許多人。

事實上，批毛不是現在開始的，這幾年一直在進行。為劉少奇平反就是批毛的行動，正式發表文件只是另一個階段，實際上已經在進行了。

川口信行：最近傳聞鄧小平要辭職，這究竟是因為他年紀大，想退休，還是內部的鬥爭或者其他原因，很多人在猜測。對此兩位有何看法？

齋辛：我想基本上是作個榜樣的意思。在鄧小平提出退休的同時，中國發表了許多文章，提出要廢除幹部終身制，這是幹部制度上的一個大改革，鄧小平作了一個榜樣，有以身作則的意思。同時，中國還在反對論資排輩，提倡內行當領導。有的已經在做，這些都是在鄧提出退休的同時在中國討論的問題。另一點，我想他也許想排除一些不得力的老幹部。有些年紀很大的幹部，既缺乏精力，也沒有朝氣了，但又坐在那個位子上。許多事情要他們蓋印劃圈，或者他們發表一些不符合實際的意見，有時會給書記處的工作帶來很大的牽制。現在鄧小平都退出來了，你退不退？老的退出來了，讓書記處這些稍為年輕一點的人去當權，讓他們在行使權力時有更大的自由。第三點，我想鄧小平事實上不可能在短期內真正退休，他可能辭去副總理職務，而保留黨的副主席和政協主席的職務。也可能全部退出，當顧問。但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人治的色彩仍很濃，他對於書記處，對於整個權力架構中的影響，將會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存在。因此，鄧的退休，並沒有排除他在政治上的影響力，而主要作用是排除其他某些精力衰退的老人的政治影響力。

竹內實：權力鬥爭是一回事，但也要注意社會的習慣，不能光看人事的改變。在中國社會中，你在某個機關工作，吃飯在機關，住房子，小孩上幼稚園，什麼都是機關給，自成一個體系，成了一個

小社會。機關把這些人養起來了。文革中，學生之所以能夠大規模的動員起來，就是因為學生吃住在學校，像服兵役一樣，動員起來很容易。機關也是這樣。在日本，不願服兵役可以逃到外地去，但在中國，離開了機關連吃飯都成問題。還有就是國家預算制度。在日本，製訂了預算，這筆錢就指定用在什麼範圍。在中國，文革時學生不買火車票坐車，到北京吃飯不付錢，這在日本是不可想像的。

因此我認為，除了廢除終身制外，還要改變這種包乾制，改革國家預算制度，改變各種習慣化了的、制度化了的習慣。

關於幹部退休，在日本，一些企業的高層幹部大都是不願退休的。聯想到中國的退休問題，齊辛先生認為將來做起來會是怎樣的？

齊辛：在日本，退休後收入減少了。如果照香港公務員和一些大機構的情況，退休後或者拿一筆退休金，或者拿原工資的一定的百分比，生活上的影響主要體現在金錢收入方面而已。但在中國，幹部的生活水平除了在工資上體現出來之外，還在他們的權力上、在生活條件方面體現出來。比如，退休後就沒有了作為工作資料的小汽車，等等。因此，他們一旦退休，生活水平下降的幅度就較大。老人不願退休，這在許多國家都一樣，但在中國恐怕還有多一層的考慮。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中層、基層幹部的變化。近期來，中國正在把一些內行的人，把知識分子，放到中層和基層的領導崗位上去。估計這幾個月在這方面會有較大的發展。中國的縣委書記中，有多少是高中畢業的，很值得懷疑。可能大部分是沒有受過中學教育的。這怎麼能領導搞現代化建設？外國和香港的商人、學者，在與中國的交流中，都碰到領導幹部知識水準不夠的問題。四個現代化真要建設、發展，這個問題必須解決。把知識水平較高的人放到領導崗位，換下知識水平較低的人來，這是中國人事大變動中的一個值得注意的趨勢。

竹內實：剛才齊辛先生作為一個中國人談了一些中國的事情，現在我作為第三者，作為一個日本人，也談一點感想。

首先，我覺得中國方面處理國際事務的手法不夠高明，例如中國的要人訪問日本的時候，鄭重其事地去訪問在日本正在受法律審查的人物，這就不大高明，日本一般人民在感情上的確不能接受。又

譬如，中國的要人直率地談日本的國防經費，談日本的重整軍備的問題。這在日本人民中是有爭論的問題，是日本人民引起內心痛苦的問題。日本過去對中國從事侵略戰爭，帶來了痛苦，他們得到了教訓，有些也有反省，所以，許多人都不贊成重整軍備了，不要再提高國防費用了。這是由內心的活動和政策聯結起來想的。可是偏偏中國要人提出不反對日本重整軍備，這是很難使日本人民理解的。

這也關係到知識水準的問題，中國研究日本的只限於經辦的官員。他們讀日本的各種報章雜誌，這些資料一般人民是讀不到的，所以人民對日本的了解不夠。當政府採取了某種對日政策後，人民無權批評。而當權人的知識來源有限，他們不了解日本一般人民的想法，制訂政策時也就不可能考慮在日本人民中的影響。所以我想，中國的幹部不僅一般知識水準較低，國際性的知識來源也很成問題。

齋辛：與此有關的事件是黑龍江一份文藝雜誌《百家文藝》登出關於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的言論。外國記者報道以後，中國當局就很緊張，認為《百家文藝》的言論會損害中美關係，就立刻內部批評了這份雜誌。其實美國人並沒有看到這份雜誌，即使看到，也不會在乎一個地方性雜誌的看法，相反美國人可能很在乎官方干預一些雜誌的言論。

現代化的一些問題

川口信行：從中國人民的知識水平，就很容易想到中國的民主化和現代化問題。是否請兩位談談這問題。

竹內實：日本方面，不管是上層還是一般的民間財團，都不希望中國有大的動蕩，因此對中國領導也寄予人事變動不要太大的期望。

這也關係到中國的現代化。當初中國高唱現代化，目標很大，但現在好像都在修訂，甚至使人對當初的目標也模糊了。舉例講，在農業方面，說希望百分之五的人先富裕起來。百分之五就是四千萬人，大致等於一個歐洲國家的人口，先讓這些人富裕起來，我相信也會相對地製造一些貧窮的人，造成新的貧富對立。我又注意到在日本，有的報紙在同一版上一邊報道中國四個現代化的新聞，一邊報道伊朗廢王巴列維。我甚至懷疑報館是在有意暗示。巴列維推行自上而下的現代化，結果失敗了。

當然伊朗與中國國情不同，伊朗社會宗教觀念很重，中國沒有這個情形，可是中國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會不會造成貧富懸殊？會不會使矛盾激化，以致發生問題呢？

另外一點，中國現代化計劃的制訂，最近看是由社會科學院來做的。這令人想到秀才搞政治會不會跟實際有距離。他們本身不是政、經界有權力的人，由他們來制訂政策，有什麼依恃？將來若搞糟了，局面怎樣收拾？現在雖是由秀才提出政策，但鄧小平等有實力的人利用他們的影響力來推行。鄧小平等人隱退以後，秀才們利用什麼來推行政策？

齊辛：我很同意竹內先生剛才講的第一點，至於第二點，我覺得秀才們可能還比較實際一點。許多在行政、企業管理部門的領導人，看問題可能還不如書生看得清楚。這是由於受知識水平的限制。現在看到的一些社會科學院、尤其是經濟研究所寫的文章，我覺得還比較實際，不是空頭理論。他們提出來的政策，以前靠鄧小平去推行，將來要靠書記處去推行。譬如最早提出按經濟規律辦事的胡喬木，現在是書記處的書記，已經在權力中心了。所以隨着中國現代化目標的提出，讓這些書生到權力位子上去，發揮知識的作用，比較由知識水準低的幹部去管理國家，管理企業，要好得多。

中國現代化的目標已經經過了多次修訂，到現在還沒有一個具體的目標。最早是一九七七年，說是要在本世紀末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這個目標如果按人口平均的個人生產值年增長率來計算，根本不可能達到。到今年年初又提出搞中國式的現代化，但中國式的現代化到底是什麼，並沒有一個明確的目標。後來鄧小平又提出個人平均收入達到每年一千美元，這個觀念也相當模糊。因為現在世界平均的個人收入是二千多美元，先進國家是四千美元，美國的平均收入達七千到八千美元。因此一千美元的目標，絕不是二十世紀末的現代化水平。後來，經濟研究所的許滌新提出，中國式的現代化是從中國人口多、底子薄這個現實考慮，如果說二次大戰前是機械化的時代，二次大戰後就是機器人的時代，即電子計算機的時代。那麼中國式的現代化就只能是大多數項目達到機械化的時代，而不是機器人的時代。這就又退了一步，退到二次大戰以

前的水平了。

我覺得許滌新的講法比較實際，是從中國的現實出發，而不是去訂一個根本達不到的目標，至於這個目標叫不叫現代化，那是另外一回事。

現代化不能以犧牲民主權利來換取

竹內先生還提到伊朗現代化的失敗。我認為巴列維之失敗，在於他在推行現代化的同時沒有推進民主化。現代化要爭取經濟的成長，是不是可以用擴大貧富差別，擴大特權，或者犧牲人民的民主權利來換取呢？比如引進外資等，是不是可以限制工人罷工，允許外資工廠輸出公害呢？

我認為，民主化是目標，現代化、發展經濟只是手段。按馬克思主義的原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目標，就是要使人民更加有權，就是消除人的異化，成為真正的人，自由的人。發展生產能與老百姓的利益真正聯繫起來，就可以互相促進，若不能與老百姓的利益聯結起來，生產發展了，但使人民失去更多的權利，使他們更受壓迫，貧富差別更大，造成許多新的特權。那麼現代化的經濟目標也許達到了，但馬克思主義的最根本目標失掉了。這樣的結果，還可能造成社會的動蕩。

竹內實：關於民主化的見解，我很贊成齊辛先生的看法。在日本，一般地說把中國的現代化認為好比是蓋大樓。但我最近覺得：大樓是蓋在平地上的，可是中國的地上是個大窟窿，先要填平這個窟窿，這填平的工作，就是現代化目前的具體內容。當然這裏面要包括民主化。

齊辛：中國在四人幫垮台以後，人民對政治民主化與經濟現代化都有強烈的要求。相比之下，對政治民主化的要求更迫切些。當然，對肚子都沒有填飽的人來說，首先要填飽肚子。他們根本不理會什麼現代化或者民主化。但民主化的一個起碼要求是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而吃飽肚子正是人的最基本權利。物資不足妨礙人民獲得基本權利，而分配不均更使人民失去了可以獲取基本權利的信心。中國在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一年，經濟上處於困難時期，當時的物資缺乏比現在更要嚴重得多，但當時大家還覺得可以過，還有信心去克服困難，為什麼現在就覺得信心不足了呢？我想這不僅是物資缺少，而且還在於物資分配的不平均，官僚特權比之

於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有了很大發展，而老百姓的基本權利是更少了。

中國老百姓的民主要求都是十分具體的，但我們就是看不到中國的官方報刊認真地面對這些具體現實的矛盾。比方說到特權，始終就不敢面對上層的特權，而是一直在談民主與集中的抽象的原則。

竹內實：四人幫倒台後，中國出現了一些民辦的刊物，這本身就是民主的基盤。當然我們歡迎《人民日報》也能直率地面對特權等問題，但當我看到民辦刊物出現之後，才覺得中國的確真正民主化了。

民主是具體的

齊辛：我想對中國老百姓來說，民主不僅僅是意見表達的問題。在人民的生活中，民主是很具體的。除了應讓人民有申訴和表達的自由之外，還應讓人民的困難得到解決。譬如農村幹部可以把農民吊起來打，可以從私利出發不公平地計算工分，許多農民都只能逆來順受，這都是具體問題。一個人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可以到哪裏去申訴，並求得解決？一個人見到了不合理的現象，見到幹部濫用特權、損公肥私，他應該怎樣行使一個公民應有的權利，制止不良傾向的發展？對一個瀆職的官員，人們怎樣可以使他去職？這不是單純的民主表達的方式問題。在報紙上有更多言論自由，是民主的體現之一，但對老百姓來說，最重要的是要解決問題。但我們看到中共報刊談這個問題時，往往就不是這樣。總是談什麼要民主但不能沒有集中，然後談民主與集中是什麼關係，怎樣在集中指導下發揚民主，怎樣在民主基礎上集中，光是在概念上兜圈子，始終沒有切實地面對具體的問題。特權階層對人民的民主要求，只是看他的特權受到了多少挑戰，他需要放多少民主出去。也就是說，許多人對待民主，只是作為一種安撫的手段，並沒有看到人民由於無權而受到的實際的痛楚。

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聲

竹內實：講到民辦報紙的事，我心中就想到了《七十年代》。我希望在中國國內也出現像《七十年代》那樣的刊物。我們外國人現在通過《七十年代》以及其他的若干很有

水平的香港雜誌，多少可以了解到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聲。我認為這不僅僅是對我們有好處的。我剛才所說的中國知識分子是不問他在不在國內。

現代中國都認為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動力，認為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問題。但我讀了馬克思的《德意志意識形態》，裏面說社會的主要矛盾不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而是交通關係，交通與生產力的關係，所謂交通就是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和交換，鐵路等交通也包括在內。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似乎沒有提到過這一點。因為我們事前預定的時間已經超過了，所以我不得不省略本來很想跟齊辛先生討論的問題，比方說文藝問題、人口問題，而要講結論性的話了。恕我直說，現在中國開放了，也可以說，開放得兩三年以前沒有設想到的程度，但是我認為中國現在還有框框，有馬克思主義的框框，黨的框框。我多少明白按照現狀來說，這兩種框框還是需要的。但黨的框框，提的似乎急躁一點。如果片面地要恢復黨的權威的話，就會引起可怕的波動。例如批評黑龍江的文藝雜誌的時候，我在日本報紙上讀到，似乎中共中央方面附帶聲明，關於涉及到原則性的問題只能由中央來講話。我們現代人的生活哪一個問題不涉及到原則性的問題了？並且判斷哪一個問題是原則問題的決定權也掌握在黨中央的話，那麼儘管提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對老百姓來說有什麼話可講？

我有這麼個感覺：急於要恢復黨的權威性的念頭，似乎還是所謂「復活幹部」中特別濃厚。這個時候他們頭腦中的黨，是受文革衝擊以前的，他們在黨的生活裏了解到的黨。也可以說他們還沒「揚棄」自己。文革中他們所受的處境，我認為是不對的。他們過去不顧自己生命安危從事革命，我很尊敬他們。但平反以後，他們還把自己看作先驗性的領導，口氣雖然溫和，實際上還要定框框，要搞清規戒律。我希望中國還是把言論開放一點，不要貼了幾張大字報就要審判定罪。中國老百姓的心眼是明亮的，我希望搞領導工作的人士要相信你們的老百姓，要相信你們的知識分子，尤其是無名的、而默默從事實際工作的知識分子，多讓他們開口講話。



徐鑄成談輿論監督和民辦報紙

日期：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六日
地點：香港七十年代雜誌社



前言

徐鑄成，一九〇七年生，江蘇宜興人。中國著名新聞工作者及評論家。早年担任《大公報》編輯主任、總編輯，是上海《文滙報》的開荒者和香港《文滙報》的創辦人。一九四九年從香港回北京，九月參加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嗣後任華東軍政委員會文教委員會委員及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常務委員。一九五四年八月被選爲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廣東省代表。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分子」，文革期間復被批鬥。一九八〇年六月中共中央正式爲之平反，發佈文件宣佈他和章乃器、龍雲、費孝通、錢偉長等二十一個「全國性影響較大的愛國人士」的「右派分子」屬於錯劃，並予改正。其後，徐鑄成即担任上海《文滙報》顧問，兼任上海復旦大學新聞系教授。

在徐鑄成正式平反後不久，一九八〇年九月，他到香港作短期停留，其間接受我的訪問。讀了他的畢生遭遇和感慨，使我們了解到一位正直的報人在過去一段曲折的歷史中，所經歷的坎坷，以及今天對中國新聞事業的急切願望。

□ 首先請徐老先生談一談自己的簡單經歷，因為您已經默默無聞二十多年，現在二三十歲的人大都不認識您了。

■ 我起初在清華大學讀書，但沒有畢業，因為家貧轉到北京師範大學半工半讀，一邊讀書，一邊參加國聞通訊社工作，那是一九二七年底的時候。所以作為新聞記者，我看到了北洋軍閥統治的最後年代——張作霖時代。那時候開始，我就一直在《大公報》工作。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上海淪陷，我才離開《大公報》，在上海主持《文滙報》筆政，堅決宣傳抗戰。《文滙報》銷數達到六萬份，壓倒了當時上海最大的《新聞報》。到一九三九年中，被敵偽和租界當局扼殺，《大公報》的胡政之、張季鸞邀我回《大公報》主持香港版編務，胡、張不大管事，從言論到編輯都由我主持。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起，香港版停了。日本人很想逼《大公報》復刊。利用《大公報》這塊招牌，為他宣傳。我們當然不幹，一九四二年一月，我化裝成一個流氓逃掉了。我到桂林《大公報》担任總編輯，一九四四年桂林淪陷以後到重慶，作社評委員兼晚報主編。抗戰勝利後到上海籌備《大公報》復刊，任總編輯，當時對《大公報》我還寄以希望，很想把它辦成一張民主報紙，請了馬叙倫、鄭振鐸、傅雷等作評論員，但老闆説我太左了，説被國民黨封了怎麼辦？我説不會的，國民黨怕美國，封了會引起美國的注意，最後胡政之還是不放心，到王芸生來滬以後，我就辭職，又到上海辦《文滙報》。我把《文滙報》改版，一步步走上民主的道路。那幾年我在新聞界做的工作，是比較有成績的一個時期，當時的學生、工人把《文滙報》當成自己的報紙。我們報社有困難，就登報公開招讀者股，有的學生、工人、店員一個人不行就兩人合一股，支持《文滙報》，龍雲、李濟深等人也支持，但我們不收政治投資。他們也參加讀者股，招足了相當於現在一二百萬港幣的資金，其中三分之一是由零碎股湊起來的。到了一九四七年五月，國民黨終於把《文滙報》封了。當時還沒有坐牢，但經常有特務打電話來，説你不到香港去，就不抓你。他們就怕我到香港去辦報。

第二年三月，香港有人到上海，邀我到香港辦報，我説要辦就辦《文滙報》。那年四月我輾轉到香

港，九月，把香港《文滙報》辦起來了。那時的社址在荷李活道，預定的經理不敢來，我就只能又當總經理又當總主筆。創刊時發行二萬五到近三萬份，自己只有一台破平版機，《新生晚報》的黎蒙，因朋友關係，代印兩萬份，自己只印幾千份。那時我們是「書生辦報」，廣告很多，但收不到現款，都到廣告主任的口袋裏去了，他就說收不到款。經濟周轉不靈，沒有錢買紙，最濶氣的時候，只買三十噸紙。我晚上平均只睡三個鐘頭覺，有時剛睡到床上，也會把你拖起來，說沒有紙了，趕快想辦法。

一九四九年三月，說是組織民主人士回內地。那時我對祖國是一片熱望，就離開香港到北京去了。走時，《文滙報》交由金仲華接手。

一九四九年到了北京就涼了半截

□ 徐先生今天又來香港，事隔三十多年了，回想起來，您覺得當時決定去北京從事中國的新聞事業，這條路是不是走對了？

■ 我到了北京就涼了半截。當時我有「雄心壯志」，本打算在北京也辦一個《文滙報》，這樣上海、北京、香港都有《文滙報》了。我估計《大公報》《新民報》等，羣衆不一定歡迎，我們的報紙作為民間報紙，大概沒有問題。到北京一看，管得很嚴，於是北京出版的計劃就放棄了。這樣我就到了上海。《文滙報》是讓繼續出版的，但是採取讓它自生自滅的態度，連紙都在控制之下。那時共產黨在羣衆中威信很高，沒有共產黨支持，就無法生存下去。我們《文滙報》解放前就有十四五名共產黨員，宦鄉、孟秋江等人都是。解放以後，黨員都撤走了，只剩下一個解放前還不是黨員的候補黨員。

《文滙報》在解放初期銷路並不好，不可能每天寫社論，新聞題目都有一定規格。如毛澤東的《論人民民主專政》，我們把它當新聞處理，分大標題小標題，結果說這是文件，不能自己改加標題的，這樣做是離經叛道的。以後就什麼也不能發揮了。「三反」起來了，就寫擁護「三反」的文章。要鎮反了，就寫擁護的文章。我最不會寫歌功頌德的文章。我過去跟張季鸞學，他有一個「要訣」，就是不要說人家常說的話，不要用人家常用的句

子，不是標新立異，要有新意，使人看了感到新鮮。人家說什麼，你也跟着說，讀者就厭煩了。現在口氣都要按《人民日報》社論，文章章法都是一致的，那我就很難寫。所以後來我們有一個時期改組成為專門搞教育的，以教師為對象的專業性報紙。一九五六年三、四月間就索性停了下來。停了我就到北京參加《教師報》的工作，《教師報》完全是學蘇聯的。

從《文匯報》復刊到被打成右派

□ 到鳴放時候《文匯報》才復刊的？

■ 後來提出「雙百」方針，劉少奇也在新華社講了兩次話，講到中國的新聞不能學蘇聯，要好好地注意新聞，不要老是乾巴巴的介紹經驗。還說新華社也可以自己辦個報紙和《人民日報》競賽。那時候鄧拓主持《人民日報》。他也把這當真的政策去貫徹，請蕭乾去當副刊顧問，副刊上也登不同的文章，悲劇、諷刺雜文等文學新品種也出來了。但是知識分子還是不敢放，那時他們才想到《文匯報》來。《文匯報》與知識分子有歷史的聯繫，倘若《文匯報》來倡導鳴放，知識分子就敢於說真心話了。因此，千方百計鼓勵我們復刊，那時幾個黨員領導如鄧拓、夏衍、姚溱與我們一再商量，連復刊的幾條宗旨、怎樣鳴放等都完全支持、同意。這時候我也很興奮，搞《教師報》實在沒有味道，現在能重新搞一個綜合性的報紙，而且空氣也不同了。但我提了一個條件，我認為需要的幹部要回來，中宣部就說你寫個名單，我們盡力給你爭取。我寫了十幾個人的名單，果然大都爭取回來了。那時《文匯報》陣容比較整齊，復刊以後的面目，我可以狂妄一點講，是解放以後全國報紙中最生動活潑的一份。像一份現代報紙的，就是那一段時間的《文匯報》，還有鄧拓主持的《人民日報》。

□ 這一段時間有多長？

■ 五六年十月一號復刊，真正好的一段也就幾個月，後來我到蘇聯去了，接手主持的人走板的地方很多。但一般講，在敢於鳴放這一點，還是比較好的，有些地方是過火一點，直到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

這是反右的第一砲，然後是六月十四日的《文滙報在一個時間內的資產階級方向》和七月一日的《文滙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這幾篇文章都是老先生自己寫的。

可是，在這以前，我們是備受讚揚的，羣衆讚揚，也包括老先生的讚揚，他一再說我們辦得好，而且面諭《人民日報》編輯部、工廠部組織人到《文滙報》學習，學習怎樣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

□ 你們還被接見了一次？

■ 那是五七年三月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期間。那次被接見的新聞出版界有鄧拓、金仲華、王芸生等。他見到我就跟我拉手，說《文滙報》好得很，我每天首先就看《文滙報》——這都是原話。他說：「你們是琴棋書畫，花鳥蟲魚，應有盡有，辦得很好，編得也好。」接見是在他的客廳裏，他問大家有什麼問題，鄧拓坐在我對面，鄧拓叫我先說，我就說，我們馬列主義的書讀得不多，我很怕放得多一點，就會變成修正主義，抓得緊一點就變成教條主義，怎麼辦好？他說那不要緊，你們都有幾十年辦報的經驗了，在戰爭中學習戰爭嘛。我們原先一點都不懂打仗，就是從戰爭中學習。

姚文元在一九五七年即受賞識

這時又談到片面性問題。他說片面性是難免的，魯迅早期的文章也有片面性，到晚期，郭沫若，創造社逼着他學了馬列主義，才沒有片面性。我看年輕人的文章也有片面性，李希凡就有片面性，王蒙也有片面性，我看只有姚文元較少片面性。所以姚文元的受賞識，有人說是江青、張春橋推薦的，我是親耳聽到是他欽點的。

後來他又問我們放還有什麼具體困難？我說我的想法，鳴放就是高價徵求批評。比方說，我們搞了一個電影問題的討論，剛剛展開，反批評就壓上來了，壓得很厲害，這樣人家就不放了。我說能否可以晚一點，讓人家暢所欲言，這就叫高價徵求意見。他說這個意見很好，這樣吧，我叫周揚同志給你寫個小結，他有什麼意見，讓他小結一下，這樣批評、反批評、小結，正、反、合，就是辯證法，

你看怎樣？我說這很好。後來我到蘇聯去了，是叫周揚寫了篇文章。

□ 這是不是就叫「引蛇出洞」？

■ 我也不知道這就是引蛇出洞。開完會我就到蘇聯去了。本來就已預定我參加中國記者訪蘇代表團，開會的時候說要我做副團長，我說蘇聯是個社會主義國家，我一個非黨員，當副團長不合適，他們說不要緊，一定要當。我想當個副團長擺擺樣子的，就回了上海，只用三天時間，料理一下又到北京。這時又升了，要我當正團長。代表團十四個人，十二個是黨員，就我和《光明日報》一個編輯不是黨員，我更惶恐了，我怎麼能當團長呢？但是非當不可，而且鄧拓特別關照代表團臨時黨小組的書記，說除了討論黨的工作，每次開會都要讓徐鑄成參加。我當時是受寵若驚，簡直把我當自己人了，自己也飄飄然以為是黨外布爾什維克了。

在蘇聯五十天，十五個加盟共和國走了十個。那時候國內鳴放很起勁，很多團員，也包括我，要趕快回來參加，這是學習改造的好機會啊！不能失掉，就像延安整風一樣。蘇聯方面本來還要我們到黑海雅爾達住一個時期，但我們一定要回來。五月中回到國內。一回來就要我參加上海的宣傳工作會議，我那時趕着寫長篇的訪蘇見聞，但上海的宣傳副部長一定要我去，說會議沒有幾天了，還把他的出入證給了我。我說去就去吧。

到會上一聽，正在講拆牆的問題，就是黨內黨外拆牆。我也談了一下，我說假使黨員領導是內行，彼此坦誠合作，牆自然會拆掉，假使是完全外行，什麼業務都不懂，那就是秀才碰到兵，很難合作。

□ 這就是右派言論了，是一條罪狀。當然現在已號召學習業務，爭取「懂行」，大家都在這麼說了。

■ 現在是常識了。

我五月中從蘇聯回來，六月八號《這是為什麼？》就出來了。假如說《文滙報》放得過火一點，也不是我在的時候，我走了，報紙由一個黨組書記兼副總編欽本立負責。我們合作得很好。那時候我也沒有寫什麼文章，就是講拆牆也不夠右派。突破我的時候，可能是康生讓《光明日報》的一個

記者硬說我講過，《文滙報》復刊了，主要聽羅隆基的指導。這個揑造的話跟我的身份不符，新聞界的朋友也不會相信，而且我與羅只是個朋友，他投稿我經常退稿，有兩年工夫沒有講過話，我覺得他是個政客，不大願意接近他。

□ 您認為反右運動的發生，是毛澤東在推行鳴放的過程中，因知識分子放過頭了，因而改變了主意，進行壓制？還是他老人家早有蓄謀的一次運動？

反右的「陽謀」是蓄謀已久的

■不能憑空臆斷，也不應孤立地看這個問題。從五十年代初，評《清宮秘史》，評《武訓傳》，批判「俞平伯評紅樓夢」，思想改造，反胡風，以及反右以後的「神仙會」，倡導海瑞精神。「一條紅綫」，不總是對知識分子不放心，要引蛇出洞，聚而殲之麼？

文化大革命中，幹部被抄家，許多文件被小報登出來了，我看到小報上登一份文件，在五七年五月就有一篇文好像叫《五月的氣候》，說有些黨員與黨外人士稱兄道弟，什麼話都講，還罵有些黨報不知道貫徹黨的政策，是文人辦報，死人辦報。我想這一定是指當時跟我接觸較多的鄧拓、夏衍這些人。這樣看，他至少在五月或者五月以前就有計劃的在搞了。根據以後的做法看，這「陽謀」也是蓄謀已久的。五七年搞了一下，知識分子不敢講話了。歸根到底還是對知識分子不放心。五九年又叫大家到北京去開神仙會，說「不抓辮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最後連黨內黨外一起搞了一次。在民主黨派中搞回顧檢查，又整，在黨內就是反右傾。過不久，六〇年冬六一年初廬山會議又提倡大家學海瑞精神，要敢於做海瑞，據說也是老先生提倡的。於是報上就連篇累牘宣傳海瑞、魏徵，吳晗也拿出了他的《海瑞罷官》，一位領導到上海把一部《海瑞傳》介紹給周信芳，周信芳勉勉强强接受了，搞了一個《海瑞上疏》。他也是黨員，要響應黨的號召。不知道這是伏筆，預備搞一次更大規模的，就是文化大革命。所以文革的起意看來是很早的。

□ 這二十年您再沒有碰過報紙？

■ 二十多年來我再沒有碰過報紙。我自己發狠，不看《文滙報》，有時候寧可看別的報紙。

□ 不知徐先生怎樣看大陸報紙的內部體制？

■ 五七年這麼一來，那就真正輿論一律了。過去只要在大框框內，登消息大體不錯，有時頭條二條有差別還能容許。後來，《人民日報》哪個放頭條，哪條放二條，《文滙報》要打電話問清楚。文革時，連題目標多少字，哪些標在題目上，都要向《人民日報》請示。

□ 在中共建國以來，文藝的方向還有過各種爭論，對報紙的方向似乎沒有什麼爭論，始終是階級鬥爭的工具。徐先生回顧這三十年，您覺得這種辦報的方向對不對？究竟走了一條什麼道路？

三十年的辦報方向對不對？

■ 解放初期，胡喬木就說，這是解放區的新聞工作者和白區的進步的新聞工作者的大會師，今後應該取長補短，把中國的報紙搞好。但實際上是片面的接收，所有的報紙都按一個模式辦，按蘇聯的模式辦，按老解放區的模式辦。解放區的模式脫胎於蘇聯模式，而且更沒有時間性，只會介紹經驗，如介紹一個互助組的經驗，可以沒有時間性，因為農村連鐘都沒有，看到太陽到了，就是中午了，可以散會了。所以報紙也沒有時間性。國民黨統治區的進步報紙，包括重慶周總理的《新華日報》，夏衍的《救亡日報》，都有一套經驗，怎樣在國民黨地區團結知識分子，新聞怎樣搶得快一點，他們都要爭取讀者，千方百計把中間分子甚至國民黨的人爭取過來，都有一套經驗。但是解放以後，把白區的這些經驗也完全拋棄了。把老區的經驗生搬硬套搬進城市。最初還有幾個老手如范長江、惲逸羣等，後來長江當出版總署領導，惲則挨了整。報紙要為當前的政治服務，只能宣傳這個。

論內部矛盾的文章發表時加了一段

□ 那時不也說急風暴雨的階級鬥爭結束了，報紙也不必作階級鬥爭的工具了嗎？

■ 後來老先生的兩類矛盾出來了。他講話時是說結束了，到發表時，又加了一段，

說：「但是，被推翻的地主買辦階級的殘餘還是存在，資產階級還存在，小資產階級剛剛在改造。階級鬥爭並沒有結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這段話講話時沒有，是文章發表時加進去的。這在國內是公開的秘密，那是準備打人的。

現在階級鬥爭工具這個問題就難講了，搞四化，一定要搞政治民主化，單單是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給它實權，可以起一點民意機關的作用，經常的有沒有呢？原來還有大字報，後來被搞成整人的工具了。現在人民對官僚主義、特權等消極現象怎樣才可以揭露呢？還沒有適當的途徑，所以我以為要搞民主，必須讓報紙發揮輿論的作用。真正能讓人民在報紙上說自己要說的話。

□　這就是說現在基本上還沒有一個制衡的手段。過去的教訓就是，在一黨專政的條件下，如果只有黨報，沒有民辦報紙的話，黨就幹什麼都可以了。當然用家訓的辦法也可以，父親教兒子，也可以教得好一點，但父親對兒子往往比較仁慈，兒子不聽話，父親拿他一點辦法沒有。所以一定要有一個不能為所欲為的條件，這就需要有制衡。

有民辦報紙，搞特權的人至少有點顧忌。

■　這樣，做的人至少有一點顧忌。比如國民黨時代孔、宋家族貪污，那時多少還有幾份民間報，還有幾份小報，他們也怕在報上見面。舉例講，太平洋戰爭時，蔣介石派飛機到香港來接國民參政員，接流落在香港的名流，結果名流沒有接走，孔祥熙的女兒，就是有名的孔二小姐，把她所愛的十幾條狗坐了飛機帶到重慶。《大公報》等幾家報紙氣極了，就在報上揭露，孔家也慌了，趕快起來解釋，以後就收斂了一些，至少要更加掩飾一點。現在可能從海外運進去的東西更多，誰敢講？我到香港來聽到許多故事，有些官員整車整車拉進去，誰也不能說，他們就是沒有顧忌。你要搞四化，能不能允許這樣做？所以我說單靠人民代表大會，在會上揭一揭，過了就完了。聽說一位部長在

這次人大小組會上很不在乎的解釋了一下就完了。如果有一個報紙，即使不點名，點出那件事來，他就慌了，要認真對待了。

□現在大陸報紙也有一些揭露，這能不能發揮民辦報紙的作用？

■一個很奇怪的現象是《人民日報》反而更開放，照例它是黨中央的機關報，代表黨中央，應該最受拘束，但現在反而是它最開放。其他報因為沒有《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那樣有膽識，同時也沒有他那樣的有支持，因此像上海或其他地方報紙，甚至是香港的，都不如《人民日報》，因為它動不動就要吃批評，宣傳部長或者還要小一點的官一句話，一個電話，他就慌了……。

□《人民日報》有很多讀者投書，比較敢揭露問題，為什麼全國報紙不可以效法？

■這裏有兩個框框，一個是輿論一律的框框。現在所有國內的報紙，發表言論，標一個標題，好像都代表黨中央，比方伊朗人質問題，兩伊戰爭，報紙都不敢發言，因為一發言，伊朗或伊拉克就會提抗議，說你代表共產黨，中國的態度是不是變了？因此報紙的基調都一致，這就看出為什麼要有民間報紙，作為民間的制衡，輿論的監督。黨報總有黨的紀律限制，總編輯作為黨員，就不能發某些稿件。中國共產黨的黨紀運用起來，比國民黨嚴格得多，國民黨是個很鬆散的黨。

□現在講輿論的批評監督作用，說要以安定團結為重，在這個框框之下，有沒有很大的妨礙？

如果有自信，就不應怕人家說什麼。

■如果自己有自信，真正是為把國家建設好，搞現代化，就不應怕人家說什麼。就算是民間報紙，它也總要使人民羣衆能接受，因此違反憲法，反馬列主義的就不會有很大市場。除非自己沒有了自信。目前一般的中國老百姓對共產黨還有一定的信任，對走社會主義道路一般還是擁護的，將來若有民辦報紙，也一定會在這個框框裏。在這個範圍裏容許人家講講話，讓人民透透氣，我看只會有好處。

□您相信大陸的年輕人對黨、對馬列主義的信心沒有消失，或者說沒有懷疑嗎？

■懷疑的當然有，經過那二十年，是使人民失望甚至憤怒，但共產黨還是人民擁護的領導力量。沒有其他政治力量可以制衡、競爭，更不要說代替。

□民主黨派在今天能不能起一點制衡作用？

■現在的民主黨派，就很難說了。恐怕連對「長期共存，互相監督」也誠惶誠恐的吧。我對民主黨派的現狀並不了解。我想，如果不加控制，讓它們在憲法範圍內獨立活動，總會發揮些作用吧。

□您提議要有民辦刊物，那麼您對於過去幾年辦民刊的青年人，基本的看法如何？

■青年人總是富有朝氣，得風氣之先的，是國家民族的希望。儘管我們已被搞垮了一代，但還有不少青年，並不灰心，憂國憂民，站起來探索道路，這種精神是十分可貴的。如何面對現實，更踏實地前進呢？

□既然一般老百姓還信仰馬列主義，中共為什麼不敢讓民辦報紙出現呢？

■現在看樣子放到五七年的程度是容許的，超過這個限度就不許了。現在還不到五七年的程度。

□五七年比較厲害的就是儲安平、葛佩琦，講輪流做莊，講老和尚小和尚，黨天下。……

■「輪流做莊」還沒有公諸於文字，「黨天下」也就是在統戰部一次座談會上講的，說現在黨包辦一切，簡直是「黨天下」，這也是極而言之的說法。葛佩琦聽說現在也改正了，他拿出他的原文來，當時是斷章取義，也是極而言之的話。當時共產黨這麼高的威信，大家都信賴，誰會公開說殺共產黨？

民辦報紙有沒有可能實現？

□這就是說，您認為現在大陸的報紙，如果不是民辦的話，要辦到像五七年那樣還不可能。這裏我想提一個實際的問題：民辦報紙有沒有可能？第一，會不會放心讓你辦？第二，有沒有人願意去辦？第三，若容許辦也有人去辦，物質條件能不能辦？這幾個問題，在可見的將來有沒有解決的可能性？

■第一個問題，我看在目前情況下不會容許。

□ 為什麼呢？我們認為批評可以使國家民族進步，批評在某種程度上看來是安全活門，可以出出氣。現在有這麼多不滿，有些人批評一下，可以出出氣，也可以幫助改正錯誤。如果批評過了頭，成為誹謗，也可以告到法院裏去嘛！在這種情況下，不容許的主要阻力在哪裏？

■ 一個是習慣於輿論一律，很方便，假使讓人隨便哇啦哇啦，總不放心。第二，還沒有感到需要這個活門。到需要的時候，才會考慮。

□ 但是通過批評去改正錯誤這是很必要的。現在有許多問題，光由上級去管有時也管不好，有了民間的壓力，反而好辦一點。

■ 假如真能好好去做，碰到阻力，報紙還可以起清除阻力的作用。現在經過了這二十年，很多中層幹部，有的完全變成官僚了，有的習慣於走老路，還有種種特權，總之，應該批評的很多。所以只有讓羣衆有機會把看到的東西揭出來，報紙登出來，才能普遍看到毛病在哪裏，引起重視。

至於第二個問題，有沒有人願意並敢於出來辦這樣的民間報紙，我看還是有的。老一輩過去辦過民間報紙的，在新聞界還很多，倘若真正有這樣的報紙，願意辦的人我看還不少。新的人也有不滿意現在的報紙的，我所接觸的一些新聞系的學生，他們吸收到了一些外國報刊新聞自由的空氣，因此思想也比較開放。

□ 目前不許民間辦報，那麼憲法裏的言論出版自由怎樣解釋？

> **如眞正有言論出版自由，就應該容許民辦報紙。**

■ 很多自由都是這樣的，不單是新聞自由，出版自由也一樣，您怎麼能自由去出一本書？

我想，公開發行的民間報反映的範圍，總不會像魏京生那樣漫無邊際。假如真正有言論出版自由，就應該容許民間報紙，同時黨報本身也要多樣化，在黨的方針路綫下多樣化一點，多透一點人民的聲音。而真正要這樣做，首先要通過一個出版法，讓人民在這個範圍內，真正得到言論自由。

□ 第三個問題是，有沒有物質條件，機器，紙張等等。會不會像徐先生以前辦香港《文滙報》那樣，要為紙發愁？

■ 那時在香港是沒有錢，硬是花大一分的利息去借錢來救急，借十塊錢，一個月後就要還十一塊。今天在國內，你自己花多少錢也買不到紙。所以說最大的困難，恐怕就是印刷設備和紙張問題。如果有誠意，就應該一視同仁。

□ 民辦報紙如果真正出現，與憲法上的共產黨的領導有沒有抵觸？

■ 這要看怎樣理解黨的領導了。像現在這樣，每一件具體的工作都要由黨看過、簽過字，那不要說民間報，什麼事情都不好辦。假如理解成國家的大政方針、路綫由黨規定，在這個框框下可以發揮大家的積極性，那就不同了。

□ 我們看沒有政治民主化，現代化也很難實現。

■ 中國人的革命是氣出來的，受帝國主義的氣，受地主的氣，孫中山、共產黨才起來革命。現在沒有這股氣了。搞四化，也需要這股氣。我到香港來，聽人家說，到九〇年，希望深圳香港化，廣州深圳化，北京上海廣州化。作為一個中國人，聽了應該很氣忿。我們過去說要國家富強起來能夠去影響別人，現在把香港作為一個模式，一步一步向它看齊。但從現狀來看，從經濟發展看，你又不能不承認這個現實。作一個中國人，一方面要向人家學習，學科學、學技術，加快步伐；另一方面，有沒有這股氣，真正迎頭趕上去，不是說我給你化了，還要我來化你。

三十年來已把國家觀念冲淡了

但是現在沒有這股氣。三十多年的統治，說是把民族自尊心提高了，其實走了相反的路。中國的一套倫理、精神，是相聯繫的一個整體。假如把夫妻之情，父子之情，朋友之道都搞光了，毀掉了，同時也就把國家觀念冲淡了。

過去，我們提到國家兩個字是很尊嚴的。我三九年到香港做事，在娛樂戲院看電影，最後要唱「天佑我王」的歌，我就不站起來，英國人跑過

來，一定要我站起來，當時非常反感。下午在大酒店喝茶，也要唱英國國歌，也要站起來，我也躲在角落裏，不站起來。這時都為一個民族尊嚴。現在幾十年教育的結果，這股氣好像沒有了。

□　現在的確少了這股氣，中國人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上很糟糕。

■　它實際上在鼓勵個人主義。兒子為什麼要與父親劃清界線？就是為了保護自己。夫妻也是這樣，為了保持黨籍、地位，只能離婚。個人主義與三綱五常固然有矛盾，跟集體主義、國家觀念也有矛盾。現在有些人為了評薪水，可以拚命。

□　從這幾年的情況看，共產黨內有一些人正着手進行一些改革。這些改革，您認為是因為走到了懸崖，不得不這樣做呢，還是真有一些人想到國家、民族的前途，而要作這樣的改革？

■　我對於鄧小平、趙紫陽、胡耀邦這些領導人，是從好的方面看的，我是寄以很大希望的。他們看到國家非這樣不可了。經過了二十年的磨難，應該說這幾年走的方向對頭，步子不慢，他們受到的阻力很大，有些阻力可能是我們不能想像的。因此，我到香港來跟一些朋友説，應該寄希望於他們，同時耐心的看看，給他們以時間，不要太急躁。問題是寄希望於他們還不夠，必須要有其他的條件，加以幫助，而一個民間報也是條件之一。因為沒有一個民間報作為輿論監督，作為制衡，他們走起來會更難，日久之後可能會疲沓。

□　現在難得多了，五六、五七年鳴放時打擊了人，而幹部的知識水平又很低。

■　反右、反右傾以後，誰都不敢獨立思考，不願發表自己的真意見，多做多錯，少做少錯，外行天然領導內行。誰要是多看書、鑽研業務，就是走白專道路。這一套不光害了一代人，把兩代人害了。

我們過去罵國民黨貪污、無能。現在，「貪污」至少可以換個名稱叫「特權」。當然像宋子文、孔祥熙那樣的貪污很少，特權却還是普遍的。無能也很驚人。

□　假如政府允許民辦報紙，徐老先生您願不願意出來辦這樣的報紙？

■　條件許可我還是願意的。但年紀老了，脱

離實際多年，怕不中用了。年紀較輕、有勇氣、有能力來担當的人很多，比我更恰當。

□ 精力怎樣？

■ 精力也還可以。我認為我一輩子搞新聞事業，只寫了半篇文章，後面半篇被人把筆奪走了。我在《文滙報》的時代，的確根據我自己的經驗，發展了《大公報》張季鸞、胡政之他們所走的路，在報紙的形式、編輯、言論、採訪各方面都跨進了一大步，自己有許多想法，沒有來得及搞，結果一頂帽子把我壓下來了。

一輩子搞新聞事業，只寫了半篇文章。

□ 後來的報紙水平都很低。

■ 舉個例子講，文革時候開一個什麼會議，「新聞公報」的題目居然可以跟內文字數一樣多。四人幫時開九大、十大，除了「新華社×月×日電」外，其他文字竟可以全部變成標題的。

□ 徐先生認為國內報紙應該發揮什麼作用？

■ 應該是兩方面的作用，宣傳黨的政策，反映人民的意見，這兩個結合了，這個國家也就上軌道了。民辦報紙在後一個作用上，就更多一點。

□ 國內新聞從業員的一般水平怎樣？

■ 現在能夠作一個版的編輯的，都是中年以上的。因為這幾年沒有好好培養人才。以編輯講，消息都是新華社發的，他不用考慮該不該登，也不用潤飾文字，不必考慮版面能否容納得下，也不必考慮版面好看不好看，吸引不吸引人，也用不着去了解我們過去所需要了解的許多常識。所以你仔細去看國內的報紙，裏邊常識性的錯誤，語句的錯誤，不知有多少。舉例講，有一次一家報紙，講大陸的海員到台灣去，得到台灣的接待。有一個讀者寫了一篇文章，希望台灣的人也到大陸來看看，最後引用了杜甫的詩：「青春結伴好還鄉」。他沒有想到這首詩是杜甫在安史之亂以後寫的，你把共産黨比作什麼？比作安祿山、史思明？就是這樣沒有常識。其他的亂用成語、典故，到處可以找到。

國共統治兩個時期的生活體會

□　徐老先生經歷了國共統治兩個時期，作為一個正直的知識分子，您對在兩個時代生活的體會如何？

■　國民黨對知識分子的迫害是餓肚皮，坐牢甚至殺害，或者使你沒有工作做，譬如封掉你的報館，但它在精神上沒有法子凌辱你。四六年《文滙報》被封掉以後，國民黨開始誘惑我，叫我到《申報》去當總主筆，我拒絕了，它知道我不是共產黨，也就算了。我記得報館封掉以後我到過家鄉一次，家鄉的父老很尊敬我。啊！我們家鄉出了這麼個人，有骨頭！到處是安慰我的聲音。住在上海里弄裏，居民知道我是《文滙報》的總主筆，見到我也好像肅然起敬。解放後辦報紙，明明想為人民做點宣傳工作，結果一頂帽子一戴，朋友見了面也趕快走開，不躲不行啊！他給你打個招呼，他單位裏有人給他打個報告就很麻煩。里弄裏的人也不敢和你接近，戶籍警隔一兩個月也要來看看你，儘管摘了帽也還來。家庭裏，除了我的老愛人跟我照樣友愛之外，其他的人，包括兒子，不同程度的對我另眼相看。我還算好的，沒有一個兒子去登報聲明說要和我脫離父子關係。這種精神上的凌辱，開始時一想起來就是一身冷汗。想想自己，一輩子憑良心做事情，總還是愛國的吧，一下子打成反動派，說是反黨反社會主義，過去我還是跟着你走的，你忽然說我反對共產黨，就怎麼也想不通。後來也就算了，特別是文化革命起來後，連劉少奇也說是反黨，也就無所謂了。

一個真正做賊偷了人家的東西的被抓起來，也沒有什麼，明明自己素來潔身自愛，而且東西被別人偷走了，反而要抓起來，還要掛大牌子示衆，那是很難受的。

□　您認為作為一個愛國愛民的、正直的知識分子，應該如何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

■　我看一般知識分子，對毛澤東思想的含義，實在還不明確。至於毛主席，歷史已作了評價了。不是說，動機要用效果來檢驗麼。三十年的實踐，就是檢驗一切的出發點。

□　目前在中國作一個有良心的知識分子，還

能夠做些什麼事情？

■ 現在文學還好一點，這幾年還寫出一些東西，但也受到不少壓制。

□ 海外的一些知識分子也感到徬徨。不少人覺得，你要騙騙中國很容易，真正要為國家做點事就很難。許多人有一種報國無門的感覺。

■ 我看你們還是報國有門的。作為輿論的中心，過去在上海。中國幾千年專制主義形成這樣的情況，要比較自由一點說話，只有靠保護傘，國家沒有民主的傳統嘛！二十年來更厲害。今天需要輿論監督，作為一個輿論中心，暫時還只能在香港。希望香港有幾份報紙，幾份雜誌能起這個作用。不是看你的冷眼，而是真正熱愛祖國。希望你好，抱期待、好意的態度。但你有缺點，有什麼看不到的地方，也不客氣的指出來。這樣對國家是有很大好處的。很明顯，過去劉少奇的平反，彭德懷的平反，對二十年估價不是右了而是左，都是香港首先提出來的，對國內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應該說，對鄧小平他們，也起了幫助他們掃清道路的作用。

此外，海外的雜誌報紙，除了這個作用外，還可以起一個轉口的作用，把國際上的科技文化知識，社會科學各方面的新成就、新變化，多向國內介紹，這就是說還可以起一個窗口的作用。

□ 現在即將審訊四人幫，您在最近所寫的文章中，認為如司法判決他們死刑，您堅決反對以任何理由緩刑。您覺得對這些只是執行「御旨」的人，是公道的嗎？

■ 我不同意執行「御旨」的說法。他們是利用「御旨」，篡黨奪權，要盡一切陰謀毒計，把國家搞得漆黑一團，在他們手裏，殘害屈死的，家破人亡的，受到傷害的，至少總在一億人以上。這筆帳是他(她)們自己的，推卸、抵賴不了。不處以極刑，何以平民憤，何以維持法律的尊嚴？

□ 您對中國的現狀，以及可見的將來，是否樂觀？

■ 我基本上是抱樂觀態度的。破除了迷信，從噩夢中驚醒過來，絕大多數人民的眼睛擦亮了。這是主要的。誰要走回頭路，興風作浪，必定會受到歷史的懲罰，這是大勢所趨。

□ 謝謝徐先生接受我們的訪問。

徐復觀談傳統文化與中共政局

日期：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日
地點：香港美孚新村徐復觀寓所



前言

徐復觀，字秉常，湖北人，一九〇三年生。世爲農戶。八歲發蒙讀書，十五歲入武昌第一師範。一九二七年任湖北省立第七小學校長。一九二八年留學日本士官學校。回國後，任浙江省上校參謀。抗戰時，曾赴山西參戰，後又被國民黨派往延安任高級少將參謀。一九四三年在重慶被蔣介石調往侍從室第六組工作，後又任聯合秘書處機要秘書。同期在重慶就學於哲學家熊十力。一九四九年在蔣介石資助下來香港辦《民主評論》雜誌，並開始爲《華僑日報》撰寫政論。國民黨在台灣「重組」，徐復觀沒有「歸隊」，從此脫離軍政界，鑽研學術及寫政論文章。一九五二年任教台中農學院，一九五五年任教東海大學，一九六九年在東海被迫退休後，到香港任新亞書院教授、新亞研究所教授。一九八〇年九月患胃癌，在台大醫院施手術後，曾在香港、美國療養。一九八二年二月癌症擴散，再赴台大醫院就醫。一九八二年四月一日下午五時四十分病逝。

徐復觀的主要著作有：《兩漢思想史》(三卷)、《中國思想史論集》，《中國文學論集》(及續篇)，《學術與政治之間》，《徐復觀文錄精粹》，《徐復觀雜文》(四卷，另續篇)，等等。

我在七十年代後期開始注意徐先生的文章，一九八〇年春與他結識。一九八一年三月，在他施癌症手術後回港休養期間，相約對他作一次訪問。徐先生侃侃而談，就對中共的基本認識、大陸的局面如何突破、怎樣從傳統文化中汲取精神文明，以及海外知識分子的責任等問題，作了深入淺出的發揮。就其見解而言，由於他早年的軍政界的閱歷，長期以來對中國文化的深入研究，對西方民主思想的認識，及專欄作家的銳敏，故能融冶歷史傳統、現實政治和民主理想於一爐；就其態度而言，他的坦率、誠懇和激情，使我想到他可能自份不久人世，因而要在死前作一次毫無保留的公開談話。

這篇訪問刊於《七十年代》一九八一年五月號。

□李怡：早就想當面請教徐先生，由於這幾個月讀了徐先生的幾本書還沒有消化，所以一直拖着。最近知道您要離開香港一段時間，又讀了您最近寫的幾篇文章，有一點感觸，所以特來請教。就先從我的一些感觸談起吧。我的感觸不一定是對的，但卻是誠懇的，是眞的東西，是眞實的感受，而不是為了迎合某種需要。

讀了徐先生的幾本文集以後，尤其是雜文集中的《論中共》。説老實話，徐先生這些文章發表的當時，不少愛國人士並不以為然。毋庸否認，當時我也如此。但最近重讀一遍，不能説完全同意，至少我覺得大部分可以經受時間的考驗。我在自感慚愧之餘，想請教徐先生，您在寫了這麽多年有關中共的文章後，不知能不能提出一個對中共的基本認識來，因為這或許對我們的讀者會有所啓發。

對中共的基本認識

■徐復觀：我想，一個人的思想，一個人對生活的態度，是和他的出身相關聯的。我出身在農村一個窮苦的家庭，小的時候，很少有一餐飽飯吃，在這種條件下生長的人就很自然地有一種素樸的社會主義傾向。民國十七年，即一九二八年，我到了日本，那時，日本的左傾勢力很大，我就開始讀河上肇的著作，從河上肇的著作看馬克思主義的特點。那時蘇聯有一個刊物叫《馬克思主義之旗下》，日本按期翻譯；另外有一個站在經濟立場分析世界形勢的月刊，日本也每期都譯。我們就讀這些，所以是非常傾向共產主義革命的。我對共產主義開始有點懷疑是布哈林之死，給了我一次衝擊。布哈林死後的理論權威是日丹諾夫，可是以後也被清算了，這又給我潑了冷水。

回國以後，我沒有跟共產黨走，但我對共產黨懷着一種迷迷糊糊，不很明確的傾慕的心情，佩服他們。我對共產黨持反對態度是從一九三九年開始的。那時我到太行山校閱游擊部隊，我是一個校閱組的主任。三九年時雖然國共合作，但是關係已經很不好了。我對校閱組的人説，共產黨是一種新東

西，我們不要抱着成見去看他，應當拿一種學習的態度去了解他們。在這期間我們同老百姓接觸，老百姓都反對八路軍，反對得很厲害。我對大家說，他們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我們到一個地方就住在好房子裏，好房子都是有錢人的，所以他們反對共產黨，他們不能代表老百姓的眞正意見。可是到了後來，我發現窮人也反對他們。我記得有一次我們騎在驢子上，碰到一個挑木炭的老頭子，我問他：「老人家，日子過得好嗎？」他一看我們就知道是中央派來的，叫我們「大人」，他說：「大人啊，怎樣過得好呀，這個東西不得了啊！」他不說八，伸四個指頭。我說：「看你的樣子很窮，他們不是對窮人很好嗎？」老頭子回答說：「啊呀大人，他管什麼窮不窮，簡直逼得人活不了啊！」

以後，我仔細觀察，我看到共產黨對老百姓搜括得太厲害了，中國的老百姓吃不消。共產黨那時是盡量為了擴充軍事力量，搜括得太過份了。從此，我對共產黨的態度開始轉變。雖然如此，你要是看我的雜文就會發覺，我們失敗以後流亡到台灣，我寫文章時，有很長一段時間不談大陸。為什麼呢？我看不見，看不見我是不談的。我不贊成他們的做法是一回事，但現在國家的命運掌握在他們手裏，他們到底做得怎麼樣，我不知道，所以我不談這些。偶爾寫到，我也是說，我們這一代的良心血性之士，多半在共產黨內。這個話，我不僅在口頭上與朋友談，文章中也寫過。我的意思是說，他們的做法我不贊成，以鬥爭為主的做法過火了，但他們是理想主義者，是愛國主義者，我對於他們的理想，對於他們的愛國精神，以至在這種理想和愛國精神下的犧牲奮鬥精神，我完全承認，內心很佩服。因此，雖說我不贊成他們的做法，但他們畢竟已經做了很多事情。記得一九六〇年我到日本去，看到大陸的一本雜誌，上面說北京的新貌，人民大會堂等等，我關心我們湖北的漢陽兵工廠，向人打聽，他們說現在那個煉鋼廠規模大得很，從武昌下去一直到青山，聽了我是很感動的。他們眞正為國家做的事我不能不承認。

一直到一九六九年我到香港來以後，我對於毛

先生一直保持很高的敬意，常常托夢和他在一起，我覺得他是個了不起的人物。直到文化大革命，我以一個中國人的立場來觀察，覺得這種做法很奇怪。不知道李先生注意到沒有，許多老幹部被打下去受折磨，我那時就說，這些人都是千錘百鍊的老幹部，就這樣犧牲了，我的心裏很難過。這樣，我才對毛先生起反感，你為什麽這樣對待你自己的老幹部呢？我對他太失望了，我完全不瞭解他。周恩來先生未死之前，我原諒周先生，在原諒中同情他，原諒他的處境，他的許多話，不是他的本心，所以同情他。

四人幫被捕以後，鄧小平先生出來，許多老幹部都解放出來了。解放出來的老幹部使我失望，遠超過我對於江青的失望。

於是，我慢慢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共產黨取得了政權以後，他的黨的本身變了質，而黨的變質不能完全說是毛先生的關係，是由於他們取得的政治權力太大了，把國家人民生存的一切條件都掌握了。

因此，簡單地說，我以前雖然反對共產黨，反對他們以鬥爭為主的做法，但對共產黨人，對他們的品格，他們所要達到的目標，我百分之百的承認。這個國家這麽大，我不贊成算什麽？他們成功了，就行了嘛！一直到來香港以後，我以為他們總有點什麽，他們是做了些事，但誰都知道，他們做的許多事情，根本是不能算數的，現在變成了負担。同時我也想不到，過去我所說的千錘百鍊的老幹部，他們的腐敗，我講得不客氣一點，比國民黨的老官還要腐敗。從這一點來說，權力這個東西不是好東西，他們受到了過分龐大的權力的毒化。

前幾天，《華僑日報》給我轉來一封讀者來信，是看了我寫的《正常卽偉大》之後寫的來信。從信上的簡體字看，這個人是從大陸出來的。他在信中說，共產黨應該分成現在的共產黨和以前的共產黨，現在的共產黨不是以前的共產黨。這封信提出了許多問題，這是其中的一個問題。所以我說，我心裏非常難過，共產黨因為權力的毒化而變了質，這是非常傷心的事。為什麽傷心？因為我們國家的

命運在它手裏。

□李　怡：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我們也有過一個對中共肯定的想法。因為不可否認，五十年代中共在經濟建設和政權建設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到了文革前，幹部特權和官僚主義等問題開始顯露出來了。文革爆發時，我們相信中共的解釋，即以為毛先生、周先生他們要通過文化大革命來進行一次自我改造。有了這個基本想法，就盡量從好的方面去想文化大革命，出了一件事，就想一個理由去原諒它；再出一件事，又想另一個理由去原諒它。但到後來，發覺越來越不對頭了，就很難再原諒它了。

去年十月，胡耀邦先生講了一段話，他提出了一個類似徐先生剛才提到的問題。他說，一個革命政黨在取得政權以後，它的地位就發生了變化。在取得政權之前，它是被圍剿的、被壓迫的、被打擊的、要革命的；取得政權之後，它處在領導的地位，執政以後的共產黨，很有可能從領導者變成統治者。在其他國家的共產黨身上，有過這樣的教訓，我們也要警惕自己的黨，不要從領導者變成統治者。當然，胡耀邦先生並不認為中共已經是統治者了，但事實上，他提出了類似的問題。

目前的局面必須突破

■徐復觀：我補充一點，這一個統治，與過去歷史上任何統治性質不同。過去中國的專制統治也好，封建統治也好，它對於人民，總只能統治人民生活的一部分，只能統治社會生活的一部分，因此人民、社會在統治力量所不能達到的地方，還有一些主動性。但共產黨的統治，把社會和人民的一切生活條件都抓在手上。問題的嚴重性在於過去的統治黑暗，人民不幸，但還有縫隙，共產黨的統治一旦墮落的時候，百姓就無路可走，這太可怕了。這就是權力結構的基本方式的問題，問題太嚴重了。五四運動提出科學與民主，但要在這種權力結構中實現民主，很困難。沒有民主，人民有什麽法子給你一種制約？

□李　怡：不過，經過了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有了一種反省的能力，譬如說，胡耀邦居然自己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來。應該怎樣估計他的這種反省能力？又如去年提出的「庚申改革」，提出的民主化的進程，應該怎樣看待呢？在這裏是不是存在希望？是不是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反省能力的話，就沒有希望；如果有反省能力，就還有希望在。

■徐復觀：四人幫被捕以後，有十個月沒有讓鄧先生出來。我在口頭上，文章上，都呼籲鄧先生出來。因為在他被第二次打倒了之後，在江青他們宣傳的他的罪狀中，我看出鄧先生已經有了相當的反省。所以，我對於鄧先生是最熱心的，對他寄希望最大。他出來以後，平心而論，他也表現了一種反省的認識，也採取了許多很難得的措施，情況也有相當的改善。不過，他的改革還沒有達到客觀要求的程度。到現在為止，我還在原諒他和胡耀邦先生他們。因為共產黨是個龐大的結構，它已經腐化了，鄧先生和胡先生起來改革，遇着很大的阻碍，這個阻碍假如從社會上來，比較容易突破；但從黨的內部來，就很難突破。

有個朋友到廣州走了一趟，今天上午很熱心地到我這裏來，他對我說，平心而論，鄧小平和胡耀邦提出的許多做法並不壞，但到了下面就不是那麽回事了，他們根本不理會。我問為什麽呢？朋友說，每個人都有他的特權，要是按照鄧小平、胡耀邦的說法去做，他的特權就要縮小，乃至慢慢沒有，在這種情形下，他怎會答應？

所以，現在我的看法是，我不認為鄧小平先生和胡耀邦先生的反省力不夠，我也不認為他們沒有走向民主法治的決心，現在的問題是——也許我太天眞了——我認為在目前，他們在共產黨內還是少數，他們還沒有突破這個困難，現在就要看他們怎樣來突破。我自己也反躬自問，假如徐復觀處在這個局面下，你怎樣去突破？我對朋友講，我徐復觀更沒有能力趕得上他們。不過，這個局面非突破不可，這是事實。李先生說要講眞話，我講一句眞話：這個局面不突破，可能中國要醞釀出第三次大革命。

我徐復觀快八十了，身體又這麼壞，我從來對政治沒有野心，也不會搞政治了。我這是客觀觀察得到的結論，這種局面非突破不可，不能再拖下去了。突破非常困難，但非突破不可。萬一突不破，鄧小平先生、胡耀邦先生失敗了，中國有段時間會大混亂，可能要出現第三次大革命，這是中國的極大的不幸。

□李　怡：陳雲說，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個生死存亡的問題。最近《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的文章也提出必須下決心糾正不正之風。但文章提出的做法，我覺得很難做到，比如說關鍵是要從上到下，各級幹部帶頭；領導幹部要支持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工作等等。這種講法的出發點是不錯，但其手段則仍是一種家長式的用身教、身體力行的辦法來影響其他人。如果有人帶頭了，我不辦，你又怎樣？你用什麼辦法來對付我？如果堅持只能夠通過自上而下地帶頭來改變作風，很難想像大家會自動放棄他所得到的利益。如果說鄧小平、胡耀邦先生是少數的話，這個局面怎麼突破？

從幾個方面突破目前局面

■徐復觀：我的觀察，他們還是少數。現在不搞運動是對的，但不搞運動應該有賞罰，你現在連賞罰都沒有，那怎麼行？要突破這個局面，我的想法是應該有幾條線下來。由上而下的責成領導幹部以身作則，這不是說完全沒有意義，假如領導幹部眞正能以身作則的話，我想也能發生相當的影響。這是做法之一。但僅僅靠這個辦法決不能解決問題，決不能突破。凡是一個既得利益者，他決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台。這個話共產黨經常講，現在可以用到共產黨自己身上了。

第二，言論上要更大的開放，要有輿論的力量。許多受了打擊的知識分子，他們的良心血性還在，他們的認識很深刻，你為什麼不讓他講話？所以說要發揮輿論的力量。

第三，現在提倡民主，這是最基本的東西。所謂民主就是要把人民的力量解放出來。但是在目前的權力結構情形下，人民的力量發揮不出來，這就

涉及私有財產制度的問題，涉及人民的基本權力、基本保障的問題。不允許人民有某種程度的私有財產，人民在最起碼的生存上沒有自主的力量，你有什麽辦法保障他的民主權利？某種程度上的私有財產制度，並不違反社會主義原則。

共產黨把黨壓在國家的上面，現在要反過來，把國家壓在上面。你不要口頭上說一切為了人民，你要創造許多條件，讓人民能發揮他的權力，來制約這些特權階級。這影響到政權的基本結構，所以從憲法起要大大修改。

我想，現在有許多問題可以不談，有許多問題是應該談的。可以不談的現在偏偏在談，應該談的卻不去談。譬如說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似乎就一定要爭。你爭什麽呢？現在不是擺得很清楚嗎？鄧力羣先生的不少看法是不錯的，但他也談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看了讓人笑掉大牙嘛！看了我心裏很難過。還有位先生寫文章，談湖北的水災，外國人說，像這樣的災荒，要是旁的民族，就吃不消了，但中國老百姓還在忍受。這是社會主義優越性嗎？那非洲的老百姓的忍受力比我們還要强。因此說，這是可以不爭的問題。為什麽呢？因為你現在天經地義社會主義，只要你共產黨員不當地主，老百姓是決不會出現地主，只要共產黨員不當資本家，決出現不了新的資本家。只要實現民主，這個民主，天經地義是社會主義民主。你不要爭，不要一說到民主，啊呀！你把社會主義給丢了啊！這是可以放心的嘛！

那麽，什麽問題是應該談呢？應該談我們要實現怎樣的社會主義，這才是一個眞正的問題。我們要實現的社會主義是眞正有民主的，眞正能克服目前的一個大問題——特權化問題的。

現在共產黨在講我們是有特權，但沒有特權階級。沒有特權階級特權是從哪裏來的？一個兩個特權，你說沒有特權階級，是個別現象，但現在是個普遍現象呀！我今天問我那位朋友，他們為什麽不肯放棄特權呢？他說，那怎麽能放啊！我如果是個小幹部，這個小地方歸我領導，有好的東西我先買到，就這麽點權，怎麽能放？比方我光管賣猪肉，

猪肉歸我管，好的猪肉歸我買，好的猪肉歸我的家屬買，好的猪肉歸我的親戚買，歸我的朋友買，特權就是這樣的嘛！

我的這位朋友不講假話，他是廣東人，到廣州去了好幾次，他說現在廣東的農村的確比過去好，分田收了效果。分田就是你沒有所有權，但你可以盡力去種，收多了歸你自己。朋友說廣州的市面還是一蹋糊塗，但農村比去年好得多了，老百姓有飯吃，好多了。所以，鄧先生說八億農民生活比過去好，這個話是有相當根據的。問題就在上層的統治結構擺在那裏，你怎麼去突破，怎樣前進一步？這就是從權力結構到經濟制度的問題。我的想法是，確立農民的某一個程度的私有土地制度，也確立其他方面某一個程度的私有制度，是實行民主的最基本的條件。

現在我是個寫文章的人，我在香港，想怎麼寫就怎麼寫，我罵大陸的人，說你們為什麼這麼不爭氣！可是想假如徐復觀在大陸上，一個領導幹部的白眼珠子一翻，你就不知道你的命運前途怎麼樣了，你那枝筆怎樣硬得起來？所以，一個人他自己能掌握到他自己的生存權利時，至少能掌握幾分之幾時，他才硬得起來，在這個前提下，你講民主才有實際意義。過去大家笑小資產階級，笑某個人的作品是代表小資產階級意識的，老實說，中國文化哪裏不是在小資產階級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沒有小資產階級就沒有民主，甚至可以說沒有文化，沒有文藝作品。李先生你現在辦《七十年代》，辦得有聲有色，要是你在大陸，你能不能辦得這樣有聲有色？

□李　怡：這個問題我在去年的文章中也曾經提到過。我們去年訪問徐鑄成先生，他也提到保護傘的問題。要靠洋人的保護傘，才能發揮輿論的作用，這是很使人痛心的事。但我們也不能不承認這個現實。

最近一段時間，中共强調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外，還提出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要學習雷鋒，宣傳「五講四美」（講文明、講禮貌、講秩序、講道德、講衛生，心靈美、語言美、行為美、環境美），提

出要建立高度文明的社會主義强國。我想請教徐先生，這些東西哪些是應該講的，哪些是不該講的？

■徐復觀：我只認為學雷鋒大可不必，其餘的都是應該講的，不過都講得不夠，沒有從根本上講起，講的深度不夠，等於是醫生看病，只給阿斯匹林，沒有進一步的檢查病源。雖然不夠，但提出來總比不提出來好，做總比不做好。

□李　怡：有人覺得這還是有一種老子教兒子的味道，什麽都是自上而下地推行。但是上樑不正下樑歪。沒有自下而上的民主的推動，單靠自上而下地提倡學雷鋒，搞「五講四美」，而上樑又不正，試問怎麽可以推動得起來？

■徐復觀：我們現在談問題，要考慮到現實情况。在現實的權力結構下面，由上而下的做法可以發生若干的影響。因此，在現實的情况下，我原諒他們。考慮到現實的情況，由下而上，他們怕亂。應該是由上而下，由下而上結合在一起。我們可以說由上而下不夠，不必過份責備。少了點，再有其他手段補充就好了。

從傳統文化汲取精神文明

□李　怡：徐先生最近寫的文章《正常即偉大》談到精神文明的問題，意思是說，應該用傳統精神文明的精華來代替中共現在提的某些口號。我想提出來的問題是：受了幾千年中國文化陶薰的中國人，為什麽還有這麽深的劣根性？

■徐復觀：這是個常常遇到的問題，一切問題，站在共產黨的立場講，是經濟制度的問題，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問題；站在中國文化的傳統講，就是人的行為的問題。在這個時代，人的危機就是人的行為的危機。人的行為就牽涉到道德的問題，你的行為到底道德不道德。有一部書，大陸好像翻譯過，叫《愛因斯坦的晚年思想》，這部書有兩點可以一提。第一點，說我們要談道德，一定要和傳統發生關係，道德不道德，當下很難作判斷，常常要在歷史中才能得到正確的判斷。舉個很簡單的例子，毛先生在世的時候，他一句話的權威，你能說他不道德？但時間一過，你就能說他這句話不道

德。傳統就說明一個歷史的判斷，經過歷史的判斷，哪種行為是道德的，哪種行為不道德，雖然沒有絕對性，但大體上是可靠的。

第二層意思，愛因斯坦說，道德不道德主要見諸行為，道德的意義要見之於行為，要對人發生影響，還需與自己的血肉相關，才比較容易發生影響。們傳統這個東西是和我們血肉相關的。如果說，和我血肉相關的、有意義的東西，對我不能發生影響，而偏偏是與我們血肉不相關的東西才能對我發生影響，我想這種可能性很小。一個人，父親說的好話他不聽，在外面人家說的好話他聽了。是有這種情形的。但到外面聽了人家的好話以後，他應該想到，我父親也說過這樣的好話。假如一個兒子，凡是他父親說的他都反對，只接受外面的，這個人的心理就不正常。

第二點值得一提的是，愛因斯坦有一次在對一些科學家的講演中說的一番話。他說，你們大家在科學上的輝煌成就我都知道，但是，我們的科學再有多大的成就，也只能說某個東西是如此如此的，不能夠說應當如此或不應當如此。現在就是在應當不應當上發生了問題。在這個地方探索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們的先知的智慧不知道比我們高多少。

我對猶太教沒有研究，猶太教的先知們說了些什麽，我不知道，但我想，愛因斯坦是信猶太教的，猶太教和他血肉相關，所以他在猶太教中得到一種新的啓發，對於他可以發生作用，對於我們就不能發生作用。這並不是我有排斥性，我們平心靜氣來講，把《四書》上講的話和《新約》乃至其他書上講的話來比較，還是《四書》上的話更眞切，流弊比較少。這麽多年來，一談到中國的好的，大家都不服氣，要拍桌子，要罵起來，我不理解。中國有這麽好的文化，為什麽幾千年來，還有劣根性去不了？這牽涉到一個哲學上的問題，姑且不說。孔子講過一句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論語．衛靈公》）這就是說，他所講的道，口裏說出來，用筆寫下來，但這個道有什麽辦法可以拴到人身上去，鑽進人的內心去，使你能接受，能夠「弘大」你？道並不能弘人，是人能弘道。你相信它，你實

行它，道的價值就顯出來了。有人相信、實行它，它才出現，不然，那它是潛伏的。孔子的道在《論語》這本書上，它與我有什麼關係？沒有什麼關係。但有句話對我發生很大的影響，如孔子說「以約失之者鮮矣！」（《論語．里仁》）他說一個人以收斂的精神去行事而犯很大錯失的少得很（「約」是驕奢的反義詞）。這句話我相信了，在生活中一想到它，就覺得很有意義。寫在書上的就這麼幾個字，我相信它才有意義。

另外還有一個歷史現實的問題。我認為專制政治不是儒家建立起來的，專制政治有兩個來源：一個來源於人的權力慾望，天下拿到手，我就要專政，把權捏在我手上，這出於人的慾望，它不需要什麼文化。其次，若要說學術幫助了權力慾望，那是法家，法家尊君抑臣。先秦儒家沒有講過尊君，總是講仁。董仲舒尊君，那裏面有許多出入。董仲舒講抑民而尊君，抑君而尊天，而天是以孔子的《春秋》作代表的。《春秋》講什麼？講仁，講義，講對人民好。漢武帝接受了前面的（抑民而尊君），不接受後面的（抑君而尊天）。所以，作為一個思想家，董仲舒也不像我們想的那樣簡單，他的用心還是好的。

專制政治靠軍隊、監獄來支持。在專制政治下，讀書的儒生用什麼力量來跟它抵抗？西方還有一個宗教團體，中國有什麼力量可以與專制權力相抗衡？因此，我們看中國的歷史，要分辨哪些東西是由專制政治造成的？哪些是由儒家思想造成的？儒家思想被專制政治利用到什麼程度？專制政治怎樣利用儒家思想？一定要把它分得清清楚楚。

中國有一個世界第一，專制規模之大是世界第一，任何民族都沒有像中國這麼大的專制規模，專制之長二千零二十年。但在這麼長的專制中間，有時還出現一個小康的局面，人民還能得到有形無形的庇護，是什麼東西呢？還是儒家的思想。我們還要想一想，世界上許多古老的民族已經沒落了，巴比倫、埃及、印度，都沒落了，只有中國這個古老的民族，衰而興，亡而再起，只有這個民族一直相傳下來，一直支持到現在，你能說這是政治的力量？

政治上這兩千多年中黑暗的太多了，太可怕了，但中華民族相傳下來了，這是偶然的嗎？這中間不是儒家文化的力量又是什麽呢？

統治者中開始知道要利用儒家文化的是漢武帝，但他口頭上是儒家，做的卻是法家那一套。漢武帝以後，漢朝政治衰微，但漢朝的宣帝、元帝、成帝，直到哀帝，是中國歷史上在朝廷上的人才最盛的時候。東漢時，漢光武把宰相的職位空了，由尚書當政，尚書等於侍從秘書，在這種情形下，外戚宦官必然就崛起，外戚宦官就一定要兒皇帝，因為兒皇帝好控制，所以東漢第三代以後都是兒皇帝。兒皇帝一直延續到漢獻帝，曹操的力量那麽大，還不敢把天下奪過來，那就因為朝廷上有人才。儒家文化在漢朝發生了很大的影響，在那樣專制的情況下，儒家緩和專制，為老百姓講話，在朝廷上主持正義。到了唐朝，唐朝是三教，佛、道、儒，唐朝相信儒家的只有陸贄、韓愈。宋朝儒家又再起來。所以說，在朝廷上人才最盛的是兩漢，在社會上人才最鼎盛的是宋朝。大家罵宋朝的理學家，理學家發生將近一千年的影響，他們有什麽政治地位？完全講學而已，他憑講學發生一千年的影響，難道他沒有眞的東西、眞的精神在裏面？

專制政治利用儒家的另一種形式是科舉制度，科舉最下流一步就是八股，這就完全是來腐化儒家的。而反對科舉反對八股最厲害的還是理學家，朱熹、陸象山對科舉痛恨極了，說我們這些知識分子連盜賊都不如。但他們還是要去考，在那種專制之下，沒有辦法，由此也可想見專制的力量有多大。

我原來也是反對中國文化的。在重慶時代認識熊十力先生，聽了他的話，我才不反對中國文化，但我並不相信。我並不是不好學的人，我常常看東西，常看日本的、西方的東西，我不反對它們，也不恭維它們。到了台灣以後，我常常想，國民黨哪些對哪些不對？最根本的就是人發生了問題，把這些人的行為與孔老夫子的話比一比，孔老夫子的話的鞭策力量太厲害了。同時我也常常摸索西方文化，看愛因斯坦的，看哈佛大學的索爾根的，從這些人的言論中，我發現西方也追求一個新的東西，發覺

他們的文化也在人的方面發生了問題，在人的價值上發生了問題。他們追求，追求到邊緣就停止了，再也追求不下去了。可惜他們不知道中國文化，說句老實話，他們所追求的，實際上就是中國文化，就是儒家之教。

舉個例子說，愛因斯坦說宗教對於人的行為有決定的作用，但宗教的定義怎麼下呢？他說所謂宗教，只能說是宗教精神，何謂宗教精神？一個人到底為自己打算得多些呢，還是為人打算得多些，假如你為人打算得多，為自己打算得少，你就是宗教；假如你只知道為自己打算，不為他人打算，你就是反宗教。愛因斯坦所說的宗教，不就是一個「仁」字嗎？所以說，他們所追求的，再向前一步，就是中國的儒家文化。

這樣一來，我才相信了儒家文化。我在學校裏開《論語》課，共開過三次，每一次我都是以感激的心情來講課的。

經過了文化大革命，我們可以把許許多多的情形與孔子所說的話來作一比較，就應該引起我們深刻的反省。為什麼我們自己有聖人擺在那裏，而要糟蹋他呢？要污辱他呢？

王陽明有兩句詩說：「拋卻自家無盡藏，沿門托鉢效貧兒。」

大陸現在也在責《聖經》，《舊約》不再說了，就把《新約》中有意義的話取出來與《論語》中有意義的話比較一下，哪個講得好些？我們為什麼要把自己的東西湮沒了？

我還敬重毛先生的時候，我常說，毛澤東要為中國的窮人翻身，我們應該為中國的文化翻身。不要說它過時了，應該針對自己的生活，針對社會的生活，針對我們遇到的最基本的問題，去了解中國的文化。

儒家輕視等級與權勢

□李　怡：中國的專制社會有一個特點，就是把封建的等級觀念在人格上延伸，職位高的人，人格也就高些，道德好像也就高一些，講的話也重要

一些，這與儒家的倫常觀念有無關係？

■徐復觀：這完全是與儒家相反的。本來等級的觀念是哪一個民族都有的自然發生的觀念。最早，「君子」是指貴族，「小人」是指老百姓；到了孔子《論語》裏，有一部分還是傳統的概念，但絕大多數的「君子」是指品格好的人，品格壞的人才稱「小人」。所以他說：「君子哉若人」「尙德哉若人」。學生問他何謂君子時，他完全從品格方面解釋；孟子說：「人皆可以為堯舜。」這是要從人性上講人的普遍的性質，人的普遍的性質——人性是相通的，是沒有差別的，所以孔子說「有教無類」，孟子說「性善」。性善之說，這是人的平等的最基本的條件，是了不起的。儒家的主流是立足於性善的。有人說荀子主張性惡，但應該了解，荀子主張心善，他主張性惡，但他認為心是善的。

人的本質是平等的，是善的，所以有無限的前途，所以人與人之間可以互相了解，互相合作，所以投票時多數可以信任。因為人性是善的，所以一切事情都可以由人自己的力量來達到。

在一個眞正儒家的心目中，權勢是一文不值的，所以孟子說：「說大人則藐之，無視其巍巍然。」有一個人叫公孫衍的對孟子說，蘇秦張儀豈不是大丈夫嗎？孟子回答說，什麼叫大丈夫？「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為大丈夫。」這是儒家的基本態度。蘇秦張儀呼風喚雨，在儒家看來，算得什麼，值得什麼？

我們中國有兩千多年文化，為什麼現在的社會上變得這樣？但在農村就會感覺到人情味很濃，在農村所感受到的人情味，比都市好。

中國有句老話：「禮失而求諸野！」這就是說中國文化在社會上的滲透。文化大革命以後，傳統的文化在農村上也保存得不多了。

中國的專制時代，有幾樣東西是大家一致承認的。如政府應該愛老百姓，愛民；做皇帝的應該「受言納諫」，受言納諫的是好皇帝，不受言納諫的是壞皇帝，為人臣的要正直敢言，敢說實話的是忠臣，阿諛奉承的是奸臣……這些大標準一直都存在，不論怎樣黑暗的時代，它們都在起作用，無形

中，對社會向黑暗的墮落多少會發生一點制約的作用。你殺諫臣總是壞事，忠臣一定講實話。如果按照中國傳統的觀念看，文化大革命中爬上去的人，都是阿諛奉迎之輩。

文化的生命在對現狀的作用

□李　怡：那末，應該怎樣把中國精神文明中的正面的東西，能推動中國的進步的東西，注入到社會教育中去呢？

■徐復觀：這主要靠共產黨的領導對它有基本的了解，他要在這方面表示一個明確的態度，風氣就轉了。現在沒有別的辦法，不能不從上而下了。領導者如果沒有明確的態度，下面的不敢碰、不敢沾哪！因為一沾一碰就觸霉頭。你看現在出版的古籍，都是些名士清客的不三不四的東西，有份量的就不敢沾。

□李　怡：你看他哪些不敢沾？

■徐復觀：現在印得最多的是明清之際的，而明清之際眞正有份量的如顧亭林的，黃梨洲的，王夫之的，這些都是了不起的，他們不敢沾，為什麽呢？因為這些人講的話，拿來和現狀一對照，好像是在罵現狀的，沾上了怕觸霉頭。

文化有沒有生命，就看它對現狀還能不能發生一種批評、鼓勵的作用。文化對現狀不能發生批評、鼓勵的作用了，這個文化就沒有生命了。孔子說「過則勿憚改」（《論語·學而》）。現在大陸上多少幹部有了過就是怕改。孔子說「德不孤，必有鄰」（《論語·里仁》）、「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論語·子罕》），這是鼓勵的話。李先生你也算「德不孤」，我們也等於做了鄰家。

在文化大革命的暴風雨中，就知道哪些人受得考驗，哪些人受不得考驗。在海外的知識分子，你有自由，有知識，但大家把這十年以來所講的話擺出來看一看！李先生你不同，你在那個框子裏面，不容易了解，所謂「不識廬山眞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但是其他一些知識分子站在旁觀者的地位，旁觀者清，你講那些無聊的話作什麽？老實講，他

口頭上愛祖國，實際上愛權勢。你愛祖國人民，你願意不願意在那種情況下去生活？你願意，我佩服你，你不願意，又要去恭維，那算什麽？「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你自己不願意的，要去歌功頌德，叫老百姓去接受。所以說老實話，毛先生整知識分子，我有百分之七八十是同情的，中國的知識分子應該整。不過他整的方式不對，因為整知識分子而把知識也否定了。中國知識分子最缺乏的是人格，你還使他們更沒有人格，那怎麽行！

□李　怡：海外知識分子，也不見得都是旁觀者清的。過去，許多人主觀上希望見到自已祖國的美好，加上短期旅行所受到的刻意安排的接待，以及中國新聞報道一貫以來的報喜不報憂的作風，是使許多人受騙並作了一些違反事實的報道的主要原因。我知道不少人正在反省。而作為《七十年代》的編者，我這幾年也是不斷反省的。至於談到人格問題，我想，一般說，知識分子應該對中國文化了解更多些啊？

■徐復觀：這就不怪中國共產黨了。就中國的學術講，近百年來，能眞正了解中國文化基本精神的，你數得出幾個來？

所謂中國文化的精神，就是中國文化所發現的人生的價値，沒有幾個人能眞正了解。這不能怪共產黨。不過共產黨在受了這麽大的教訓，遇着了這麽大的困難後，他應該反省到中國文化身上。

□李　怡：在台灣的知識分子，恐怕對中國文化有眞正了解的也不多。當年徐先生在台灣對於中國文化的呼籲、抗爭，針對着胡適學派和全盤西化論，也是比較孤立的吧。似乎在你們爭論得最厲害的時候，國民黨也沒有表示過態度。其後大陸上開始文化大革命，提出了反四舊，這時台灣才針對着大陸的反四舊，提出復興中國文化。這也就是說，並不是他們認為中國文化有意義，要來復興，而是作為一種政治鬥爭的手段。倒是在文革前的大陸上，劉少奇還𢡟過孔子，還整理了不少東西出來。

■徐復觀：假如不是文化大革命，大陸的知識分子也許會走出一條路來的。不知道李先生注意到沒有，鄧拓他們這些人，在三十年代都是反對中國

文化的，但到五十年代他們就不反對了。

海外知識分子的責任

□李　怡：中國政治的基本問題，還是專制的問題，徐先生您認為專制傳統的主導的意識形態是什麽？

■徐復觀：專制的一個特徵是以血緣為決定權力的因素，所以有宦官外戚，誰接近皇帝誰就有權，權力的最基本的構造是血緣。

□李　怡：最後請徐先生談談海外知識分子的責任問題。在《論中共》一書中，我看到徐先生在寫給黎廷瑤的信中，談到怎樣把國家的前途注入自己的精神中去，發揮一個愛國的、有良心的知識分子的責任問題。説實話，這是件很困難的事，特別是在香港和海外，受工商社會的影響，功利主義思想是起主導作用的。在功利面前，要盡到責任，對大多數知識分子來説，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事。

■徐復觀：這要從兩方面來看，一是從知識分子本身看，他們在長期的科舉制度影響下，崇拜權勢，有奶便是娘，把「以天下為己任」的基本價值觀念完全丟掉了。你說他們受工商社會的影響，這個評價太高了，近代輿論主要是市民階級發的。問題就在傳統知識分子失掉了這種基本的價值觀念，你有權勢我就恭維你，你無權勢我就瞧不起你。海外和香港的許多知識分子都是如此。這些人你要他眞正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來為國家用腦筋，發揮言論的力量，是相當困難的，尤其是讀中國書的，在不知不覺中受到科舉制度的毒害太深。

另一方面是在共產黨方面，最基本的問題是：你要愛國首先要愛我共產黨，你不愛我共產黨就是反革命，就不能算愛國。那我現在問，你做得一蹋糊塗，我並不愛你共產黨，我只愛國家，這樣算不算愛國？所以說，一定要把國放在黨之上，黨有功有過，國無功無過，一切的罪惡不能說是國家的罪惡，一切的錯誤不能說是國家的錯誤。不論國家怎麽樣，我愛國是問心無愧的。國家越困窮我越愛。現在你把黨放在國家之上，先愛我，你才算愛國，

我愛你愛哪一點呢？

共產黨還缺少一個人格的觀念，你抗拒我，你就罪大惡極。這就把人格的觀念拋棄了。假如我得了天下，你原來是我的敵人；我想，我打天下時，你不向我投降，這個人人格不錯，為了要我所用的人也有這種人格，我提拔你，重用你。共產黨不同，凡是有點抗拒性的，一定要把你整得死去活來，把你的人格也完全破壞。人格在政治上就是立場的堅定，可以經得起風浪，可以做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你否定人格的觀念，你要的人就是「墻頭一棵草，風吹兩面倒」的人。海外的知識分子怎樣報國？眞正報國的人一定是有人格的人，一定是有所為有所不為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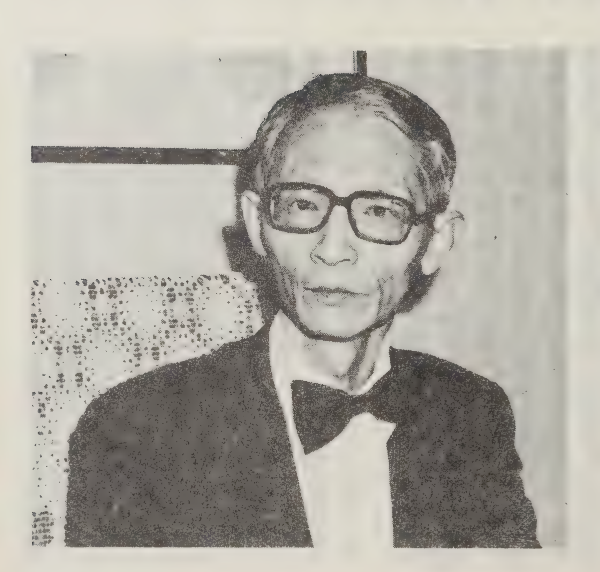
西方講民主要有反對派，可中國人出了一個特別的名詞，叫做「友黨」、「與黨」。中國人好聰明，這是中國的民主在政治上的一個很大的發現。「友黨」，實際上就是小老婆，小老婆還夠不上，是外室，可憐得很。

我希望鄧小平、胡耀邦先生不要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要有勇氣，反省到基本的問題上來。從基本問題那裏解決起。我對鄧小平先生、胡耀邦先生所寄予的希望，比哪個都迫切。我與他們無一面之緣，我為了國家的前途，不希望第三次大革命的出現。

□李　怡。中共最近又重提愛國主義，《人民日報》發表特約評論員文章：《愛國主義是建設社會主義的巨大精神力量》，看來中共是想以愛國主義作為人民的精神支柱，不再强調遙遠以至有點渺茫的「共產主義理想」了。在這時候，徐先生提出上述關於愛國家民族的意見，是值得深思的。本來在這個問題上還應該向徐先生深入討教，但我想我們就擱徐先生的休息時間已經太多，訪問就到此告一段落吧。希望徐先生秋天回港時，有機會再次向你請教。

勞思光談中國的困境與出路

日期：一九八一年九月九日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
教職員聯誼會



前言

勞思光早年在北京大學及台灣大學研習哲學。其後在美國哈佛大學作訪問研究，並兩度任普林斯頓大學客座研究員。訪問時任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教授。

勞氏自五十年代起，即致力於中西文化問題及中國問題之研究，先後在《民主潮》、《祖國》及《展望》等雜誌發表論文，逾百萬言。學術專著方面有《康德知識論要義》、《中國文化要義》、《存在主義哲學》、《歷史之懲罰》等書，皆關涉中國出路問題。一九八一年與中文大學師生合辦《尚智叢書》，出版《中國之路向》。

一九八一年，勞先生接受我的訪問，就中國局勢的基本問題，中國歷史的困境和出路等等，作了條理清晰的發揮。訪問結束時，我也就《七十年代》的路向，回答了勞先生的詢問。

當前局勢的幾個基本問題

□問：勞先生大概有好久沒有在公開的報刊上發表言論了。最近看了勞先生兩篇文章和新出的書《中國之路向》，不少人都有勞先生東山復出之感。

今天我們的訪問，想集中在中國的路向問題。初步設想是分兩個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想就中國當前局勢的幾個具體問題，聽聽勞先生的意見；第二部分是就勞先生過去發表過的文章，談談中國近百年來的歷史的困境與出路，希望勞先生能作一番通俗的解釋與發揮。不知勞先生意下如何？

■答：可以。我們先談第一部分的問題吧。

□問：我們想先請勞先生評論一下中共最近「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的問題。近幾年來，中國大陸無可否認是逐漸走上「自由化」和「民主化」的道路。人民對過去幾十年中共政績的不滿，中共的有限度的言論開放，使一些敏感的作家在一九七九、八〇年間寫了不少突破以往「禁區」的新寫實主義文藝作品，哲學和社會科學界也有對過去奉為經典的理論提出衝擊，中共領導層也出現了一些民主改制的設想和方案。與此同時，民間的青年民主派則在過去兩年湧現了一些雖不被官方承認、但理論本身卻顯得相當結實的文章。然而，這民主化或叫自由化的潮流，最近卻受到了明顯的壓制，如拘捕民刊的負責人和青年理論家王希哲，批評作家意圖否定一黨專政的所謂「自由化」傾向。這種改變，您認為是不是意味着中共要從三中全會前後的言論較開放政策後退？究竟我們應該怎樣去理解中共的「反自由化傾向」？

■答：最近中國大陸上對「言論」與「文藝」兩方面的鎭壓，確實有一步步加强的傾向。不過在我看來，這並不是一種突變。事實上，中共領導層不論屬哪一派，大致上都反對所謂「自由」。我記得在鄧小平復職不久，還正鼓勵「大字報」的時候，他就曾經對某個外國記者表示態度，說他並不贊成文藝的「自由化」。一向只會跟着共產主義教條

去思考的人，大概都不很了解所謂「自由」的正面意義，鄧小平和目前當權的其他領導人，自然也不例外。所以，一般地講，我覺得中共不能容忍「言論」與「文藝」方面的「自由化」，不是什麼值得驚詫的事。不過海外有些人（尤其是美國人）在文革派失敗的時候，誤以為反文革的鄧派會主張「自由化」，所以最近看見「白樺事件」等等，就很容易感到失望了。其實若是了解共產主義運動的特性，根本上就不會在這一方面對中共有這種奢望。

□問：一般人對於鄧派或許期望確是過多一點，不過，事實上鄧小平對貼「大字報」和寫「傷痕文學」等等也曾經採取過容忍甚至鼓勵的態度，例如他曾在一九七八年底對外國記者說，貼大字報是憲法上規定的公民的權利，政府無權干涉。一九七七年他復出時甚至還表示過，如有人貼他本人的大字報，千萬不要壓制。一九七九年底他在文代會上發言，表示作家寫什麼，怎麼寫，黨的領導人不要橫加干涉……。這是不是為了平衡反對勢力而不得不採取的妥協措施？

■答：這種想法我也常聽人提到。可是，我覺得這裏恐怕有一種誤解。鄧小平復出的時候，的確對「大字報」和「傷痕文學」，不僅容忍，而且還有種種鼓勵的表示。但是，那實在只有策略意義。說明白些，我覺得當時鄧這些作法，都是為了打擊「四人幫」勢力而已。在中共統治下生活過的人大半都知道所謂「運動」是唯一可以發洩怨憤的機會，因為一有「運動」，人們就可以把種種壞事揭露出來，都加在這個「運動」所「批」的對象頭上；平時就不行，說了就有罪。鄧小平容許人民貼大字報，容許作者寫「傷痕文學」的作品，也仍然不外是這種傳統手法。他用這種手法去推動反「四人幫」的運動，表面上似乎給了人們一點自由，但是實際上他並不是對「自由」有什麼興趣。相反地，像鄧這種老共產黨人，早就習慣於把「自由」看成一種「壞」事了。

□問：你是不是說，共產黨一定把「自由」看成壞事呢？

■答：我正是這個意思。

> **「自由化」在思想和制度方面，都會排斥「獨佔」。如果思想言論能夠自由，自然會讓人們發現眞理的多面性；如果在制度上保障自由，那就更會影響黨的唯一權威地位。**

□問：我想，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目標，應該是使人類從必然王國進步到自由王國，是逐步地使社會上的人成為「眞正的人」、「自由的人」。很難想像，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人會把「自由」看作壞事。您能不能給一點解釋？

■答：這是很容易解釋的。共產主義運動基本上就有一種强烈的「獨佔」要求。在思想觀念上，他們要以自己的主義、教條作為唯一的「眞理」；在制度上，他們要以自己的黨作為國家人民的唯一「主人」。這種「雙重獨佔性」是共產黨人的共同信仰，也是不能違背的最高原則。現在一談「自由」，在思想和制度方面，都會排斥「獨佔」。如果思想言論能夠自由，自然會讓人們發現眞理的多面性；如果在制度上要保障自由，那就更會影響黨的唯一權威地位。這些道理都很明顯，是不是？

□問：您的意思是不是說：從共產主義運動的實踐來看，「自由化」根本是不能容忍的？

■答：不錯。「自由化」進行到某一程度，顯然會威脅共產黨的領導地位。鄧小平不是要「堅持」馬列主義和「專政」等等嗎？他怎能眞正推動「自由」呢？

□問：然而，也有人從中國目前的現實狀況來看，認為中共最近不斷强調「四個堅持」，强調維護黨的「領導」，是「理所當然」的。您對這方面有什麽看法？

■答：這就要看所謂「當然」是什麽意思了。如果只是「自然」或者「不足為奇」的意思，那是可以說的；不過這裏卻決不能含有「應該如此」的意思，更不能由此推出「可以贊成」的意思。譬如說，一個黑社會的頭子，縱然無惡不作，也會很「自然」地要「堅持」他的地盤，保持他的勢力；我們可以說這是很自然的，不足為奇。可是，這並不表示我們就贊成他的想法，更不能因為黑社會頭子

自己會很「自然」地「堅持」他的想法，就認為別人「應該」繼續受害，不能反對他。我想這點道理是很清楚的，本來也許不用多說。但是當某些人談到中共堅持「領導地位」而說是「理所當然」的時候，卻容易誤導人們產生一種錯覺；覺得既是「理所當然」，就不能反對了。那就成為一種思想上的混亂，使我們不能反對任何壞事或者壞勢力，甚至只能作幫兇一流了。

□問：這種毛病確實是有的。但是，假定我們思想很清楚，不犯這種毛病，我們對於中共當局「堅持」他們的「領導地位」，又應該怎樣看法呢？

■答：上面說的毛病，是思想上的毛病。如果談到確定的看法，就要涉及實質問題。我們不能只靠思想上的澄清來建立具體的看法。對於中共當局堅持所謂「領導地位」，我也覺得，對他們自己說，這是很「自然」的。不過，我們是否有理由贊成，卻是另一回事。一個統治勢力，是否應該據有「領導地位」，不是由他們自己是否「堅持」來決定，而要由他們的統治成績來決定。這就是所謂客觀標準。要討論中國人是否應該支持中共這個統治勢力，必須從客觀標準着眼；而不應該將中共自己的主觀願望（如「堅持領導」之類）扯進來，弄混了問題。

□問：如果根據成績來看中共是否應該領導中國，我們是否會得到一個反面的結論？最近，中共當局如鄧小平本人，似乎也承認中共的領導成績並不好，可是不但他們自己仍然「堅持」要「領導」下去，海外很多人也有類似的論調。他們的論據是：中國只能由中共領導，因為另外並沒有一個可以取代中共的勢力。您認為這種說法能夠成立嗎？

■答：如果這個說法成立，一切專制的統治勢力就都不能改變；因為，在任何一個專制的統治勢力下面，總不會又容納一個可以取代自身的現成勢力；相反地，每一個專制勢力一定盡全力摧毀一切異己的力量。但是歷史上的專制勢力，依然一個個倒下去了。這是歷史的事實，對不對？老實說，用「是否有一個現成的可取代中共的」來作標準，來決定我們是否應該反對中共，又是一種思想混亂的

表現。我們對於一個現實上的統治勢力，是採取支持或是反對的態度，是根據我們對它的「評估」而定。而是否已經有可以取代它的勢力存在，則屬於「觀察」的範圍。「評估」與「觀察」根本是兩回事。倘若我們「評估」一個政府或一個執政黨，覺得有客觀根據說它的領導是對人民及國家有益的，我們縱然「觀察」到許多現成勢力的存在，仍然有理由支持這個政府或政黨；反過來說，如果我們根據客觀成績來「評估」一個政府或執政黨的時候，發現它的領導把國家弄得一塌糊塗，使人民生活陷入痛苦，社會風氣墮落不堪，則縱使在「觀察」一面，看不見任何可以取代它的勢力，我們仍然應該反對它，應該追求大改革。歷史上許多暴虐無能的統治勢力，都是因為不得民心而崩潰；而崩潰的過程正與新勢力的成長過程同時進展。如果說，必須有一個已成形的新勢力，然後纔能反對惡劣的統治勢力，那就會永遠不能開始反對了。有反對暴政的努力，纔會形成新勢力；如果要等待有新勢力纔開始反對，那就將問題弄顛倒了。或許持這種論調的人，認為沒有可取代暴政的新勢力，反對也不能有效果；但這是與歷史事實不合的。歷史的實況是：先有了反對暴政的努力，然後方能形成新勢力；並不是要等待新勢力出現纔去反對暴政。進一步看，你說的那種論調，本身就是一種不通的說法，不僅是不合事實而已。你試想想：要有新勢力纔能反對現勢力，而如果根本不作反對努力，新勢力又不會有；豈不是顯明的觀念循環？這作為一種語言上的把戲，也許有些趣味；但是，作為一個論點看，就簡直全無意義了。

□問：我們現在就撇開這種論調，來看中共的領導問題罷。中共的領導成績實在不能算好；依您的意思，中國人是應該反對這種領導了。那麽，您所說的「反對的努力」，是不是意味着一種「革命」呢？

■答：「革命」這個詞語帶有很多雜亂的意象，我近年很不喜歡用這個字眼。

□問：但是，有些研究中國問題的人，確實提到這「第二次革命」、「第三次革命」一類的詞

語；甚至有人構想一種「軍事政變」——那是更具體的推測了。您認為這種「革命」的可能性怎樣？

■答：要答覆這種問題，首先要澄清許多有關的觀念。例如，所謂「革命」本來有「狹義」與「廣義」兩種用法。通常一說「革命」，人們就會想到破壞，戰鬥，屠殺異己等等，事實上這都是「狹義的革命」所帶來的意象；而且從這裏又生出另一些朦朧意象，例如放縱、反秩序、反諧和等等，也都被人看成屬於「革命」的。其實這些意象大致都與「革命」的正面意義距離很遠。但另一方面，事實上嚮往「革命」的人又每每正是沉醉於這些意象之中。因此，我們一談到「革命」，首先就得在用語意義方面費很多力去做澄清工作。倘若取廣義的解釋，凡是涉及制度與社會結構，甚至思考、信念等等的大改革，都可以稱作「革命」。這就和狹義的解釋很不同了。甚至就「廣義的革命」說，也有許多產生誤導作用的意象。例如，一說到制度的改革，人們很容易以為制度上有了「革命」，一切就會翻轉過來；於是現社會中自己覺得受了壓迫的人，總以為一有了「革命」，自己就會「翻身」了。其實，如果「革命」指制度的改革變化，那麽，怎樣變法完全不能由「革命」這個字眼來保證。這都是牽涉意義澄清的麻煩問題。總之，這種問題隨便談談，自然可以；如果要談得深入精確，恐怕就不是幾句話可以得到結果的。

□問：我們在今年三月訪問徐復觀教授時，他提到，中國目前的困難局面已到了非突破不可的時候，如果這局面不突破，中國會發生第三次大革命。對於他的這個看法，我們聽到了許多不同的反應，我想請勞先生談談這個問題。

■答：這裏實在牽涉到幾個不同的問題。第一：目前中國局勢是不是必須有一種突破的發展？第二：事實上能不能達成這種突破？第三：所謂「突破」的確定意義是怎樣？第四：倘若不能達成「突破」，是不是會發生「革命」？這都是不同層面的問題。

關於第一個問題，我原本就認為中國與中共現在都是在「困境」之中；既然是「困境」，當然需

要某種「突破」了。不過，我們要求的「突破」，事實上能不能達成，就首先牽涉到所謂「突破」究竟包含些什麼實際內容(這是上面說的第三問題)；倘若「突破」是指根本制度和思想方面的大改變(例如國家高於黨)，我就很難看出這種可能；因為那樣的「突破」正好和他們最近宣稱的「四個堅持」相反了。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只是要求零星的小改革，那自然可能性大得多了；但是那又未必能稱作「突破」了。「突破」應當針對一種困境來說，對不對？

我們着眼於中國的困境，自然主張要有「突破」；但以目前中共領導層的態度(四個「堅持」)和幹部層的現況來看，這種「突破」實在缺乏條件。

> **「革命」事實上需要正面條件。現在，龐大的幹部集團不會讚成「革命」，羣衆也無意於「革命」。正面條件幾乎看不見，我們怎能判斷短期內在中共統治下會有「革命」發生呢？**

□問：如果「突破」的發展缺乏條件而不能實現，是不是會有另一次革命呢？

■答：我覺得這要分「長期」與「短期」來看，而且要對中國形勢作一些假定，纔能下判斷。

先就「短期」講，假定目前的現代化運動，沒有什麼突破式的發展，成效不會很大，人民和幹部當然都會愈來愈失望。可是就目前的主要條件看，我的判斷是很難發生另一次革命。

□問：您指的是哪些主要條件？

■答：我正要解釋。我所謂的主要條件，可以分別就幹部和羣衆來說。就幹部講，必須有一種共同追求大改革的狂熱，否則不能生出革命。現在不論是「凡是派」的幹部，或者牛棚歸來的老幹部，基本上都不像有什麼狂熱的信仰。另外有些青年幹部，或許比較有在改革上求進取的熱情，但這些人力量還很薄弱，不能成為革命的主力。更重要的是：中共的幹部集團雖然龐大而有實力，可是他們在利害上似乎是不傾向於大改革的；因為，現制度下，他們正享有特權。一有了眞正的大改革，他

們在利益上只會有所損失。而他們既不是有什麽狂熱的信仰，那就很難希望他們會放棄利益了，是不是？這樣看來，有實力發動革命的幹部集團，卻並不希望革命。這就使革命缺乏了一個主要條件。

其次，再就羣衆來說。雖然我們知道羣衆在今天的共產中國，並沒有眞正的決定性力量（中共自己宣傳「羣衆路線」，那是另一回事），但是羣衆如果眞有革命傾向，仍然是一個主要條件。不過現在的情況是：羣衆大半已經喪失了理想性和共同感。我們根據近五年各種資料看，無論南方北方，城市鄉村，羣衆的一般興趣都落在私生活的個別改善上。要求改善生活，自然沒有什麽不對，但就推動革命講，大家只是各人顧各人的實際利益，就不可能傾向於革命的「犧牲奉獻」了。羣衆並不傾向於革命，這又缺乏了一個主要條件。

一個政府在大政策上失敗，每每使人想到「革命」；但是「革命」事實上另需要正面條件。現在，龐大的幹部集團不會贊成「革命」，羣衆也無意於「革命」。正面條件幾乎看不見，我們怎能判斷短期內在中共統治下會有「革命」發生呢？

□問：倘若某一部分軍人，抗拒中央，是不是會引起革命呢？

■答：那只會造成一次爭權的局面；無論誰勝誰敗，都不是對共產黨的革命。

□問：剛才是說「短期」問題，就「長期」來看又怎麽樣？

■答：就「長期」來說，有許多難以預定的因素，因此，我覺得很難判斷會不會有「革命」出現。不過，如果只就改革來說，我覺得，經過相當長期的醞釀，制度上的大改革一定會有的。

□問：這是不是您所說的「廣義的革命」呢？

■答：可以那樣說，不過我還是寧願用「改革」這個詞語。當然這所謂「改革」，是指離開一黨專政制度的大改革，對共產黨統治而言，已經有「革命」的實際內容了。

□問：您認為這樣的「廣義的革命」或者「大改革」，什麽時候纔可能實現呢？所謂「長期」，您是指多久呢？

■答：我不能確定說在多少年後纔會有這種大改革，因為作政治判斷畢竟不是作推算未來的預言；我如果隨意說一個年數，那就很可笑了。不過，大致地講，總需要十年以上。因為要實現這種大改革，一定一方面要幹部集團本身經過相當程度的新陳代謝，而納入了相當數目的理想性較強、能力較高，又比較了解現代政治經濟的新分子；另一方面又要等這些抱定教條、一味「堅持」的領導人物過去，不再由中央投射出一些死框框來籠罩全國的思想活動。這都不是十年以內可以達到的事。或許需要更長的時間，但似乎不能少過十年。

□問：您對中國未來這種大改革，是怎樣構想的？

■答：大致說，我的構想是這樣：共產主義制度事實上在中國已經失敗，現在的問題是兩個。第一：怎樣使中國人明確了解這種制度不必再維護；第二：用什麼制度來代替它。這兩個問題中，前一個屬於思想知識方面，後一個屬於制度的改進或新設計方面。但是合起來看，都可以說是屬於「社會主義理性化」的問題。倘若我們能在中國展開一個「理性化」運動，使中國人能夠理性地了解制度的得失，而對眞實來作客觀思考，而不老是依靠謊話與盲信來作假判斷，那麼，對共產主義制度之失敗，很容易了解清楚。至於新制度怎樣通過改進與新設計而生出來，也是要依靠理性的力量的。人們只要能夠很理性地面對問題，就一定會找得到處理問題的正當途徑。當然，這裏還有自覺努力的問題，我想不必詳談了。

□問：總括來看，您認為中國會通過「廣義的革命」來一次制度上的大改革，而走入新的階段；至於共產黨的領導，在這次改革以後，是一定會被揚棄的。對不對？

■答：不錯。不過，我只重視思想與制度的改革；至於共產黨員，作為一個個人看，並不一定不能參與這種大改革；只要他不堅持共產主義的思想制度，他就是可以充分地自由發展的。

歷史的困境與出路

□問：勞先生在最近出版的《中國之路向》中，提出了一個近百年來中國人不論有識之士、有志之士甚至普通民衆都關心而又未能解決的問題，就是近百年的中國，一直充滿種種苦難，我們當前也是處於歷史的困境之中，而中國人為中國找路已超過一百年，中間經過反反覆覆的折騰，而在這種折騰中，內在問題愈來愈複雜，創傷愈來愈嚴重，連找路的活力也衰弱了，這是否「歷史的懲罰」呢？

■答：中國在歷史的困境中掙扎，受盡了種種苦難；這是人所共知的。我在《中國之路向》那本小書裏，只是想把這一段苦難史看清楚。中國的苦難，有一部分是由於自己在找路的時候犯了錯誤而生出的，這裏自然可以說是「歷史之懲罰」。另一部分苦難不是由中國人的錯誤生出來，卻由中國人承受，這就不能看作「懲罰」了。不過我從前寫《歷史之懲罰》是就全人類說，從那個觀點說，人類的苦難要由人類自己負責，又可以看作全人類所受的「歷史的懲罰」。

□問：中國長期以來找不到擺脫困境的道路，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於您所說的因觀念上的迷執而未清理的原故呢？

■答：中國的苦難開始的時候自然與外力的侵迫有關係。不過中國在作反應的時候，犯了種種錯誤，纔會使苦難越來越嚴重；而這些錯誤可以說大部分都由於觀念上的迷執——包括盲信、誤解等等。此外當然還有其他因素。

□問：您曾說過，在您寫《歷史之懲罰》時，您覺得看不出中國問題有什麼出路，因此您只可以在書中提出「一個清償歷史債務的抽象主張或態度」。但在中國大陸爆發「文化大革命」時，您覺得自己「已經由看不出希望變為有確定的希望」，是什麼事實使您看到希望呢？

■答：我寫《歷史之懲罰》的時候，覺得共產主義制度本身是決不合理的；可是當時只看見中國人以迷信心情擁護中共，因此，就看不出中國脫離

這種羅網的可能；這就是所謂「看不出希望」的意思。至於「文化大革命」使我看到中國之希望，那是因為，文革一發生，中共的一切弱點都暴露出來，大部分中國人親切體驗到共產主義的「反理性」成分的可怕，迷信就開始消失（這就是近來中共當局所謂的「信心危機」）。另一方面，黨機構的威信，在文革期間，也大大減弱了；這使得人民能夠有機會看清楚所謂「革命的黨」的眞面目。這都有助於未來中國人的覺醒。這就是我所以會覺得有確定希望的意思。

我從文革開始，就判定這是共產主義運動的黑暗面的最徹底的表現；因爲它完全是「反理性」的。共產主義運動到了這個階段，就可以說是走上自殺之路了。

□問：文革無疑是衝擊了中共的黨機構，但另一方面也顯示了在毛澤東威望籠罩下的中共黨領導的强固和絕對化。同時，文革也啓發了西方青年的種種「反建制」運動。當時即使在思想學術界也有一種相當普遍的説法，就是文革展示了中國的路向，也展示了人類未來的希望。當然，這種説法或許是受「言論之欺詐」所影響，而且後來揭發出來的事實，也使我們明白這是一種虛幻的想法與憧憬。您當時對許多人談論的文革的正面意義，是怎麽看的呢？

■答：我從文革開始，就判定這是共產主義運動的黑暗面的最徹底的表現；因為它完全是「反理性」的。共產主義運動到了這個階段，就可以說是走上自殺之路了。至於有些人糊糊塗塗地歌頌文革，可能有種心理或情緒上的原因，但說不上有什麽正當理由。我記得文革初發生的時候，崇基學院邀三位教師作公開演講，我也是其中之一。我當時就很確定地指出文革這個運動完全反理性，無論對共產主義運動自身說，或對世界說，都沒有正面意義。這個觀點我一直不曾改變過。至於美國的所謂「反建制」的風氣，又另有它的歷史社會原因；不過也不代表什麽「出路」或希望。

□問：在「文革」以前，您認為中國的問題是

一個如何能夠擊敗共產黨的問題。時至今日，您認為中國問題是否仍然是這個問題呢？

■答：中國的問題，就是一個如何脫出歷史困境而尋求新發展的問題。我寫《歷史之懲罰》的時候，强調「如何能夠擊敗共產黨」這個問題，是因為我覺得共產黨的專政只會加深中國的困境，所以是特別需要解決的問題。其實，擊敗共產黨仍然是為了要為中國找出路而已。我反對共產主義的專政制度，三十年來，是人所共知的；今天我仍然認為中國要有出路，必須脫離共產主義的專政。不過，我現在覺得寫《歷史之懲罰》的時候那種說法，畢竟有點喧賓奪主，而且「擊敗」這種字眼也帶有暴力意象，因此，我寫《中國之路向》，就直接强調中國之困境問題了。

□問：記得一九七一年，您在中文大學一次以《辛亥革命與中國的道路》為題的講演中，說辛亥革命「在正面上並未提供解決中國問題的明確道路」，並認為中國客觀上不可能走資本主義的道路，也不可能走傳統主義的道路，而只能走社會主義的道路，不過應該是一種「新的合理的社會主義」的道路。這種合理的社會主義的內容是什麽？可以有什麽步驟去實踐？

理性社會主義的大意，就是將社會化的意識與人權、自由、德性等等觀念滙合起來，建立一種制度。……將目前社會主義的「專政」、「思想統制」、「革命特權」等等反理性成分逐漸排除，就可以步步接近一種「理性的社會主義」了。

■答：我所謂「合理的」或「理性的」社會主義，原是針對「反理性」的社會主義來說的。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條件，現在已經漸漸不存在，所以中國無法走英美的舊路。傳統文化雖有些寶貴成分可以運用，可是成套的「傳統主義」自然無法與現代中國面臨的問題配合；這是我所以不贊成走資本主義或者傳統主義的道路的理由。至於理性的社會主義的大意，就是將社會化的意識與人權、自由、德性等等觀念會合起來，建立一種制度。這如果要

詳細說，得寫另外一本書。不過現在也可以用一種最簡單的說法來表明我的主張。我認為將目前社會主義的「專政」、「思想統制」、「革命特權」等等反理性成分逐漸排除，就可以步步接近一種「理性的社會主義」了。這也就是我在《中國之路向》中所說的「社會主義的理性化」。

□問：相信很多人都同意，中國的「現代化」，除了工業、農業、國防、科學文化這些層面之外，還應該包括觀念現代化、政治現代化，甚至風習現代化這些層面。其中觀念現代化似乎是一個重點。也有人提出清理傳統，重建精神支柱的問題。在觀念現代化過程中，您認為中國及西方的文化傳統中，有哪些觀念形態的東西是中國應該攝取的呢？

■答：關於中國文化傳統中的「開放成分」或者「有普遍意義的成分」，我在《中國之路向》中大致說過。現在可以再把最重要的一點提出來談談。中國的儒學強調「主宰意義」的「自由」，而將「理性」、「公正」等等都與這種「自由」觀念合為一體；因此，依中國這種傳統價值觀念講「自由」，就不會以為放縱是自由，也不以為非理性纔是自由，相反地，要從能顯現出「理」，能建立秩序等等功能上說眞正自我的自由。這當然是一種法學觀念，不過，它的實際意義非常明顯。落在人生態度上，我們就看見一種有建設性的「自由」觀念，有指導功能的理性觀念；這些都是較健全的文化生活中應該有的重要肯定。至於西方觀念，自然一時也說不完；但可以指出的是：尊重客觀眞理的想法，保證文化發展的人權觀念，與法律保障下的自由觀念等等都是重要的。這自然只是隨舉一二；要詳細討論，恐怕不是我們這次談話所能容納了。

□問：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從來是「任何政治運動的主力及推動者」（見《歷史之懲罰》），而在中國的傳統中，知識分子也常有「以天下為己任」的觀念，儘管中國知識分子也常沉湎於種種革命家、教主、幸運兒和苟安者的幻想。在目前的困境中，中國的知識分子應如何面對？如何「承担」歷史的債務，尋求中國脫困之道？具體的說，應該做些什麼呢？

■答：我覺得今天中國的局面，特別需要知識分子的努力。因為處理中國目前的問題，無論就觀念的建立，或制度的設計，甚至對客觀事理的了解等來說，都不是可以用喊打喊殺那一套暴力手段所能收效的，也不是依靠膚淺之見、媚俗言論可以僥倖成功的，而要靠愼思明辨的人們作長期努力。至於知識分子所能做的事，最重要的就是提倡理性的生活態度，堅持公平的要求，提倡嚴格的思考，破除種種虛幻的迷信等等基本工作。更具體地說，應該盡一切力量從事羣衆教育，使一些能推動中國現代化的知識能夠廣泛傳播，為中國的未來發展建立普遍基礎。這是我們應該做也能做的事。

□問：今天的中國人，就其處境來說，可分大陸、台灣與海外三部分。台灣與大陸的問題，目前爭議的焦點之一是應否統一？如何統一？您曾說，「有利於中國人的大奮鬥的『分裂』，勝於無作用的『統一』」；然則海峽兩岸要如何改進才可以發揮「有利於中國人的大奮鬥」的作用？

■答：我確實認為不考慮制度，而一味空談「統一」，根本對中國前途無益。因此，只談「統一」也未必就表示「愛國」。要做有益於國家的事，纔是「愛國」。至於說到「海峽兩岸」應該如何改進，我想，在原則上，並沒有什麽新奇的話可說。我只希望雙方在政治上不再「專政」，在經濟上能改善人民生活，在文化教育方面能尊重學術思想的獨立發展，在社會秩序方面能實行法治防止罪惡。雙方能在這些方面作正面意義的競賽，經過較長時間，便一定有利於中國人的「大奮鬥」了。

□問：您最近留意並關心香港的政治前途，並發起研究及撰文討論一九九七問題。但您認為「香港的種種問題很難在中國問題解決以前獨自解決」，並認為「我們的眞正難題在中國而不在香港」。那麽您對目前的所謂一九九七香港前途問題有什麽構想呢？有什麽可行的「過渡性」方案呢？

■答：從根本處說，香港制度、教育、社會風氣等等問題，都與香港這種古怪地位有關，所以我認為很難在中國問題解決以前獲得解決。但是，就香港目前可能發揮的作用講，我就認為保持香港的

自由社會制度，對中國有用。我們的「眞難題」自然是中國出路問題，自然「不在香港」，可是，在幫助中國找出路的前提下，來看香港地位問題，我覺得應當盡量不破壞香港現有的功能。因此，我不主張由中國收回香港，也不主張將香港變為一個「特區」，而希望香港作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但成為一個國際性的自由港，繼續保持它的自由經濟，而改進其他方面，以便成為一個自由制度的模範區，也能夠有助於中國的發展和改革。這也許不算一個具體方案。事實上，我們文教界朋友組成的「香港前景研究社」，已經擬了十個方案在逐步研究；以後還會舉行廣泛的問卷調查，了解香港居民的意願。現在不能細談，大家可以注意研究社今後發表的文件。

最後，我想反問你們一個問題。

□問：您想問什麽問題？

■答：許多人一向認為《七十年代》是左派刋物，現在你們進入新階段，《七十年代》成為獨立刋物了。你們是不是有新的編輯計劃，或者新的目標呢？

□問：在談到我們的新的目標之前，我想我要先談談我們在中國問題上始終一貫而不想改變的方面：第一，我們一直是希望中國進步，一直想促進中國的進步；第二，事實上我們刋物對中國現實的反映，是隨着事實眞相的逐漸顯現，隨着海外知識分子、特別是保釣運動開始以後海外愛國的知識分子的認識的改變，而有所改變的；第三，我想我們始終保持理性的、以事實為主的態度，這態度也包括了當我們發現我們的報道不符合事實以及不理性的時候，我們要有承認錯誤和改正錯誤的勇氣。

從這幾個基本態度出發，近年來我們對於《七十年代》可以做和應該做的事情是比以前清楚了。我們相信，任何社會，粉飾昇平不但不能使社會進步，反而會在自滿和閉塞中倒退；而進步是來自批評的，沒有批評就沒有進步，沒有不同意見的交流和溝通就沒有發展。《七十年代》的讀者、作者中，有不少專門人材，在這幾年頻頻到中國大陸和台灣，去進行講學和種種學術交流活動。而《七十年代》的本身，所能做的最有益於中國前途的事，

恐怕就是在促進中國的民主化與現代化方面盡量反映海外知識分子的各種意見和建議了。海外知識分子的意見自然有對有不對，但我想我們的讀者、作者、編者的基本態度是誠懇的，我們取稿原則是重理性的，是以事實為主的。我們只是希望海峽兩岸的當權者能夠兼聽則明，而不要心胸狹窄得像白衣秀士王倫那樣。在溝通海峽兩岸及海外中國人的意見方面，不可避免地會導致某些當權者不高興，或對我們的用心有所誤解甚至曲解。但我想，事實勝於雄辯，公衆的眼睛是雪亮的，只要我們問心無愧，我們也不必在功利方面多所考慮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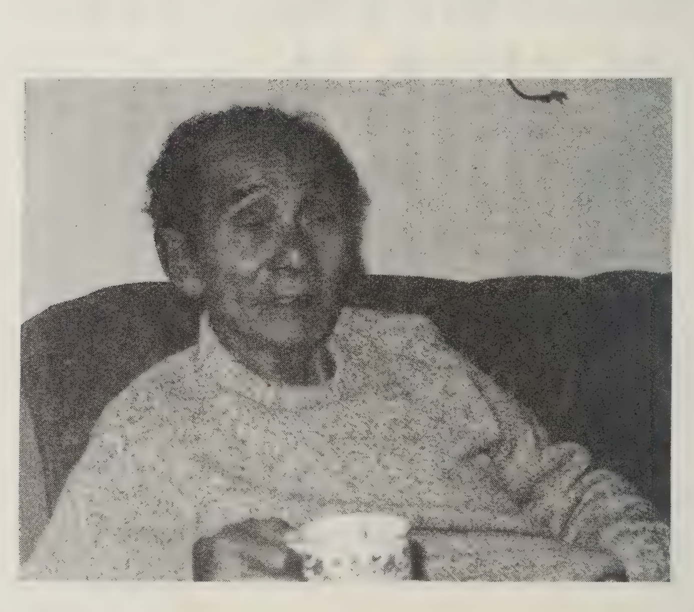
《七十年代》確如您所説的，在組織上是進入了一個新階段。現在我們已成為一份由數以百計的海外知識分子或投資、或贊助的刋物了。我們將竭盡所能，使《七十年代》不負它的讀者、它的支持者、它的股東所託，繼續利用海峽兩岸政權以外的自由的窗口，為中國的民主化的未來多透一點空氣。

謝謝勞先生接受我們的訪問，也謝謝您對《七十年代》的關心。

楊逵

談文學與人生

日期：一九八二年十月四日
地點：美國愛荷華州愛荷華城



前言

楊逵，本名楊貴，台南縣新化鎮人。生於一九〇五年。在日本殖民統治五十年中，經歷了大半生涯。不撓不屈，坐牢十二年，十多年來被稱爲「壓不扁的玫瑰花」。至今七十七還不服老，是台灣「益壯會」的一員。

一九二四年中學未畢業就東渡日本東京，就讀日本大學文學藝術系，半讀半工，從事和平運動。一九二七年回台後即參加抗日文化運動，農民運動，新文學運動。一九三二年，寫了《送報伕》，經歷了許多挫折之後，於一九三四年全文才在東京的《文學評論》月刊發表，隨即由胡風翻譯成中文介紹到大陸。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發生後，在嚴密的監視下下鄉墾耕，從事園丁工作，老伴葉陶成爲賣花婆。

光復不到二年發生了二・二八事件，形成了省籍對抗的鴻溝，爲了和平相處起見與外省籍文化界人士籌組文化界聯誼會，起草「和平宣言」，因而被捕判處徒刑十二年。一九六一年刑滿後又在台中東海大學前闢荒開拓東海花園，至今二十二年。著作有《鵝媽媽出嫁》、《羊頭集》等。

一九八二年秋，我在美國訪問了這位老當益壯的作家。訪談的時間雖不長，老人的誠摯、熱心，却給我留下深刻難忘的印象。

李：楊先生，您是哪一年自日本回到台灣的？

楊：一九二七年九月。當年我才二十二歲，比你們都年輕，衝勁也很大。搭日本郵輪在基隆上陸，到了台北便去看文化協會支部，正好他們在市區計劃一連串的巡迴演講，我便應邀參加。一週後，到台中訪問農民組合，得悉他們也計劃在鳳山準備發動一連串的演講，我便馬不停蹄的到鳳山，幾乎跑過三分之一的南台灣鄉村，參加演講有十多次。這個時候，豪氣十足，好像此鞭一揮便可以把整個江山易色，十分可笑。那時是患了英雄主義的毛病。《送報伕》最後那一段敘述，正好表現了我這時候的情況，「民族自決」與「解放我們的土地」的目標雖然沒有改變，但方法上就有點不同了。

李：從那時回去後，您就沒有再離開過台灣？

楊：一九三七年六月中，我再去一次日本東京。因為我辦的《台灣新文學》月刊在台灣被禁了，在日本我有很多朋友是反對「殖民主義」與「侵略戰爭」的，我相信他們會支持我的工作。但到了日本不到一個月，七七蘆溝橋事件發生了，在日本文化界也風聲鶴唳，他們自己也難保了。九月中我被逐回台灣，十月二十日日本當局在東京大肆抓人。這一次，反戰、反侵略的知名知識分子被抓了一百多人。

這時，我因幾年來的奔波，染上了肺病，只好乖乖地，少活動，少寫抗議文章，而租了兩百坪的土地學起園丁這一行開始種花療病，維持生活。我是園丁，葉陶是賣花婆。但我還不死心，在花園裏掛起「首陽農園」的招牌，取伯夷、叔齊寧餓死首陽山、不食周粟之義，表示寧死也不為侵略者幫腔，並在台灣新聞發表一篇《首陽園雜記》公開表明了我的態度。這篇文章引起了幾位日本文化界人士的同情，甚至有一位日本警察入田春彥憤而辭職，到莊園來幫忙，終於被捕關了幾天之後要驅逐出境，他卻不願意離開首陽農園而自殺身死。我悼念他的文章《悼念入田春彥》也在台灣新聞發表。這件事可以看出許多日本人都很同情我的處境，我未餓死，他卻為我向日本軍國主義以死來抗議了，我非常感動。

李：隔了四十多年，這次來美國的目的是什麽？

楊：我對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的邀請覺得非常有趣。它自一九六七年起每年邀請了三十多個國家的作家參與此事，溝通文藝作家的思想與觀念，這對世界和平的貢獻非常大。據説曾經有三百多位不同民族、不同國家的文藝工作者建議，把安格爾夫婦推舉為諾貝爾和平獎的候選人。我很願意參與這個行列，也想到這兒學些可以貢獻世界和平的各種作為。

活到老學到老是我一直堅持的生活方式，我不敢倚老賣老，自己要學的更多。

李：你是否來學文學問題？主要學些什麽呢？

楊：文學要表達的是多方面的。例如哲學、心理學、政治、社會，以及人際關係。技巧與形式是工具，主要還是思想與觀念。

李：您寫作的話，大致要表現些什麽？有沒有綱要？題目？

楊：我來美國之前，對美國有很深的成見，認為美國的軍火商給世界帶來了災禍，與蘇俄的對外銷售軍火、造成到處戰亂，都是無法容忍的。但到這裏來，參觀這裏的醫療設備，看到物理學與各種科技的進步，以至農耕器械的進步與運用，又回想到今春在紐約的將近百萬羣衆的反核、反戰示威遊行，我便覺得，以文化藝術、思想觀念在平民心田中紮根，甚至發展到寧願坐牢不當兵的境地，將可迫使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唯利是圖的企業改行為和平產業。這是愚公移山嗎？是的。但我們將一代再來一代的做下去，總有一天會看到其成就，我是樂觀的。

李：您將寫美國呢，還是台灣的東西？

楊：這次到這裏來，已經給我擴大了視野。過去被認為鄉土派的一員的，擴大視野之後，所關心的也就理所當然擴大到整個世界，尤其在這裏與從世界各地來的三十多個國家、民族的作家接觸、交流之後，我已經不是個狹隘、自我設限在小島台灣的人了。

這次《自立晚報》在「歡送老園丁出國門」專欄

中，季季希望我能因這次出國而燃起創作的熱情，寫寫長篇；但願如此。但是自覺近來腦筋糊塗了許多，記憶力也差了，要寫長篇恐怕力不從心。不過，我決心盡我所能，寫些有關的小故事，能多活幾年的話，把這些小故事連貫起來，也許可以當長篇看。

李：您停止寫作多久了？

楊：很久了。光復後我翻譯了一些魯迅、老舍、巴金、沈從文等幾位作家的作品，刋行了中日文對照的小册子，目的是為了使像我一樣受日文教育的朋友們，一面接觸到大陸的文藝作品，一面又可以學學中文，尤其是使我自己熟習中文，以改變我過去用日文寫作的畸形現象。當時我的女兒在念國小二年級，她在學校學到一句（如洗面、洗手、吃飯這一類的）回到家來就教我一句，學聽國語、學說國語，也幫了我很多學習的機會。

到綠島，與我被關在一起的有很多中學生與大學生，我與他們在聊天中也學到了不少，《壓不扁的玫瑰花》就是我在那裏用中文試寫的第一篇小說。

其後一位唐湯銘先生，他是一位少將，是綠島新生訓導處的處長，很關懷我們的身心發展，每年開運動會，經常又有各種田徑活動，尤其重要的是各大隊有壁報，整個營有《新生月刋》，也舉辦過幾次寫作比賽，每逢佳節又有相聲、話劇的晚會，給我們在文化活動方面也有機會參與，我也寫了幾十篇散文小說、劇戲、詩歌，在我的《羊頭集》裏收集了一部分。從綠島回來後，為了重建家業，借錢買了東海花園這塊地，為了吃飯與還債，每天在花園裏勞動十幾個小時，二十年中除了寫的《墾園記》、《羊頭集》等幾篇散文外毫無作為。有一次報社編輯來訪，問我是否繼續在寫作時，我只好自嘲說「天天在寫，不過，現在不用筆，是用鋤頭寫在大地上的」。有人說我是「老作家」，都叫我臉紅。我是四十多年繼續用鋤頭寫作，叫我「老園丁」，才可以說是名正言順。

李：日治時代和光復後，您為寫作吃了不少苦頭，能否回顧一下，當初寫作的動機是什麼？

楊：主要是為了糾正歪曲了的歷史。他們寫的許多文章都把我們抗議迫害的行動說成是匪亂，他

們統治者都隨便制定法律，如「匪徒刑罰令」，可以把我們反抗迫害的行為說是匪亂，可以槍斃，也可以殺頭。這既歪曲了歷史，也是不公正，不公平的。

李：那您寫作的目的是為了要反映眞實的事情？

楊：是的，正如徐復觀登在《八十年代》的一篇文章所說的，我們要從哈哈鏡裏看眞人，也就是要「眞人說實話」。

李：您對文學的基本見解如何？

楊：小時候我喜歡聽故事，也喜歡看村戲，布袋戲，卻不懂得注意其內容。在這七十七年的歲月中，我看的世面多了，也可以看透不正當、不健康，或者被歪曲的歷史，如今我對文學有三個要求：其一要讓人家看得懂；其二要讓人家有興趣繼續看下去；其三是最重要的，要表現眞實的人生。

李：從文學講到人生，從年輕到現在，您是否有一個一貫的人生目標？

楊：我歸納了每一個人的人生目標都在於要過無病息災的健康生活，再者就是多活幾年。從這裏我得到一個概念是「一統」和「統一」的觀念。「一統」是以個人的主觀來强迫人家跟在屁股後面的，帝王思想、封建思想、官僚思想、霸道思想屬於這一類；而「統一」卻與此相反，是尊重別人的意見，講究溝通、討論、商量以避免曲解與誤會，使人們不是被强迫或利誘，而是主動參與合作，是屬於自由民主這一類型。

李：如果討論與協商而達不到「統一」的看法，怎麼辦？

楊：那就要用多數的方法了。在人類歷史上，我看不出有什麽絕對的權威，就是所謂「一言堂」，任何人都不可能「博」到哪裏去。當然多數的決定也不一定就是絕對正確。那就只有少數服從多數，而多數的應該也要尊重少數，讓其有再貢獻的機會。

據說英國海德公園經常讓不同思想、不同看法的人在那裏討論各種問題，這是一種很好的做法。

李：您採取的是和平的方法？

楊：是的，我與朋友間時常爭論，但君子用嘴

不動武，爭論之後都是好朋友。未決的事待機會，互相找資料再來一次爭論。二次、三次可以一直繼續下去，都不至於動武。在東海花園時，徐復觀常到我那裏聊天，有時也會爭論到面紅耳赤，但我們一直都互相敬重。

李：您們如何交談呢？徐先生的話不好懂。

楊：一半用嘴講，一半比手劃脚，還是可以溝通。他是「統一」思想的人，不是「一統」思想的。「一統」思想的，恐怕就不好溝通。

李：您對新生代的台灣作家喜歡哪幾位？

楊：光復後的一些年輕作家，我比較喜歡所謂「鄉土派」的。他們對於社會都很關懷，不像那些在象牙塔裏唱高調的。

李：您對大陸新生代作家有沒有認識？

楊：很少認識。他們的作品在台灣很少看到。劉賓雁的《人妖之間》與白樺的《苦戀》卻在台灣的報章上看到了。我認為很不錯。吳濁流曾說過，「拍馬屁的不是文學」，我同意他的意見。

李：您喜歡魯迅的抗議文學？反叛文學？您是否傾向這一類的文學？

楊：對。我比較接近。如果對社會的不合理毫不關心的，我就沒興趣，馬屁文學更不用說了。對國外作家的看法也是如此，我學生時代最喜歡看的是挖掘社會病態的作品，如英國的狄更斯，蘇俄及法國十九世紀前後的作品。

李：您來美國有多久了？

楊：八月廿八日出發，一個多月了。

李：您對接觸到的美國的中國知識分子有何期望？

楊：他們都關心家鄉，但有不同的意見和派別。如自學術研究的立場來討論問題，而這裏又不像大陸與台灣有任何控制，可以暢所欲言，只要不致情緒化以至於人身攻擊就是很好的。無論在大陸或在台灣，若有民主與自由，大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貢獻出心智的話，我相信進步就會加速。如果你也不敢言，我也怕講話，大家都成個啞吧，成個鄉愿，問題還是重重的。

我覺得，日本、美國、香港等地的知識分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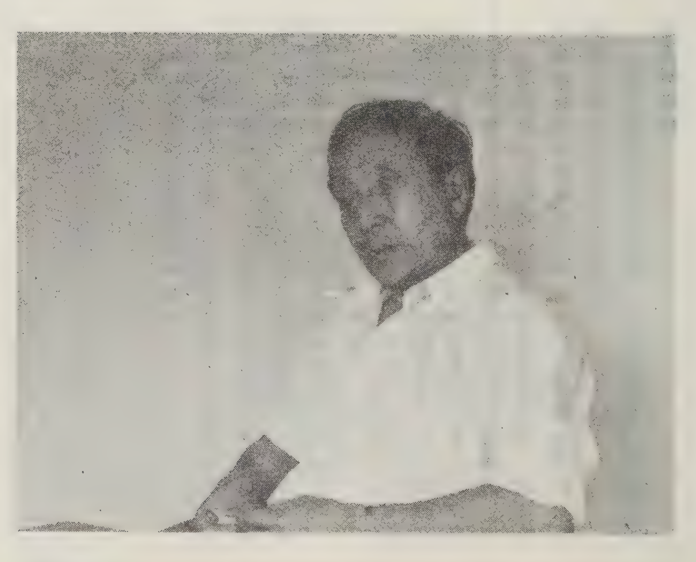
言論沒有受到任何限制，就像三十年代的上海租界，可以發揮言論效能。這雖是不很名譽的事，卻也可以利用機會盡量來發揮。

李：這次和大陸作家見面溝通有沒有好處？

楊：我未曾到過大陸，光復後除了一九四五到一九四六年之外，至今文化交流也全斷了。因此，我對大陸的一切一無所知。這次和幾位作家見過面，也談了一些話，都是很有限的。希望能藉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不僅與大陸作家，也與參與各國的作家文化交流，這是有很大好處的。就像我這個土包子放洋一樣，大家都可以得到好處。

劉賓雁和他的時代

日期：一九八二年十月六日
地點：美國愛荷華州愛荷華城



前言

中國作家劉賓雁先生，對我來説是神交已久了。在我剛開始對文藝發生濃厚興趣的年輕歲月，劉賓雁的《在橋梁工地上》和《本報内部消息》，就對我的文藝觀發生了重要的影響。從那時起，我就傾向於「爲人生的文學」，並且以後更把「爲人生」、「爲社會」的目標放在「爲文藝」之上。

一九五七年，劉賓雁被打成右派。我把中共報章上發表的他的「右派言論」，與他的作品放在一起，並不時拿出來翻閱。因此，到一九七九年《七十年代》轉載劉賓雁的新作《人妖之間》時，我能毫不費力地寫出一篇關於他的短短的介紹。

從一九五七到一九七九，這二十二年是劉賓雁的寫作空白時期。這之前與之後，所有他的作品、論文、發言，以至別人寫的訪問記，只要我能夠找到的，我都大致上讀過。在中國當代作家中，劉賓雁無疑是我較爲熟悉的一位。

通過文字了解，同實際接觸，畢竟有所不同。一九八二年十月，在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的協助下，使我終於在愛荷華有機會同劉賓雁作面對面的長談。這次長談經記錄整理後發表在《七十年代》的八二年十二月號。

劉賓雁給我的印象，是一個沉思型的人。儘管他表示對現狀抱着有保留的樂觀態度，但他的性格却趨向憂鬱氣質。另外一個印象是他的驚人的勤奮，似乎拚命要把那二十二年的空白抓回來似的。

劉賓雁並非對所有的問題都願意回答，並非所有的話題都有興趣談；然而，只要他願意講的，那麼可以相信他的話是誠懇的。

沒有誠懇就沒有愉快。這次訪問是一次愉快的難忘的經驗。

一九二五年——一九五七年 從文學走向革命

父親當翻譯，從小對我寵愛備至。哈爾濱對我的文學活動影响很大。

李怡：這次在愛荷華見到你，非常高興。你的作品給我和《七十年代》的讀者留有深刻的印象。在我們看來，你也是個傳奇人物，你的人生閱歷似乎很少介紹，我們是不是從這裏談起？

劉賓雁：好。我把有點意思的事情向你談談吧。我出身在一個鐵路職員的家庭，父親在中東鐵路當翻譯，是個高級職員。他曾作為華工在第一次歐戰期間去俄國呆了七年，一九二一年回國。我是一九二五年在哈爾濱出生的，是他的長子，他對我寵愛備至。

李：傳說你有俄國血統。

劉：沒有。我母親是中國人。我可能有一點混血，那是漢人與滿人之間的問題——不涉及外國。

李：你的家庭對你的文學活動有沒有影響？

劉：有，但不是直接的。從小我受父親很多影響，一方面是政治上的，他對蘇聯充滿了感情。他

是跟着我的祖父從山東逃荒來到黑龍江的。我的老家沂蒙山區直到現在還是比較落後的地方，過去闖關東的人是最多的。家鄉來東北的人，多是做碼頭工人或拉人力車，很苦。當時，管蘇聯共產黨叫窮黨，父親是同情窮黨的，他認為沒有貧富之別的社會是最合理的社會，從小他就向我灌輸這個思想。另一方面是他很愛學習。他早年失學，便發憤自學。從蘇聯回來教一個中國人俄文，那人教他中文，學到能看書寫信，他很愛看書，常給我講《聊齋誌異》等故事。

一九三三年日本强行接收中東路，為了排除蘇聯影響，父親這個俄文翻譯便失業了。一家生活很不安定，少量的積蓄花光了，家境越來越沒落，這對我思想影響很大。

李：當時東北在日本的佔領之下……。

劉：一九三一年日本就霸佔了整個東北。到三七年七七事變時，我正十二歲。當時有兩種感情十分强烈。一種是民族感情，那時東北人的「亡國論」是很深的，雖然都不願做亡國奴，願意把日本打敗，但有此信心的人是不多的。我記得，日本人當時每一兩天就在街上貼一張「同盟社」的海報，上面照例有一張皇軍舉着太陽旗站在城牆上歡呼的照片，表明又一座城市陷落了，被他們佔領了。面對這樣的海報，我年輕的心靈的傷痛，有時會黯然落淚的。另一種感情就是對文化的渴望。哈爾濱是個優美的城市，它受俄國文化和蘇聯文化的影響很深，在東北，它也是一個民族資本主義比較發達的文化城市，進步的文藝刊物書籍比較多，有一批進步的文化人。在三十年代初期出過十多個有名的作家，如蕭軍、蕭紅、端木蕻良、駱賓基、靳以、金人，《國際歌》的塡詞者塞克，還有孔羅蓀、楊朔等。雖然後來他們都去了上海，但他們的影響，他們的書和作品留下來了。同時，日本人的文化統治比起四人幫來要鬆得多，直到七七事變抗日戰爭開始後，在哈爾濱還可以看到魯迅、巴金、丁玲、郭沫若、老舍的著作，政治色彩較濃的蘇聯小說《毀滅》、《鐵流》都可以半公開地買到。

李：你從那時開始受普羅文學的左翼影響的？

一九四四年入黨，五〇年在北京《中國青年報》當主任兼記者。

劉：是的。文學對於我們這代人來說，它往往是走向政治和革命的橋樑。共產黨在哈爾濱的影響直到四十年代，即日本佔領十多年後還存在，至少在四二年，共產黨在地下還是相當活躍的。我從十四歲起，就接近了共產黨的外圍組織，一個讀書會。

我的思想發展是與客觀環境有關的。那時從山東河北闖關東的移民和美國有點相似，他們到了東北的莽莽荒原後，便同原來的宗法社會脫離了聯繫，成了獨立的人，割斷了封建的關係，就同美國人開發西部一樣，在這樣一個封建意識比較少的廣濶天地，個人的勤奮、勇敢和才幹便成了一個人發展的決定因素。環境促成了人們有一個開拓者的進取精神，人的思想比較自由，受封建束縛比較少。我父親對我的教育採取了自由主義的態度，看書說話都不加干涉。我讀了很多書，買不起就借來看，租來看。文學的興趣很快就被政治興趣所取代。民族壓迫和家庭沒落使我看到了社會的不平等、不公正。我失過學，交不起學費，都促使我對社會問題萌生興趣，所以最初想當作家，後來就想做個記者。那時我已有了日文閱讀能力，通過許多日文刊物，對國際知識增加了了解。我開始看馬克思主義，也是通過日文本的，中文本買不到。

李：從對文學的興趣開始，進而思考人生、社會的問題，終於對政治發生了興趣，我也有相似的思想歷程。

劉：一九四〇年我到了北京，在姐姐的幫助下讀中學一年半，最後在輔仁大學附中上了半年高中就退學了；她供不起我讀書。我的正規教育就到此結束了。四三年我在天津參加了共產黨的地下抗日組織——抗日救國聯合會，簡稱抗聯。

李：你這時入了黨沒有？有沒有職業？

劉：沒有，入黨是第二年，四四年，這已是抗戰末期。我的職業是教員，教小學，中學，還當過銀行職員。抗聯的工作主要是組織讀書會，小型

的，不超過七八個人。第一步組織閱讀進步文學書籍，當時屠格涅夫的書如《羅亭》、《貴族之家》在青年中都起過進步作用。十九世紀的貴族作品在一百年後的中國竟能起這樣的革命作用，是很耐人尋味的現象。當發現一個人政治上同情靠近我們時，就進一步給他一些政治書籍看，包括毛澤東《論聯合政府》的油印本和偽裝的鉛印本。我還冒險地刻臘板、油印毛的著作，但更冒險的是散發傳單，張貼傳單，甚至親自把傳單送到別人手裏，還寫過日文傳單，偸送到日本人家裏。這是在天津的活動。

四五年日本投降，國民黨來了，我在天津耀華中學當教員。這是一個政治上很保守、達官貴人子弟特別多的學校。我和另一個當學生的黨員經過幾個月的工作，使學校的形勢改觀了。在聲援昆明「一二·一」慘案的大遊行中，耀華的學生參加的最多。校長很快就發現我這個二十歲冒充二十六歲的共產黨員。三青團的活躍分子每天都向警備司令部匯報我們的情況，但校長鑑於共產黨勢力大，不敢得罪，還怕我被抓走別人誤會是他告密的，所以就勸我離開，答應給我出路費。在得知警備部黑名單有我之後，四五年七月我便離開了天津。冀中解放區沒去成，就決定先回東北，想同父親和姐姐度過一個暑假。我母親已在日本投降前不久去世。

當時哈爾濱已是解放區。我七月回到哈爾濱後不過一星期，內戰便全面爆發，松花江封鎖了，領導我們的蔣南翔歡迎我留下來，因我在那兒有影響，教員出身，會作宣傳，又年輕，而哈爾濱學生中奉國民黨為正統的觀念很強，對共產黨看不慣，不相信。於是我留下來當教員，做青年團的工作。從此，我就再沒去過國統區，可以說，開始在新中國工作了，雖然這時全國還遠未解放。

李：大概那時你已算青年團系統的幹部了。

劉：這是時代的安排。我在五一年到北京《中國青年報》工作前，在哈爾濱已經參與了組織東北民主青年聯盟的工作，我是聯盟的副主席，同時在中學當教導主任。四八年十一月瀋陽解放，我們大隊人馬一列車開去接管瀋陽，我在瀋陽繼續做青年團的工作。

有些人的認識還停留在戰爭年代，以爲批評自己必定會有利於敵人。

李：當回顧早期的革命經驗，你覺得有什麼特別值得重視的東西嗎？

劉：有一點值得提一下。也許是由於哈爾濱和家庭的文化背景的關係，在投身鬥爭之中，我一直保持着對外文的興趣，花了相當多時間自學，這使我接觸外國的東西比別人多些，快些，對我以後的道路有很大的影響。

四九年我第一次出國，去匈牙利參加世界青年聯歡節，途經蘇聯。以後又去過蘇聯四、五次，也到過波蘭、瑞士，使我眼界開濶一點。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蘇聯發生的變化，世界發生的變化，我接觸得比一般人多。

李：你在《中國青年報》做什麼工作？

劉：當工商部的主任。五十年代初期，我關於報紙工作的一些主張遭到一些人的反對。我是主張在報上搞點批評的，我認為光是把上面的東西往下灌是不夠的，報紙的功能也不應僅僅是「傳聲筒」嘛！黨中央五二年也有決議在報上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但是一實行起來便障碍重重，阻力相當大。

李：看來，這個問題現在還沒有得到解決，按照我們的理解，傳播媒介一個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傳達民意，發揮對當政者的監督作用，香港報紙很少有對政府唱贊歌的。

劉：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美國報紙對於政府的批評比港報還厲害，但是這種批評，以及美國大衆傳播媒介的全部實踐，歸根結蒂還是對他們的的政府、特別是對於他們的社會制度的穩定幫了大忙。美國社會今天矛盾重重，經濟危機如此嚴重，而並未出現三十年代初期那種政治危機，我看大衆傳播媒介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可見，批評和暴露也並不是在任何情況下，以任何方式進行都有利於人民。中國的報紙上，批評確實少一些（同過去相比，卻多得多了）。宣傳方式也不那麼活潑。但是大的方面來說，它的報導、文章的內容卻都是同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有關，並且是朝着一個正確方向

引導人民的，從而推動社會前進，而不是像美國報紙那樣維護一個百病纏身的社會。這當然不是說中國的報紙不需要改進。我們還不是很善於運用自己的這個工具最有效地為人民服務。五十年代初期，更是如此。有些人的認識還停留在戰爭年代，以為批評我們自己必定會有利於敵人。我當時關於加强報紙上批評的主張，到五五年就成為一條罪狀了。

李：你不是五七年受批判的嗎？

劉：五五年夏天肅反運動中，有一個人學我的筆迹寫了一些匿名信，罵胡耀邦，周總理，說青年報總編輯沒本事，應由劉賓雁來當，等等。筆迹模仿得很像，一般人看都以為是我寫的，只有我本人，一看就不像。內部開始對我審查。

李：這應可以得到澄清吧。

劉：對呀，很快就破案了。經過蘇聯專家的字迹鑑定，證明不是我寫的。經過偵察，九月逮捕了一名女編輯，我才得以解脫。在三個月受審查期間我內心很安穩，因為我知道我沒做這事。但是在審查中，已經把我發表的文章提到了反黨的高度，包括我關於在報上開展批評的主張，也包括後來發表的《在橋樑工地上》的最初草稿，我已被懷疑為「敵人」了。搞清之後，我又很輕鬆地出外採訪，到了三門峽工地、河南、甘肅。在蘭州參觀黃河大橋，就在那個橋樑工地上，發現了一個幾乎是現成的素材，和我幾年來一直企圖加以表現的思想一拍即合。關於寫作《在橋樑工地上》的構思，其實早已形成，就是覺得中國應該進步得更快些，但有的領導者思想保守，固步自封，使羣衆的聰明才智不能充分發揮。工地團委書記介紹了一個事迹，很合適，符合我的「主題先行」的構想。於是我回到北京，利用春節假期開夜車兩三天就寫了出來。這就是那篇《在橋樑工地上》的創作過程。

李：「主題先行」看什麽情況，恐怕不能說完全不對吧？作家有時候是對一個思想、一種立意醞釀了很久，才找到適當的題材的。

劉：我同意。不幸在一個很長時期裏，「五四」以來中國新文學的一個優良傳統中斷了。似乎一個

作家不必自己去作獨立的觀察和思索，一篇作品可以沒有作家自己的思想。於是有的作家就甚至聲稱「我就是編故事的」，而且眞的編了幾十年故事。七九年以來中國文壇的變化，其實並不僅僅是作家的創作題材更廣濶，可以寫生活中某些消極現象藉以喚起人們去戰鬥了。可以開出一長串名單，比如高曉聲、張弦、古華等等，他們的作品中都有自己的思想，新鮮而深刻。李准的《芒果》和《王結實的故事》，你看過沒有？妙極了。

蘇共二十大時，我正在波蘭訪問，感受到東歐思想浪潮的衝擊。到蘇聯特寫作家奧維奇金家中作客，從他那裏吃了些偏食。

這篇後來被稱為毒草的《在橋梁工地上》發表時，我在國外，後來才知是秦兆陽看中了，（秦當時是《人民文學》的執行主編）。秦還特地寫了一個「編者按」。其實這篇東西的基調是熱情肯定社會主義制度的。由於是解放後第一篇帶有一點批判色彩的作品，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

李：當時你在蘇聯訪問？

劉：不，是在波蘭，正在參加國際新聞工作者協會的理事會會議。代表團由《人民日報》社長鄧拓帶隊，一行三人，還有新華社的李炳泉，一位很有名的新聞工作者，懂英文；我懂俄文。這三個人今天只有我一個人活着。這是一次很重要的旅行，也是我最後一次出國。（李：是新聞代表團？）不，新聞代表團是五四年，應蘇聯《眞理報》邀請去訪問的，那次陣容大，各省報都有代表，包括當時任上海《解放日報》社長的張春橋。

這次訪問波蘭時機很巧，正是蘇共二十大時期，赫魯曉夫作了秘密報告。途經蘇聯時，沒發現什麼，到了波蘭，開國際記者理事會會議，每天去記者俱樂部，就感到氣氛不一樣了，熱氣騰騰，大家竊竊私議，興高彩烈。我跟懂俄文的人還可以交談一下，發現不少人口袋裏就裝着秘密報告的文本，但我們沒有索取閱讀。

從波蘭新聞界的變化，我看到了一個新的潮流來了。華沙街頭有不少漂亮的閱覽室，那裏有《紐約時報》和法國《世界報》可以隨便看，《華沙生活報》是最激進的，連波蘭統一工人黨的中央機關報《人民論壇報》也發生了變化，批評言論很多而且相當激烈。哥穆爾卡從監獄裏放出來成了黨的領袖。他提出可以辦非政治性刊物。他的理論是，比如一個婦女刊物，它的內容可以全是婦女所關心的東西，與政治無關，但可以少少的加一點政治進去，在她們愛看之中不知不覺受到影響。這當然有一定道理。

李：對，如果所有出版物都談政治，便會在讀者心理上滋生一種「杯葛」的本能。效果往往適得其反。

劉：我們第一次在波蘭看到共產黨的報紙宣傳資本主義國家的一些好事情。《人民論壇報》開闢一個欄目專門介紹資本主義國家的科技成就，這使我們感到驚訝，因為過去是不允許的，對資本主義只能說壞話，不能報道任何好東西。這在現在很平常，當時卻十分新鮮刺激。

歸途經過蘇聯，《眞理報》留鄧拓在莫斯科郊外休養，我則接到了著名特寫作家奧維奇金的邀請。我是五三年開始重視他的作品的，五四年他訪問中國，我陪過他，一路成了很好的朋友。他特地來電話請我到庫爾斯克他家去小敘。庫爾斯克是大戰中著名的戰場，離莫斯科很遠，我在他家約住了一個星期。白天，他在書房打字寫稿，我在客廳看他的讀者來信，那些信大部分都是受斯大林迫害，關過集中營或受到其它不公正待遇的人寫來的，也有一些對現狀不滿要求改革的信。奧維奇金還把他本人寫給赫魯曉夫的一封長信給我看了，內容是改革蘇聯體制和農業政策的建議，但赫魯曉夫沒有理睬他。奧維奇金當時在蘇聯是很紅的，《眞理報》幾次刊登他關於農村生活的長篇特寫。那是沒有先例的。他的文章很尖銳，涉及農村政策和幹部問題、政治問題，這給了我影響。所以，我從他那裏吃了些偏食。

李：我看你們這一代作家受蘇聯影響並不奇

怪，中國左翼文化同蘇俄的淵源至少可以追溯到魯迅那個時代，但像你這樣直接的影響可能不多吧？

劉：不錯，一般作家沒有我這樣的條件。我懂俄文，年輕，沒有任何顧慮。我的家庭、我的歷史都沒有任何問題。所以，我從不相信共產黨會整我，儘管我知道思想上同我不一致的人相當多，但我沒有想到我會成為共產黨的階下囚，那種念頭在腦子裏一秒鐘都沒有閃過。特別是五六年毛主席的多次講話，提倡雙百方針，整個國內空氣是擴大民主，報紙也開始變樣，《人民日報》改版，干預生活，開始得到肯定。《在橋梁工地上》發表後，我從波蘭回來，一下飛機就聽到對它的一片歡迎聲，連一些高級幹部也認為寫得很好，鼓勵我多寫。我深信，我的創作是有利於共產主義事業的。

一九五七年——一九七八年「右派」歲月

我沒想到會成為共產黨的階下囚，那種念頭腦子裡一秒鐘都沒有閃過。

李：那麽，你是怎樣掉進那個所謂「陽謀」的陷阱呢？

劉：這就一言難盡了。我只想指出一點：一九五七年悲劇的起因，不能簡單歸結為某一個人或幾個人的主觀動機問題。用這種方法，中國現代史上的很多問題就會得不出科學的解釋。一些流傳甚廣的觀念和實踐起了作用，就是：馬克思主義的靈魂——唯物辯證法中的批判精神，只能用於敵人而不能用於自己；誇大敵情，並認為任何對我們本身缺點和錯誤的公開，都會被敵人所利用從而中傷自己，等等，大約都同時起了作用。而這些東西的基

礎，則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偉大勝利和在全國人民中享有極高威信造成一種幻覺，即黨是完全、永遠正確的，因而批評和監督似乎是不必要的；同時，社會主義制度既然是人類歷史上最先進的，那麼為建立這一制度所進行的實踐也就不會有任何缺點可言。在這些觀念的基礎上，自然而然便會得出一個邏輯：寫我們生活中光明的一面，效果必然是積極的；寫問題的一面，效果就必然是消極的。既然如此，就又會自然而然地引向一個對於作者動機的追究：為什麼你不去寫大好形勢，偏偏要寫陰暗面呢？不是居心不良，又是什麼呢？

五六年七八月我發表了《本報內部消息》（兩篇），王蒙九月發表了《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這兩篇作品一出來，情況就有了變化。匈牙利事件雖在十月下旬，但波匈局勢的震蕩已經波及中國，空氣開始不同了。我們開始遭到一些非議。《在橋梁工地上》基本上是被認為「健康」的，《本報內部消息》和《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這兩篇則被認為揭露的多一些。當時有人出來批評王蒙，我還特地為他辯護，在《文藝學習》五七年第一期上寫了一篇《道是無情卻有情》，意思是這類作品看來對一些幹部嚴厲，但是眞正是對他們的愛護，希望事情辦得更好；而且一個人做了錯事甚至壞事，不等於他是壞人，問題有它的社會根源。但這時氣氛已經有些緊張了。

就在這個月，五七年一月，《中國青年報》舉行了一個小型座談會，討論我和王蒙的作品。會前每人發一份王實味的《野百合花》。這個會我參加了，王蒙沒有參加。（李：他也在共青團？）他在北京市的一個團區委工作。會上是討論，不是批判，也沒人說我和王蒙就是王實味。你知道王實味是當作反革命被處決了的。每人發一份《野百合花》再開這個會，就等於給了我一種無形的壓力，說明人們已把我們的作品和王實味的東西同等看待了。我從此悟出一個道理，那就是反右運動有它的歷史必然性。當時毛主席還沒有改變主意，他倡導雙百方針的幾篇講話都是五七年春天發表的，但下面已經自發地把我們同王實味類比了。

李：自發是什麽意思？誰自發？

劉：當然不是一般羣衆。也不是團中央的高層領導，而是一、二位熱心的中層幹部。包括印發《野百合花》，我看也不是上邊的意思。因為我們的文章表達的思想同這些人多年形成的觀念相抵觸，又有延安整風的先例擺在那裏。延安當時對文藝界的批評意見都是採取否定態度的，王實味呀，《三八節有感》呀，華君武的漫畫呀，凡是帶有一點批評性，比較尖銳，帶有一定諷刺意味的東西，都被認為可能是居心不良。為什麽別人不寫這些，你寫呢？五五年肅反批評我時，也是出於同樣的原因，即我的作品帶有批評性。這次座談會過去了，我照樣出去採訪，然後回到北京，我接到一個很突然的任務。

李：突然任務？

大鳴大放的那個春天是很值得懷念的。同姚文元相對無言的會晤。

劉：上海永大紗廠工人罷工。這個廠剛公私合營不到一年，共產黨派去的公方代表對工人提出的福利要求不予置理，惹怒了工人。那些女工們很厲害的，她們全廠罷工，並把公方代表鎖起來作人質。在編委會上總編輯張黎羣傳達了劉少奇同志的指示：事件應該公開報道，《人民日報》與《青年報》都要報道。我聽了感到很意外，儘管我到過波蘭，但共產黨的報紙報道自己領導下的地區發生的反對共產黨幹部的罷工事件，不能不使我感到吃驚，當然也令人興奮。本來我剛從東北採訪歸來，我不想出去了，但當這個採訪任務交給我之後，就同上海記者陳伯鴻一起匆匆地趕到了上海，這時正是全國鳴放進入高潮的時候，我的精神也極為興奮。

那個春天是很值得懷念的。我住在陳伯鴻家裏，他愛人就是著名的越劇演員范瑞娟。陳是個非常好的同志，厚道、深沉。每天我們一道去永大紗廠採訪罷工事件。對於上海社會上的鳴放活動，我沒有參加，但感到關切，便約兩位熟悉情況的記者向我作了介紹，我採用他們提供的上海文藝界的情況，寫了一篇一千字的報道，電報發回北京，題目

叫《上海在沉思中》。

這時北京的空氣已經變了，我毫無所知。五月十二日《青年報》登出了我的上海報道，在第三版頭條，並不顯眼。正是這篇短文決定了我的命運。究竟這一千字寫了些什麽呢？開頭是這樣的：上海這兩天細雨濛濛，但《新民晚報》很暢銷，很多上海市民在思索問題……。（《新民晚報》是當時很活躍的一份報紙）接着寫了文藝界提出的一些問題，比如說上海三十年代出了很多人很多作品，為什麽解放後出不了？這類問題到七十年代末也仍然存在。這就觸及了黨對文藝的領導。不過文章的要害也許是我激惱了柯慶施。我雖沒指他的名，但批評了上海常委對中央號召的鳴放採取抵制態度，用詞比較尖刻，我說他們「反覆無常」，這四個字是相當重的。又說市委幹部開起會來板着面孔，莫測高深，別人不敢講話。其實當時板着面孔是有道理的。我要說一下當時同姚文元的一次見面。

李：他向你扳面孔了嗎？他當時究竟扮演一個什麽角色？照理，他的底牌沒有你硬呀？

劉：姚那時大約已從團區委調到上海市委工作，是柯慶施、張春橋的部下，搞文藝評論出身的。在反右之前也寫過鳴放文章，他的思想未必是眞正的「左派」；但能緊跟風勢，後來就被譽為無產階級的金棍子了，專門打人，有恃無恐。那次見面是章靳以安排的，靳以也是哈爾濱出來的老作家，時任《收穫》主編，他要我非見姚文元不可。顯然，姚已有了內部消息，知道了反右的部署。記得是在上海文藝茶座同他見面，靳以引見後先走了，我們二人，一盤點心，兩杯咖啡坐了好久，但相對無言。我無非是想了解一下上海作家的鳴放情況，但無論我提甚麽問題，他都拒絕回答，面孔一直是板着的，給我的印象很壞。事實上他已成竹在胸，對我懷着很深的戒心，我還蒙在鼓裏。其實，除了《上海在沉思中》，我在上海的講話、文章，都已構成了罪狀。其中還有我給毛主席的一封長信，這實際上是封「效忠信」，表示擁護他去年以來的講話方針，但我發現還有許多人不理解、抵制和反對，請他注意。（李：這種信通常怎麽寄出？）那時都

通過郵政。不過我沒有發出，在反右時我主動交出來，我認為有助於澄清問題，不料竟成了罪證，說我要用自己的反黨思想來影響毛主席。

李：如果現在給領導人寫信，提出被認為是錯誤的不同政見，會不會遭到同樣的指控？

劉：我想不會。現在不同了，這是受黨章保護的正當權利。在上海呆了一個月，六月初回到北京，不久就被捲進反右運動中。我主動地毫無保留地交代了我的一切情況，從思想到言行，目的是使他們了解我不是敵人。但我的眞誠完全是徒勞的。文革中定一個案還可幾經拖延，但我的「右派」雖然宣布在七月，實際上五、六月間已經內定了。七月初，作為黨內第一批右派中的一個，正式宣佈，並在報刊上公開點名批判。當時的批判比文革文明，可以替自己辯護，沒有打，沒有低頭哈腰，大會只開了三次，其餘都是小會。反右開始時我擔心自己可能被波及，但從沒想到自己會是一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因此非常突然，精神上毫無準備。不僅我沒想到，好多人也沒想到，他們起初也不相信劉賓雁是右派，不過後來大勢所趨轉過了彎子。

李：這確是悲劇性的。强迫一個人去憎恨他所愛的人，不可思議。但我相信發生過不少這樣的事。你為甚麽不在報上發表反對意見？

劉：李怡，那不行，那才眞是不可思議的。你對中國的新聞制度缺乏了解。

李：我缺乏了解的事多着呢！比方說，究竟反右打了多少右派？外間一說四十萬，一說八十萬。

劉：好像沒有公布過，我也說不準。

李：右派之中究竟有沒有眞正的反社會主義分子？據說有人鳴放時說要殺共產黨人。

劉：幾十萬人裏沒有一個壞人？當然不能這樣絕對的肯定。說殺共產黨的是人民大學的一個教授葛佩琦，他的那番殺氣騰騰的話登出來之後，給反右運動渲染了一種你死我活的激烈氣氛。二十多年來，只要一提到反右，就會想到他，咬牙切齒，殺氣騰騰。但是七九年我聽說當年在場的人證實，葛佩琦的原話不是那麽回事，完全是出自好意，結果他成了頭號敵人……這在反右中是常見的事。

現在回頭說五七年六月，當我從上海回北京時，在火車上看到《人民日報》那篇《這是為什麼？》這是反右的信號，我明顯地感到要逆轉了。我一方面為自己担心，受批評是肯定的了，但根本沒想到當右派，我怎麼可能是葛佩琦一類的人呢？但我更擔心的是另一方面，我想如果反對右派要採取那種絕對的批判政策的話，這只會給黨的事業造成危機，以後誰都不敢講話了，這不是同整風的目的背道而馳嗎？錯誤言論可以批，但也要承認人家正確的東西，不然不得了。我在批判我的會上還在這樣講。後來形勢發展，不出所料，反右之後，人們沉默了，相當普遍的沉默。

反右之後，我變成一無所有，只剩下二十元的生活費，一家生活全靠愛人朱洪苦苦撐持。

李：海外的人們也都把五七年反右看作中國走下坡路的起點，以後搞彭德懷、搞三家村，二十年都在言論問題上做文章，付出了慘痛代價。作為一個報人，我實在不理解，歷史的教訓應該是甚麼？

劉：嗯，這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

李：反右之後，你的境遇如何？

劉：變成一無所有。甚麼都不被承認了，你的革命資歷、水平、地位、貢獻……一切都不算數了。右派分六類，前三類是極右，一、二類開除公職，自謀生路，或送去農場勞改；我是極右裏的第三類，因為歷史沒有問題，所以「留用察看」，還承認你是國家工作人員，但黨籍沒有了，工資沒有了，只給個人生活費，一月二十元。（李：你原來甚麼級別？）我原來是十三級，高級幹部的最低級，算是已經進入了高層，工資一百五十多元。加上稿費收入，每月我給姐姐就可以寄一百八十元；我還養活四個孩子，我自己的兩個加兩個外甥女。決定減掉我的工資時，他們是算過賬的，我愛人朱洪的級別是十七級，九十九元，當時是可以養活四個孩子的，如果她的工資低，可能會給我保留多一點工資。但我抽煙，二十元的生活費也是不夠用的，後來加了五元，成二十五元。一直繼續到六二年，當

時團中央系統右派都摘了帽，只剩三名未摘，我是其中之一。問我經濟上有困難沒有？我說沒錢買書，才給我暫定一個級別：十九級，拿七十八元，即原工資的一半。這算是一種照顧了。

我姐姐也被打成右派，需要我幫助，但實在無能為力。困難時期那年，她在農村餓着肚子，急需八十元買土豆做種子，不然種不下，明年沒有吃的，但八十元確是個難以負擔的數目。我說寄四十吧，朱洪說不行，再困難也要寄八十，結果如數寄去。正好那時倒霉的事一起來，我把一個月的糧票、油票、肉票、糖票、點心票全丢失了，眞是不得了。如果有錢我還可以帶孩子們上不收票的高價館子去吃，但我們一次也沒去，全靠朱洪在家裏想辦法，苦苦地捱了過去。

李：你當時的工作呢？

劉：說是留用，其實沒用。五八、五九、六〇三年我一直在農村勞動，當時幹部輪流下放勞動一年便回來，我們卻一幹三年。剛下去時說改造好了再回來，三年五年不准回家。我很想我的孩子，一個五歲，一個三歲，非常可愛，我當時三十幾歲，朱洪才二十幾歲，都還年輕，所以聽說三五年不准回家，覺得非常漫長，內心十分痛苦。幸好後來執行時靈活一點，每年春節還能讓我們回北京同家人團聚一次。但回家一次滋味也不好受，你不能同人們接觸，怕連累別人，因為我的問題是最嚴重的，就像一個痲瘋病人被社會遺棄了一樣。

李：在那些陰暗的歲月裏，你是否還抱有一線希望？

劉：開始還有點幻想。五八年，我有時想，重新入黨是不可能了，也許我還有可能寫點有價值的東西，可以發表，但六二年十中全會強調階級鬥爭之後，便不抱任何希望了。南京的青年作家方之，（他不幸於一九七九年四屆文代會前夕病逝，如果他在世的話，將會和高曉聲齊名。對於他的才華和品格，國內中年作家都深深懷念。）也被打成右派，但一九六二年在《中國青年報》副刊上發表了他的短篇小說《出山》，那是一篇罕見的傑作，我很喜歡。但是後來凡被打成右派的作家，即使摘了帽子，也

不許發表作品了。六二年王蒙也發表過兩個短篇。刊物都受到批評，說不應發表右派的東西。我比他們更臭，完全臭了，徹底地臭了。（李：一般社會人士對右派怎麼看？有人同情嗎？）農民是同情我們的，他知道你受了委屈，說了眞話，他跟別人不講的話，對我們講。當然，社會上很多人也清楚。他們是矛盾的，一方面擁護黨擁護毛主席，另方面覺得右派不壞，內心深處是同情你的。而我們呢，自我封鎖，自我隔離，見着朋友就老遠躲開，從不串門，怕惹是非。你跟人說甚麽好？我能接觸的只有朱洪的兄弟，我的弟弟，能通信的就是我姐姐和妹妹。

六一年底講政策，說右派還是應該用的，把我從農村調回報社，這也是沾朱洪的光，她是《少年報》的骨幹力量，所以在精簡機構中我留下來了，在《中國青年報》管外文資料，剪貼中文資料，有時翻譯點東西，主要是揭露美國黑暗的。後來我想，報社俄文資料較多，我來研究蘇聯吧，或許有朝一日可以做點事情。一個人總想為社會作點貢獻。

當右派最痛苦的兩件事：一是你已成了一名賤民，誰都可以罵你侮辱你，二是你想做點好事，不讓你做。

李：請告訴我，在長達二十餘年的被社會所排斥的生活中，你的主要的內心感受是甚麽？

劉：打成右派之後，最痛苦的是兩件事，第一件是你是賤民，不是一個人，不是一個平等的人，誰都可以罵你，甚至侮辱你。我的右派帽子直到六六年三月才摘，「五．一六」通知一下來，文革開始，又內定把我重新打成右派，我只過了兩個多月的好日子，後來就重新戴帽，接着又「隔離審查」，那是「清理階級隊伍」，把我關押起來，「羣衆專政」。六八年到七二年四年不准回家，不准我同家人說話，在「五七幹校」時，我愛人和兒子也去了，我們每次見面都不能說話。我女兒在北京上學，到幹校去看我也不准見面。七二年給我摘了帽子，並說六六年摘帽是對的，我不是特務、叛徒。

（李：怎麽？）文革中曾懷疑我是蘇修特務，懷疑我是叛徒，我根本沒有被捕過，怎會是叛徒？當時天津南開大學的造反派抓叛徒是很積極的。我四六年離開天津很匆忙，甚麽也沒拿，他們以為我被捕了……。右派摘帽了還是「摘帽右派」，可以隨便整你，現在還有人叫我們「改正右派」呢。所以，我會分析我的心理，這種精神折磨的最可怕、最厲害之處，就是它讓你在潛意識裏不停地想到：「我是右派，我是右派……」像一塊石頭，不知不覺之中一直壓在你心上。

第二個痛苦是，你想做點好事，不讓你做。比如你看到一個小孩在剝樹皮，想勸阻他：「你不能剝，剝了樹會死的。」他父親馬上過來説：「你有甚麽權利管？你甚麽身份？」有時小孩都會罵你，「你管得着嗎？老右派！」實際上你甚麽都不能做。文革開始我才四十一歲，現在覺得那太年輕了，但你能做甚麽呢？即使寫得出一部《戰爭與和平》也不會有人給你發表。人生在世總想做點事嘛！在幹校最後幾年，勞動越來越少，人都走得差不多了，留下我們幾個問題嚴重的廢人，分不出去。有的人無聊到去池塘抓青蛙。我的精神卻沒有鬆懈，有時覺得悶就幹點翻譯吧，手頭有本二十多萬字的日文俄國歷史書，練練筆吧。明知不可能出版，我還是把它譯完了。除此之外，就只能讀點馬克思、普列漢諾夫的書，廣播、書刊、報紙全都沒有甚麽可聽可看。就這樣在幹校呆到七七年。

反右使我眞正變成了勞動人民的一分子。反右前我已進入上層生活了，而人民的生活已經開始出問題了。

李：四人幫倒台後，你還不能恢復工作？

劉：我嘗試過，托熟人找過工作，別的不能幹，我想幹點技術翻譯應沒有問題吧。幫忙的人告訴我，他們去一個單位問：「你們需要懂外文的嗎？」「需要。」「這個人懂三種外文。」「那更好呀！叫甚麽名字？」「劉賓雁。」完了。就是翻一點石油化工的最枯燥的技術資料也不讓，實在悶

得慌。我自己找到商務印書館去做一份不要報酬的工作，校對日、俄甚至英文的譯本。直到七八年才到哲學研究所正式工作，那時它的刊物《哲學譯叢》需要一個翻譯。

李：你的右派問題甚麼時候解決的？

劉：七九年。開始我是不敢抱希望的。你看，七七年在四人幫打倒半年多之後上海一個文人以出版局寫作組的名義寫的文章，還說「右派分子劉賓雁」如何如何。歷史往往是有趣的，五七年一版一版的文章批判我，十年後的六七年，姚文元那篇《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說周揚對「右派分子劉賓雁」如何好。再過十年，七七年在那篇《評反革命兩面派姚文元》的文章中，又說姚文元對「右派分子劉賓雁」如何好。多麼無稽又可笑的事！可見我在中國臭到了何等程度！

李：反右的創傷是不是可能影響到你的創作和人生的取向？

劉：這是不容置疑的。這段艱苦的歷程給了我一個很大的好處，那就是它使我真正變成了中國人民特別是勞動人民的一分子。假如不是反右，我不敢說我現在的思想感情是這個樣子。因為，反右以前，我已開始過上層生活了，物質上政治上都很優裕；而人民的生活那時已經開始出問題了。到五八年以後這個差距更是越來越大。我如果繼續以前的生活，就會像某些人那樣，變得麻木，感情上變得衰老、遲鈍，以至養尊處優，深居簡出。打成右派後我一下子掉到了社會的最底層。在農村，假如我想吃肉，吃白麵，要農民有肉吃有麵吃我才吃得到。大躍進時浮誇中國人甚麼時候可以吃到多少牛奶、水果、猪肉，我都相信，還記在筆記本上，計算甚麼時候農民能吃到幾両肉，我大概可以吃到幾両肉。處在那樣的地位，你不可能有任何別的奢望。

一九七九年以後 面對中國社會

李：是不是所有受折磨的人都像你這樣看待問題呢？聽說不少人得到相反的經驗，就是「看透了」，對人民的痛癢、國家的前途、民族的命運不再有甚麼感覺了。

劉：消沉下去，精神支柱垮了甚至沒有生活慾望的人是有的，數量上也不是個別的。還有更可怕的，是回過頭來整人、害人。但我所知道的不少朋友，右派改正後出來工作都是幹勁十足的，他們不計名利、不理閒言閒語。這幾年我採訪中和給我來信中都有不少這樣的人。我也寫過他們。

李：你的作品都是批判性暴露性的，是否覺得歌頌沒有甚麼意義？

劉：我不這樣認為。我的有些作品雖有一定的批判色彩，但實際上寫的是好人，如《一個人和他的影子》，寫一個學生右派，這是一個很傑出的人哪！他在縣裏辦了好幾個工廠，我很敬佩他，為他的經歷所感動。八〇年以後這樣的寫作更多一些。當然我也揭了一些社會的黑暗。我的方針是寫鬥爭、寫矛盾，我確實看到很多好人在堅持鬥爭，我認為只有兩面都寫才眞實。報紙與文學應該幫助人民認識今天、認識環境和社會，所謂三信危機的發生，就是因為一些消極現象得不到解釋。我不是單純的揭露，而是要作一些剖析。

中國的事情是很複雜的，不能光看表面。有時做好事也會產生消極後果，比如，改善農民生活，大幅度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開放自由市場，當然是特大好事，但物價跟着就會上漲，城市居民又有意見了。歷史留下的重担不能歸咎某個人。這些問題的解決，也是如此。鄧小平也好，胡耀邦也好，任何個人想幾天之內解決問題都是不可能的。

我對東方國家在貧弱的基礎上搞社會主義的認識逐漸清醒起來，抱着有保留的樂觀態度。

李：有時我想，知道的越多，就越不快樂。當你面對現實的時候能否保持樂觀的態度？坦白說，在可見的將來，我是不敢太樂觀的。

劉：在一個短時期內，中國前進的步伐也許不會很快，但歷史的進程誰也阻擋不了。中國人民要活下去，而且要活得好一些，這是歷史的根本動力。許多歷史的進步因素是在默默地起作用的，這就是馬克思說的「老田鼠」。馬克思在《波拿巴政變記》的結尾處說，歐洲有一天會站起來歡呼：「老田鼠你掘得好！」歷史發展中的各種經濟的、文化的、政治的因素往往就像田鼠挖洞一樣，在不知不覺中起作用，到一定程度，地塌下去了，發生了歷史的巨變和轉折。現在，經濟的增長、文化的普及、科技的提高、對外的開放，每日每時都在發生進步的作用，這是不能低估的。

七九年時，我曾經把中國的事估計得太簡單了。其實中國的問題不僅是四人幫的問題，我們自己的錯誤，造成的後果，或者叫做歷史遺產或歷史負担吧，是相當沉重的。（李：為什麽不再推遠一些，比如幾千年？）對，五千年古國留下的惡習，封建傳統在起作用，東方國家在這麽貧弱的基礎上搞社會主義，又從蘇聯那裏搬了一些東西來……因此，我對中國的事逐漸清醒起來，抱着一個清醒的樂觀態度，或者叫有保留的樂觀態度。

李：早幾年，我一直在講，對中國的事情我抱着「審愼的樂觀」。這一兩年，我的樂觀是越來越「審愼」了。

劉：中國的事情確實不那麽簡單。世界上有沒有第二個這樣的國家——肩負着如此沉重的負担——十億人口、被破壞多年的經濟、文化以至自然生態，進行着大胆而堅定的改革，又面對着種種困難和阻力？我看中國是世界上唯一的這樣的國家。對這樣一個國家和社會，作出任何判斷都必須是愼重的。「四人幫」時候把一切問題都緊緊蓋住，誇海

口，說謊話，騙了很多人。那正是中國災難深重，我們這些了解眞實情況的人憂心如焚的時代，而海外同胞卻誤以為「形勢大好」，歡天喜地。現在，情況發生了根本轉變，儘管問題堆積如山，但遍地生機，中國二十餘年來首次走上了一條正確道路，而海外一些朋友卻陷入了失望甚至悲觀情緒。這並不奇怪，因為卽使生活在中國國內的人，要透過生活表面的各種現象去了解更深一層的過程，也不是很容易的。這三年多時間，我走過十個省份，見過各種各樣的人，和許多讀者保持着經常聯繫。

中國還有很多令人不滿和氣憤的現象，我研究造成這些現象的是什麼人，這些人又被什麼觀念或利益所驅使。

我知道，中國還有很多令人不滿、焦急和氣憤的不合理現象，我研究造成這些現象的是什麼人，這些人又受到哪些傳統觀念或利益所驅使。我之所以樂觀，是由於我看到所有這一切，都屬於衰落中的東西，並且注定要滅亡。當然，還要作艱苦的鬥爭，還會有小的曲折，還要付出代價。但是中國目前進行着的這個歷史進程，卻是誰也阻擋不了的。現在沒有一個人，沒有一個綱領或口號能夠像六十年代中期那樣使人們在狂熱中走向歧途了。因為稍通事理的中國人都會在不同程度上認識到：曾經在五、六十年代君臨中國的那個歷史課題，幾經反覆之後，現在才找到一條唯一正確的途徑，逐步得到解決。

李：國外研究中國文革的學者，也有人認為，文革應肯定的東西比應否定的東西多。

劉：就文化大革命本身而言，很難說有什麼可以肯定的東西。客觀上，它帶來的一些後果，卻是可以分析的。比如它把左傾的錯誤推向頂峯，推向極點，使那些錯誤的荒謬性變成人所共知的東西，從而在空前的震撼中使人們清醒過來，以致能夠在全民的範圍上摒棄人們長年來信以為眞甚至身體力行的那些錯誤的東西。這一點，可以說是文化大革命從反面對中國歷史所起的一個積極作用。我們付

出的代價是過於昂貴了，這是事實。

李：在一個無產階級掌握政權的國家，還要付出如此高昂的代價作學費，是令人費解的。

劉：每個民族都要為解決它的歷史課題付出一定的代價，方式不同而已。如果你把文化大革命看作少數人的任意行動，你就不會理解何以會有幾億人捲入這場無謂的運動。如果你冷靜地回顧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二年的中國歷史，你便會看到它是一個歷史運動的必然產物。的確，中國共產黨是犯下了嚴重的錯誤。然而它為什麽要犯這些錯誤呢？

我相信，你也不會認為中國共產黨是有意要損害自己和中國人民。一個黨，它雖然掌握很大權力，依然和一個人一樣逃不脫歷史的和社會的限制。中國共產黨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公開承認並努力改正。在改正中間，黨又會遇到並非由它的當今領導造成的各種困難和障礙。就我所知，中國現代大黨中，有的黨就從來沒有承認過它犯過錯誤。

李：這種固執毫無意義。回到樂觀的問題，除了大局之外，從你個人的情況來說，又如何呢？

劉：國外說批了白樺就要批我，這話不是空穴來風，但沒有實現。從我本人的情況來說，這種樂觀也是有根據的。

李：一般作家怎麽樣呢？他們還能寫暴露性的東西嗎？

劉：可以。比如《十月》，它是發表過《苦戀》和《飛天》的刊物，批白樺後它受到的壓力比較大，但它沒有太大的變化。今年第一期頭一篇小説——張一弓的《張鐵匠的羅曼史》，就是寫一對年輕夫婦的悲歡離合，實際上把二十年農村政策的錯誤全都揭出來了，但結尾是好的。《收穫》也是這樣。如果只看到壞現象，自然便悲觀了。如果你再往深處挖，把生活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就會比較地樂觀。我就有這種體驗，在北方；我看到一些令人憂慮，令人不快的事情，但在江蘇，在連雲港，我又看到了令人喜悅和鼓舞的現象。

我不贊成過份強調民主。

李：但海外更為關注中國的民主化發展。

劉：是的，要把經濟搞上去，工廠要實行民主，使職工代表大會眞正成為職工行使民主權利的形式。四川一個工廠的一個科長，同我素不相識，我在四川採訪時，他特地來看我，談到他們廠要選一名人民代表，羣衆推舉一人，黨委不同意，偏要大家選另一人，這人大家不喜歡，選了三次都不超過半數，終未當選。說明只要給人民權利，民主是能起作用的。但我不贊成過份强調民主，這個問題上我對《七十年代》有看法。中國的問題假如不從經濟文化上來解決，給農民一張票選總統，那非搞得一場糊塗不可。第一，他在現有經濟和文化條件下，對選舉會不會有足夠的興趣？第二，他有沒有必需的經濟、旅行和文化條件去了解哪怕是一個縣的代表，誰能代表他的利益？

李：你對我們有點誤會，我們從未鼓吹絕對的民主。可以說，我們希望中國做到的民主都是最基本的，起碼的，我們主張逐步的民主。當然，我們會批評一些開倒車的政策。另一個問題，中國常常把人民特別是青少年中的道德問題歸咎為文藝的影響，還有一種主張，認為文藝作品不能使人民洩氣，只應該鼓氣，你的看法如何？

劉：有一種看法，認為生活中消極的一面，你最好不去寫它，人們就看不到，或者看到就忘了。這不符合實際。怎能忘掉呢？今天出現的事，明天還會出現，唯一合理的辦法是幫助人們正確地認識它，並發動他們去和不合理的現象作鬥爭，克服它。文學和新聞是很好的武器，我們利用得不夠。有人認為，寫好的，喜慶的東西，效果就是好的，寫不愉快的東西，效果就是不好的。事實證明不是這樣。同樣的人和事，看你怎麽寫，會有不同的效果，寫出來可能是鼓氣的，也可能是洩氣的。

李：其實，一時洩氣的東西，未必就是起消極作用的。比如俄國十九世紀批判現實主義的文藝，特別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還有日本的戰後派文學，看了多叫人對人生洩氣。但悲觀而至於自殺的人終究是少數，大多數人仍然要面對現實。文藝把生活中的矛盾、問題揭露出來，使大多數人努力

去改造生活，應該說是起了積極作用。現在請問另一個問題：你是共產黨員，當你寫作的時候，你是基於信念而寫還是基於事實而寫？如果黨性原則和事實發生矛盾時，你會怎麽辦？

中國文學界再不會像過去那樣，爲一個錯誤的東西一哄而起，大唱贊歌。但要求在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

劉：黨性原則應該尊重事實，在正常情況下是不會同事實發生矛盾的，除非那個黨本身已經走上錯誤道路。當我對黨的政策或某項工作的做法有不同意見時，我可以通過黨內生活，在會議上或用通信的方式，表示我的不同意見，這可以做到。我來美國之後還給中央領導同志寫過信，對宣傳工作提出意見。如果他們不是太忙，我也可以去找他面談。除黨的重大政策以外，在其他問題上我可以通過我的文章表示我的不同看法。如果這些權利都沒有了或不許你這麽做了，那就只好沉默了。

我相信，今天中國文學界的很多人，再不會像過去那樣，為一個錯誤的東西，一哄而上、大唱贊歌。對此我敢百分之百地肯定。個別的人當然是會有的。（李：像黃鋼那一類的人有多少？）極少數，極少數。（李：他們有沒有羣衆基礎？）沒有。當然，有些思想保守的人，認為傷痕文學一來，壞的東西寫多了，把自由化問題估計得過於嚴重，這種人是有的，但不多。

李：如果你發表的東西，不符合黨的政策，算不算黨性不純？

劉：當然是囉。現在的要求是在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有不同意見可以通過組織反映上去，不准許對現行政策特別是重大政策，公開地發表不同意見。這是一條紀律，要遵守的。

李：如果省委不執行中央政策，能否在省報上發表批評意見？

劉：這是困難的，但你可以在中央報紙上進行批評，我已經不止一次這樣做了。

李：你對於文學的一般見解是什麽？

劉：聯繫中國文學的現狀談吧。現在大部分作

家都願意寫重大的社會性題材，寫人民關心的，與人民命運有關的東西，而且，這是出於個人衝動和創作慾望，是完全自發的，而不是像過去那樣聽命於上級指示或配合某一任務去寫。這樣的作家在中國青年之中相當多。有些作家寫歷史題材，也是需要的。

另外一種傾向不同，它主張作家離社會、政治題材越遠越好，似乎文學只要一和社會、政治性問題沾邊，就會損壽。這其實是對於文學史的無知。不能不看到，中國文學界存在一種走入象牙之塔的傾向，這種傾向並沒有得到應有的批評。我出國以前，有的刊物正在討論「中國需要一個現代派」的問題。追求技巧、靠技巧取勝，我是不贊成的。但我們一些文學表現手法比較陳舊了，還是「五四」和三十年代那些手法，妨礙了某些優秀作品發揮眞正感人的力量。我們在藝術上、技巧上要提高、要革新，這不排斥學習某些現代派的技巧。但是，決不能捨本求末，尤其在當前這樣一個狀況下，去搞雕虫小技，犧牲內容，追求形式，那是沒有前途的，是會被我們的讀者拋棄的。

我認爲報告文學的報告性是主要的，文學性是次要的。關心社會，關心現實應是文學的基本出發點。

我主張面對現實，在藝術上提高自己。我承認，我藝術素養很差，所以我從來不說自已是作家。我到美國後也首先說我是記者。我認為我應該有自知之明。脫離文藝二十多年了，我是很缺乏自信的，我有很嚴重的補課任務。這次來美國收羅了很多書，我要學習，可惜時間又不夠。

李：人們認為你是報告文學的高手，你的作品兼有政論和文學之美，相信你對這種文學體裁有獨到的心得。

劉：很不敢當。我認為報告文學，報告是主要的，文學是次要的。報告性是主要的，有一定的文學性。在這一個問題上是有分歧的。我以為，報告性如果沒有，或很差，文學性很强，在那裏抒發過多的個人感情，對人物作許多細緻的描寫，我認為

那不如去寫小說。

李：你認為關心社會、關心現實乃是文學最基本的出發點，是嗎？

劉：是的，是最基本的。

李：而不應該是純藝術的，但可以是……。

劉：對，只要讀者歡迎，這種作品就應允許它存在。但我認為這不是一條康莊大道。

李：你知道英文 intellectuals 翻譯成「知識分子」不是很恰當的。（劉：是不是中國對知識分子的概念同國外不一樣？）intellectuals 一詞，據沙特的說法，是指一個有獨立見解對社會上的不平現象作出抗議的人。你認為，中國知識分子在中國社會裏應扮演什麼角色？

劉：中國知識分子有兩種情況，一種專注於他的專業工作，進一步再潛心鑽研，有所發明創造，便認為完成了他的任務。另一種包括一些自然科學家在內，他們對社會問題有強烈興趣，願意發表自己的意見，希望把事情辦得更好，對政治活動樂於參與，他們比某些作家更有頭腦。（李：就是鄧拓說的「國事、家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人，他們有多少呢？）數量上可能不是很多，有强烈的激情，甚至願為理想付出代價的人恐怕是少數。但我認為，他們是中國知識分子中眞正優秀的，而且我相信會有更多的人朝這個方向去做。

萬一把我拉上斷頭台，我也心滿意足。我做了應做的事，我感到很幸運。

李：我相信，劉先生和許多我相識和不相識的中國朋友都在朝這個崇高的方向努力。但是，假如有一天情況發生變化，當然，中華民族的總的趨勢不應悲觀，但不能排除一些反覆的可能性，當有一天你又回到一無所有的地步，你對於這幾年做的事，會不會後悔？

劉：我不會後悔，絕不後悔。我說過，如果萬一中國極左派得勢（這僅僅是一個假設，實際是不可能的），把我拉上斷頭台，我也心滿意足。我做了我應該做的事情，而我做的事情發生了它應該發生的影響。我感到很幸運，我活下來了，我有過幾

次死的機會，我也曾想到自殺，但想到那些死去的人，我應承担他們的担子。人生不就是這樣嗎？我活上一百八十歲，假如處於一種冬眠狀態，政治上思想上的冬眠狀態，那生活有什麼意思！這點我是看穿了的。我覺得每多活一年，都是我的意外所得。原來是沒想到能活下來的。

李：過去愛荷華邀請你兩次，為何不能出國？

劉：總的說來，我覺得我的出國可以推遲，但國內的事要做完。我想，來固然很好，不來也有做不完的事，我的崗位是在國內。前兩年，還要忙着「打官司」。一九八一年在這上面就耗去了我四分之一的時間。要在美國呆三年太長，呆一年我都嫌長，當然對我學英文會有好處。好心的朋友也替我担心，說國外環境險惡，會不會說錯話，或沒說錯而被人歪曲了，對我不利。去年主要是生病，發現白內障，醫生懷疑我有隱性糖尿病，要觀察，時間誤了。不如今年來，可以住四個月。

李：聽說你和王若水享有某種特權，有一張特殊的記者證，到處通行無阻。

劉：沒有，絕對沒有。是他們推測。王若水更沒有，他不是記者，是《人民日報》副總編輯、哲學家。全中國都沒有一張這樣的記者證。參加會議要得到允許，當然我們可以參加一般的會，列席省委會議，他們也歡迎我們，除非特殊情況。

假如說有特權的話，唯一的就是我和讀者保持的「特殊」關係，這點我引為幸運。他們支持我、庇護我，他們給了我很多信，可惜沒時間答覆他們，感到對不起他們。

李：你現在的工作還有沒有困難？

劉：主要困難在於我寫的東西常常要引起一些麻煩，要應付一些人告狀。比如在我來美國之後，對於《千秋功罪》，就有兩個人在糾纏不休。其中一個主要人物，我既沒用眞人名也沒用眞地名，一個人偏說是寫他。你說寫你也可以，但他在廣為散發的控告信裏對我作了許多人身攻擊，有些話甚至是下流不堪的。這類麻煩有些佔用我相當多的時間，要反駁，要打官司，去年花了不下三個月。

李：你的作品描寫了那麼多的人際關係，我希望聽聽你對民族性，這個從魯迅以來頗多議論的問題的看法。

劉：我認為，高曉聲的作品就好在他接觸了這個問題。對於中國人性格中的某些弱點，我只是間接地觸及了一下。民族性格的形成有歷史影響也有現實條件，有好的一面也有壞的一面。問題是過去只說好的一面，不說缺點一面。列寧不斷說俄國人的缺點，馬克思也講德國人的缺點。另外，我們還回避這個問題，只承認階級性，不承認民族性，說到民族性只有一句話，中華民族是優秀的。現在中國有人專門講究這個問題。

李：民族文化呢？

劉：中國的民族文化應該是很豐富，很有特色的，但以舞蹈而言，我感到失望，時代感太差，成了人們生活中，一種可有可無的裝飾，連美的享受也不夠。

在今日中國的整個意識形態裏，還是文學走在最前面，這是可以自豪的。我相信，在五年到十年內，中國會出現了不起的作家和作品，可以得諾貝爾獎金。

美國社會是一個很複雜的機體，有很黑暗的東西，也有很先進的東西，我發現我們對它了解得太少。

李：最後，我看你這次來美國很用功，讀了很多東西，書呀報紙一大堆。請談談你來美國有些什麼打算？是不是負有解釋政策的任務？

劉：沒有解釋政策的任務。我的目的是了解美國社會，我發現我們對它了解太少，而了解少對我們是不利的。美國社會是一個很複雜的機體，有很黑暗的東西，也有很先進的東西。民族性格中有我喜歡的東西，也有我不喜歡的東西，我和中國讀者都應了解這些東西，從中得到一些啓示。一方面，幫助我們認識那些我們應加防止的東西將會出現，另一方面，美國畢竟是一個先進的工業國家，它的生活中有些東西預示着人類社會將來的發展。

我常常對自己提出過高的任務，以上兩點是許

多學者研究幾十年的題目，我不可能充分完成。但我想，有在美國的中國同胞的介紹和指教，也許可以事半功倍，他們熟悉美國也比較了解中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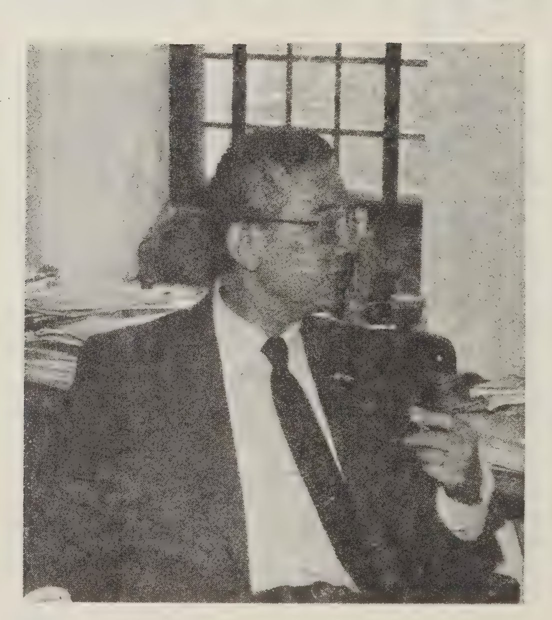
此外，我也想恢復一下健康，原打算每天游泳，還有土耳其浴，公寓的樓下就有這兩種設備，二十四小時連續開放，但我至今一次也沒利用，時間確實太不夠用了。這幾個月我原以為是能寫出幾篇東西來的。噯，我現在雖然已有了一點信心，但還不能輕率動筆，還要了解好多東西，多半要回國之後才能寫了，可是那時又將會有鋪天蓋地的事情向我湧來。怎麽辦呢？實在發愁。

李：「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我看也不必什麽事情都「只爭朝夕」吧。我們會耐心地期待着你的美國特寫，祝你成功。謝謝你接受我的訪問。



余英時談傳統文化與現實政治

時間：一九八二年十月八日
地點：美國新港



前言

余英時，一九三〇年生，一九五二年香港新亞書院學士，一九六二年哈佛大學博士，一九六九年哈佛大學中國史教授，一九七三年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院長，一九七四年美國耶魯大學歷史系教授。著有：《漢代貿易和擴張：華夷經濟關係結構研究》、《史學與傳統》等。

余英時是海外人文科學的著名學者，近十年更常在刊物上發表與時局有關的意見。一九八二年秋，我因事赴美，在耶魯大學所在地的新港盤桓，得晤余先生，並聽他漫談中國的文化傳統和現實政治諸問題，頗多獨到見解。其後將當晚談話的錄音整理發表，發表前並獲余先生過目及補充。

當天漫談，在座的還有著名詩人、任教於耶魯大學東亞語言文學系的鄭愁予和耶魯大學人類學系副教授蕭鳳霞，他們也提出了不少有啓發性的意見和問題。

一、民族性與政治傳統

李怡：大陸民刊被禁之後，我曾經對已發行的民刊作過一些分析歸納。大家知道，中國民運分子關心的是中國的民主化前途問題，他們帶傾向性的結論是什麼呢？我發現他們有幾派意見。其中一個是王希哲提出的，他認為還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但中國過去搞的不是眞的馬克思主義，不是社會主義。應該實現人和個性的解放，擴大民主與自由。另一個意見是魏京生提出的，認為社會主義根本不行，應該來一次革命把它推翻，搞資本主義。還有兩種意見則從深廣的方面着眼。一種意見是認為中國的民主需要經過知識階層作為媒介，而經濟的落後也使民主一時難以實行。另一種意見則歸結到中國的民族性和民族文化上去尋找根源。黑格爾的《歷史哲學》說中國人要羣居，羣居需要領袖，然後才能安頓。魯迅談到中國的民族性時，重點在批判中國人不能面對現實，也就是阿Q的精神勝利法，魯迅棄醫從文的目的是認為首先需要中國人的精神健全，中國才有前途。

很多人提出一個假定，如果我們的民族文化不加以改變，即使是現在大力主張民主的人上台，都

難免要出現專制的局面。近代以來，國民黨以共和即民主的旗幟推翻滿清，但後來如何？共產黨在延安確是比較民主，吸引了不少有志之士，但是掌權執政後又如何？那麽，如果魏京生、王希哲他們掌權，是不是也會搞專制的一套？這就提出了兩個問題：第一，原因在哪裏？第二，如何在中國建立比較寬容的民族文化，不致因改朝換代而蒙受巨大的民族損失？

我們也許有必要反省一下，中國的傳統文化是否存在問題，或是它的優良之處沒有發揮出來？有些人主張回到舊文化中去找民主，如徐復觀先生，有些人則否定舊文化，主張西化以至全盤西化。

中國人的智慧決不比其他民族差。在香港，在海外，中國人以頭腦靈活出名。就同日本比吧，比如做生意，一個中國人對一個日本人，日本人多半吃虧；但如果三個中國人對三個日本人，中國人就可能要吃虧了，因為日本人比較合羣，中國人三個在一起可能就要爭起來了。

余英時：這就是孫中山先生說的「一盤散沙」，這句話是對的；但是我認為這句話是就文化而不是民族來說的。作為個體的中國人並不比別人差，中國傳統的生活方式不大能適應現代的羣體社會。說到文化，姑且不講那些高級形態，只就遊戲而言，中西的分別也很顯著。中國人打麻將，同西方打橋牌便完全不一樣。打麻將是以個人自我為中心的，不需搭檔。中國的個人主義不同於西方的個人主義。從這類純以個人利益為中心的遊戲可以看出，中國人比較缺乏西方的運動員精神，特別是團隊精神。中國人是很有智慧的，個別科學家可以獲得諾貝爾獎金，但兩三個科學家在一起，合作了一個短時間，很快就會鬧分裂。這是文化問題而不是種族問題、生理問題或遺傳基因問題，是文化生活方式問題。

對中國文化，許多人抱着籠統的態度，或是全面否定它，或是全面擁抱它，這恐怕都不是辦法。我們一方面固應有綜覽全局的眼光，另一方面也要取分析的態度。

鄭愁予：如果從文學藝術的創造性來看，中國

沿襲前人的固有形式，即文化的延續性，是沒有任何西洋民族可以比擬的，因而文藝上的創造性就比西洋少。一個藝術家總是要師承以前的一個流派才覺得有地位，只有很少幾個人才能在一派一家之中發揮自己的力量。所以中國文藝的個人創作不是很强的。在傳統的政治經濟上有創見的，如王安石這樣的人，就更少了。這是很特殊的現象，既沒有「團隊精神」，又沒有個人的大胆獨創。

余英時：當然，說中國完全沒有創造力，也不公平，它也有，只是個性往往不夠鮮明。這是一種「溫故知新」或「推陳出新」的創造形態。

> **中國很早形成一個大一統國家，當然是一大成就，但這個成就不是沒有代價的，它無形中也淹沒了很多東西。大傳統太強，把所有小傳統都吸進和取代了，見不到個別地方的多姿多彩的文化形態。**

鄭愁予：中國文化是持續的，一貫下來的，西洋文化卻是一段一段的，總文化時間比中國長，可是個別的文化期比中國短。

余英時：我長期以來有個看法，許多人包括徐復觀先生都不大贊成，我覺得被認為是天經地義的中國的政治大一統，無形中也淹沒了很多東西。很早的統一，書同文，車同軌，人們歌頌的秦始皇的功業，把很多地方文化、地方特性都埋沒了。今天我們在考古中所看到的楚文化，即戰國時期文化，非常多彩多姿，但到秦漢之後這些特色都消滅了，只剩下一個面貌，文學都是一樣的語言，都「雅」化了，失去了原動力。大傳統太强，把所有小傳統都吸進和取代了，見不到個別的地方文化。比如《後漢書》中西南夷「樂德歌」的「夷語」和《說苑》的「越歌」，原文顯然與漢文化不同，屈原代表的楚文化也同《詩經》代表的中原文化不一樣。所以荀子有「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的說法。

中國很早形成一個大一統國家，當然可以說是一大成就，但是我們也應該知道這個成就不是沒

有代價的。我認為，今天對這個問題應採取開放的態度加以研究。不能武斷地、不加思索地認為統一就是天經地義。必須説明，我決無意鼓吹中國分裂論，那是不可能的。問題是在於怎樣「統一」。比如説，如果用政治强力來統一香港、台灣，恐怕不用幾年，現在這些多彩多姿的文化形態和生活方式便都消失了。固然多彩多姿不一定都好，但是中國傳統中所謂「道一風同」也需要重新檢討一番。

李怡：前幾天，我同台灣作家楊逵有過一次談話。他是贊成統一的，但不贊成一統，他説「統一」和「一統」不一樣，「統一」是大家協調，達致一致，「一統」則是把我的意見强加給你，造成一致。如果大家意見不能協調一致怎麽辦？就只有訴諸民主，多數取決，但民主又往往是一種低效率的辦法，因此，「統一」也未必比「一統」好。

余英時：這一意義的「統一」近乎哲學家所説的一種「綜合」，能夠把不同意見提高一層次，綜合起來，黑格爾、馬克思的辯證法也有這個意思。這也是一種很好的協調，這是一種很高的理想，但不容易做得恰到好處。而且，所謂民主原則也不能濫用，不能什麽事都以人數來解決問題。比如香港、大陸如何統一的問題，就不宜於用全中國人民投票的辦法解決，十億對五百萬，還要投票嗎？香港應屬於中國人的，必須擺脱殖民地的身份——從形式到實質都要擺脱得乾乾淨淨，這是不成問題的。但是香港和中國已分開了一百多年，究竟應該採什麽方式和中國掛上鈎，則不容易決定。但原則上總該由香港居民自己決定。如果香港有三百萬人贊成回歸大陸，那才可以説是以民主的方法解決問題。多數原則也不是在任何情況下都可行的。數量不能成為最高的唯一的價值。如果講民主的話，統一的問題首先便要尊重當地人民的意願。但是，看樣子現在中共絶不會同意，它所反覆强調的似乎只是主權這一項。

鄭愁予：不僅中共，任何國家在這種情況下都不會同意。像阿根廷絶不會同意福克蘭當地人投票決定歸屬。雖然一千八百人都是英國人，但阿根廷在法理上仍需進一步澄清。

余英時：香港和福克蘭島的情形不同，居民幾乎全是中國人。中共當然有理由把香港收回去。問題是收回以後對香港和中國而言將產生怎樣的後果。僅就中國本身的利益說，如果香港不再是香港，不但不復成其為財源，而且成了一個大負担，似乎不是明智之舉吧！若香港成了死港，生產停頓，幾百萬人要養，不僅把香港毀了，對中共自己也沒有一點好處。

李怡：另外還有一種說法，是中國歷史上，越趨統一，疆土擴大，中央集權就越來越膨脹，因此也越來越專制。

余英時：美國也有此趨勢，聯邦政府的權力越來越大。列根曾想把某些權力交給地方，但地方不敢要，因為涉及責任和經費的問題。中央政府權力增大是值得担心的問題，美國一些講民主的人也担心。

中國的歷史趨勢確是越來越專制，中央權力越來越大，地方權力越來越小。這個趨勢從秦漢就開始了，宋以下更甚，明、清是傳統皇權的高峯。中國沒有貴族階層，沒有强大的中產階級，社會上都是平民，因此沒有壓力集團足以構成對皇權的制衡，君民之間愈來愈懸殊。

李怡：為什麽一百多年來，中國的革命搞來搞去差不多，萬變不離其宗？

余英時：甚至可說是「每下愈況」。這大概就是司馬遷所說的「以暴易暴」吧！如果權力問題得不到制度上的合理解決，再來一次革命也許情形更糟。魏京生上台說不定比毛澤東還專制。

問題不在個人的主觀願望。革命領袖開始未嘗沒有嚮往民主自由之心，毛澤東青年時代也憧憬着「萬類霜天競自由」的境界，但一旦大權在握就不知不覺地變質了。

蕭鳳霞：中國一百多年來「越來越壞」的原因，在一個「權」字——「權」的性質及其經濟基礎。中央政府權力太大。過去封建時代，雖然皇帝權力大，但地方還有權力，還有紳士階層，但共產黨當權之後，權力集中得更加厲害，它的組織性，使政策可直達底層，促成此現象有兩大因素：第

一，黨的組織性質：每層黨幹部的工作態度及效率是由其上級評斷（evaluate），造成很大的壓力要下級聽命於上級，而不是對下面人民負責，因此黨組織基於幹部個人利益的關係，有了一種對下面人民意見的 built-in insensitvity，怎樣不實際的政策，也因此被幹部推行了，貫徹了。第二，經濟基礎的變化：這三十多年來政策雖有左右擺動，但生產資料的所有、使用與產品的銷售，卻越來越「公有化」，「集中化」，即是說，國家機器對人民生計控制很大，人民不聽命也不成。

這兩個因素加起來，地方的彈性就比較小。當然，近年來農村生產責任制的推行，與農貿市場的開放，形勢改變了一點。舉個例：大隊要建水泥路，公社卡着不同意，不給水泥；大隊幹部說，現在不怕你，我們在市場買，雖然價是高了，水泥還是買了回來，路也建了，你公社其奈我何？

余英時：在初期革命時代中共雖已走上集權的路子，但是其中還貫注着一種理想主義的精神。現在完全不同了。中央政策如果不符合土皇帝的利益，就貫徹不下去，會受到或明或暗的抗拒。一旦共產黨原始的革命純潔和道德的熱情消失了，理想主義被淘空之後，它開始腐敗了，惡化了，這種權力的集中和貫徹便只見其害，未見其利了。在某些最極端的情況下，這種集權就無異把過去的地主惡霸集中在地方幹部身上，所不同的是這種地主惡霸是合法化了。過去地主欺壓人還不合法，遇到清官還會懲罰，現在欺壓人是應該的，如幹部吊打五類分子，自覺理直氣壯。過去惡霸動私刑是犯法的，現在惡霸則同時也是酷吏，是沒有其他力量可以與之抗衡的。這幾年，我們聽到了無數令人髮指的故事，都是大陸傳出來的，有的且已見諸報章，總不能再抵賴了。正如蕭鳳霞所指出的，過去地方上有紳士，有宗族組織和各種勢力，多少還能發生一點對抗政府濫用權力的作用。毛澤東說農會打倒了鄉下的四種權力（政權、神權、紳權、族權）。不錯，但紳權、族權並不全是負面的，它們也有積極的一面。近幾十年來研究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的著作不少，我們不能完全抹殺事實。

傳統社會的另外一個好處是，中國有「藏富於民」的觀念，地方上有紳士、富戶，可以共同建倉儲糧，有時便能發生「積穀防饑」的功能，解決地方性的饑荒。財富都集中政府便做不到這一點。例如中共當年「大躍進」，全國搞垮了，地方上也沒有糧食儲備，只有餓死人。

鄭愁予：「深挖洞，廣積糧。」

毛澤東常利用十分傳統的東西，只要對他的革命有利，主要有兩方面：一是上層統治的權謀詐術，還是正史上找得到的；一是下層民衆的宗教狂熱，如白蓮教、太平天國、義和團，還是野史小說之類中所記載的。

余英時：這是套用明太祖的口號。毛澤東常利用十分傳統的東西，只要對他的革命有利。他的馬克思主義是非常表面的，主要是用來迷惑那些「向西方求眞理」的知識分子。他眞正管用的東西大部分是從《資治通鑑》、《廿四史》、還有無數表現社會心理的舊小說裏面學來的。搞紅衛兵運動的老祖宗就是明太祖。明太祖用「監生」搞土地丈量，在南京開會，召集各地學生前來，一次就是幾十萬人，同搞紅衛兵運動一樣。毛澤東對舊書是很熟的，他知道很有用。他的書齋裏盡是線裝書。以前我們不知道，接見基辛格的電影放出來才清楚。有一個生前伴讀的人寫文章說，毛告訴她，二十四史中所說的美好東西都是騙人的，不可相信。由此可見，毛澤東讀史所吸收的都是傳統中比較壞的東西，有助於鞏固皇權的東西，使他的個人意志不受限制的東西，加上他的黨是一個最嚴密、最有效的現代組織，這是從前的皇帝所沒有的憑藉。

總的來說，毛澤東運用傳統有兩個方面：一是上層統治的權謀詐術，這是正史上找得到的；一是下層民衆的宗教狂熱，如白蓮教、太平天國、義和團，這是野史小說之類中所記載的。本來中國文化是比較理性的一種文化。至少以大傳統言，它重王道，重均衡，像儒家基本上比較理性，並不像伊斯蘭極端派那樣富於宗教狂熱。但是文革時代毛澤東

和毛派卻把古代和現代的許多反理性、非理性的東西混合加以利用，眞是威力無窮。可以肯定，如果一切權力或權威都集中在一個極權式的政黨的手中，社會便不會有開放的一天。

蕭鳳霞：五十年代初期，國內還有一些社團（Social groups）可給共產黨一點批評意見與衝擊，但幾十年來的「社會主義改造」，資產階層沒有了他們的經濟基礎與社會力量，知識分子也被迫沉默了，黨外沒有了批評（Critical input）。導致政策改變的爭論（debate）只限於黨內。較樂觀的看法，只可要求黨內開明分子自發的將黨改進；較悲觀的看法，是說黨形成了一個自利（self interested）團體，雖有內部矛盾，但總不會自挖墳墓（dig its own grave），近年來專業人材被提升，也有加入黨的，但這一代會變成「technocrat」（技術官僚）嗎？只會在既定政治範疇裏搞專業四化，還是會在政治上給黨帶來新動力、新生命？

李怡：假如實行多黨政治呢？

余英時：我們暫不談黨，因為多黨制需要有社會經濟基礎，目前還不可能。比較現實一點，我們如何能有一種對共產黨構成批判的力量，使共產黨在運用權力時有所顧忌。現在，這種顧忌靠外國，比如靠美國施加點壓力要它釋放一個人。但這終不是辦法，不能靠外國政府和其它勢力來解決本國的問題。

李怡：如果說民族文化有「一盤散沙」的弊端，那共產黨確是實現了前所未有的組織化。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一盤散沙」的局面呢？

眞正的團結不能靠內外危機來維持。中共黨內在「打天下」時有團隊精神，但是這種團隊精神在得天下之後也逐漸消失了，結果變成了內鬥，不對外了。

余英時：中共所體現的是一種現代「打天下」的團隊精神。他們用「反帝」、「反封建」的口號把人民團結起來。中共在建國初期好像已改變

了中國「一盤散沙」的格局，因為「土改」仍能維繫大多數農民的共同利益，甚至打韓戰也未嘗不能激起不少人的民族主義情緒。可是再下去就不行了。眞正的團結不能靠內外危機來維持，而是要人民長期對社會體制有信心、有興趣，這個體制必須能保障人民在常態的生活中不斷改善自己的境遇——包括精神的和物質的境遇。中共至少自五七年以後便開始發狂了，「文革」則是最高峯。現在「三信」危機已表面化了，中國又回到「一盤散沙」的狀態。也許不再是「散沙」而是「一團爛泥」的狀態。毛澤東對「鬥」太有興趣，永遠要「一分為二」，安得不「天下大亂」？中共黨內在「打天下」時有團隊精神，但是這種團隊精神在得天下之後也逐漸消失了，結果變成了內鬥，不對外了。「文革」實質上是奪權運動，誰有權鬥誰，沒權請他來鬥他也不會來鬥。右派「死老虎」不鬥，鬥了沒有好處。鬥倒周恩來，就可以把國務院的權都拿過來，鬥倒陳毅，外交部的權就拿過來了，鬥倒彭德懷軍事權就有了。

蕭鳳霞：這是不是與農民的狹隘性有關？農民在經濟上是小生產者，在文化上是被動性的，認為天下是當權者的。

李怡：西方農民是否也是這樣？

余英時：也一樣，對十六世紀歐洲農民革命，恩格斯寫過，最近孔恩（Norman Cohen）有更深入研究，也具有這種歷史的被動性。

李怡：那麽這不是民族文化問題，而是經濟範疇的問題。

余英時：是的，經濟背景、經濟條件起了重大的作用。中國的農業文化延續了幾千年，所以，問題更嚴重。西方的封建期很短，只不過在羅馬帝國崩潰、西方分裂之後才開始，中國面積同歐洲差不多，但封建形態是大一統。（「封建」這個名詞本不宜用於中國，這裏姑且從俗。）西方的封建卻是分裂成許多國家，二者區別很大。

中國文化以小農形態為其顯著特點之一，小農心理是得過且過，息事寧人。「一盤散沙」的性格也許與此有關，因為秦漢以後，中國的小農有各人

自理的分散傾向，發展不出團隊精神來，歐洲中古的農村卻有不同。照孔恩所說，歐洲農民的村落是一集體（collectivity），因為村落中有公地和公共牧場，彼此必須合作，從耕種到收穫都要組成團隊（team）才成。這也許近乎周代「十千維耦」的情況。中國人直到現在，仍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越少和政府打交道越好，海外老華僑依然是如此。

蕭鳳霞：為什麼中國人那麼重視名分呢？

余英時：這就是所謂「名教」，共產黨更發展了一套新名教，以名為教，什麼黑五類、右派都是，名正而後言順。中國舊名教打倒後，又借屍還魂，來了一個馬克思名教。話還沒說就先扣帽子。

李怡：譬如講了一句激烈的話，就說你是托派，因為托派講過，而根本不考慮這話本身的是非。

余英時：中國本有古訓，不能「以人廢言」。但中共把新名教推到極端，任何人只要政治上犯錯誤，便一切完了。蘇聯都還沒有到這樣的程度，普列漢諾夫政治上出問題，他的書列寧還說能教育一代人，他的書一直在出版。但中共過去的做法是一個人政治上出問題，他的書立卽被禁，不管是好是壞。

傳統禮教道德最大的問題也在這裏。一個人只要在道德上犯了一點點錯，整個人就會遭到徹底被否定的命運，變成一無可取了。宋明理學經過意識形態化以後，就變成「以理殺人」，而且死了也沒有人同情你。這完全違背了孔子所講的「恕」道。把名教道德用到歷史研究上，於是便有了「褒貶」史學，首先問這人是好人還是壞人。中國褒貶史學的語言也是成套的，一套用之於好人，一套用之於壞人。戲台上的好人壞人用紅臉白臉表示，也是這種思想的延長。

這套東西在中共治下則發展為新名教的史學。中共研究歷史人物是十分有趣的，對人物先定性、定位，是肯定的還是否定的，再作「研究」。定位以後再由黨中央來「定調」，好到什麼程度，壞到什麼程度。這算什麼歷史？

鄭愁予：中共文藝强調愛憎分明，失去美學中的均衡道理：人的好壞與感情要從整個的形象去看，不可一刀兩段。動輒便以「人人得而誅之」這

類成語當作處斷事件人物的準則，這是一種絕對化的反人道主義的做法。

余英時：我們不需要這種絕對精神。

鄭愁予：我覺得調和折衷也不錯，這是符合人的本性的。樣板戲只有正反兩種人物，沒有中間人物。這種絕對化在政治上有時可以相機運用（例如不是朋友就是敵人）；在文學上就完全錯誤，歪曲了人性。而且，好人永遠是好人，壞人永遠是壞人，便造就了許多亂源。

二、馬克思主義與文化傳統

蕭鳳霞：一般普羅大家對政權的看法。是否也有他們文化上的限制？

余英時：中國老百姓在政治上從來是被動的，除非硬是活不下去了，才會跟着起來造造反，平時從來不是一個積極因素。統治者給農民一點小恩小惠，他就滿足了。毛澤東分點田給農民，農民就跟着他走。當然，這是大恩大惠，至今還有些老農民不忘毛澤東。但是一搞「合作化」或「公社」，就引起了許多農民的抵抗情緒。馬克思本來就說農民是很保守的。中國農民造反多是由一些地痞流氓分子帶頭，幾百萬農民是被捲進去的。恩格斯也指出德國農民起事中總是滲透了許多「江湖浪蕩之人」。

中國的小農一般是自私散漫的，他們不大可能自動自發地起來革命。陳勝吳廣，赤眉黃巾，黃巢方臘，這些所謂農民起義，其中都有不少城市的流浪分子。另外鄉間的流氓、地痞、神棍之類分子也往往是帶頭鬧事的人。總之，正當的農民決不是主動造反的人。在大饑荒或「官逼民反」的情況之

下，總有一些「江湖浪蕩之人」利用宗教迷信把農民鼓動起來，找一個題目去殺貪官富豪，從一個村鎮蔓延到另一個村鎮，不可收拾之後，便天下大亂。從農民個人的意識講，他並不想造反，更沒有改革天下的志向，只要有個苦日子過就行。朱元璋有「皇陵碑」、「世德碑」，說明他參加造反的經過，很可代表一般農民的心理。他就是「逼上梁山」的，最初毫無目的、毫無計劃。這就是農民的文化限制。中國人民是最好統治的人民。據大陸來客說，過去革命老根據地的陝北，前幾年還有全家農民挨餓的事情發生，他們依然逆來順受。如果在西方，這些人早就鋌而走險了。

中國沒有天賦人權的觀念，沒有西方宗教觀念，不信上帝創造人，因此達爾文的社會進化論在歐美引起很大震動，在中國卻被視為很自然的事，說人從猴子變來也不以為怪。西方「上帝創造人」是一個不用證明的盲目信念，因此人是生來平等的。中國沒有這個假定，認為聰明才智之不同是與生俱來的，於是就認命了。因此，命運的觀念在中國十分流行而強烈，佛教傳來以後更加強了消極的逆來順受的人生觀。這是說的一般社會上的思想狀態，不是講中國高層哲學理論。

鄭愁予：五四時期很多人提出來：中國民族性中有許多不是積極向上的成份，是否與儒家道統有關係？

余英時：儒家的東西有好有壞，其中有很好的東西。儒家不必假定上帝的存在而直接肯定人性，肯定人性的光輝，正式提出性善論。它的好處在於不與科學處於對立的地位。它從事實出發，肯定人的本性中有與動物不同的高貴的一面，即所謂仁、義、禮、智。儒家只說這種人性是「天」給我們的，但不再追溯到一個全知全能的上帝。

儒家在中國思想中是最重視剛毅進取的一派，「五四」的看法是不正確的。現在新加坡還有不少知識份子是受了「五四」影響，誤解儒家。我今年（一九八二）八月在新加坡時曾一再加以辨駁。孔子贊顏回是「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中庸》有所謂「南方之强」、「北方之强」，可見儒家看重

的價值是進取和剛强。倒是佛教、道教比較宣揚退縮的人生觀，要人知足。但是我們也可以說中國哲學要照顧兩面，有積極進取的人，也有消極退縮的人；有人入世，也有人出世或避世。儒道兩家恰好各偏重一面。

蕭鳳霞：我想在中古時代末期，西方哲學是不是已承認了人的存在價值，人是其行動的主宰也有了人的尊嚴這概念？儒家又如何？

余英時：孔子說：「為仁由己」，人的尊嚴是中國思想自始便承認的。這是說人在道德上必須自作主宰。孟子也說：「雖千萬人吾往矣」。西方中古時代人的尊嚴壓縮在上帝觀念之下，文藝復興以後才發展了近代的人的尊嚴理論。西方理論總要找一個源頭，即上帝，以為最後根據。但你若不信上帝就麻煩了，「上帝死了」又怎麽辦？儒家不窮追這個源的問題，只講人是萬物之靈，可以在文化中不斷改進自己，這是儒家的好處。不過它對人的權利的觀念不那麽明顯。

鄭愁予：中庸之道便由此而生。中國政權往往走兩極，走極端，而不行中庸之道。

李怡：外國也有中庸之道。

中國人容易接受社會主義型的思想也是有傳統的。中央集權制在漢朝時就有鹽鐵專賣，也就是大企業國有化。田制則一向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觀念。

余英時：西方的中庸之道不普遍，不明朗，在中國卻相當普遍。問題在於，實行不易，所謂「中庸不可能也」。以個人而言尤其難分辨眞正的中庸還是鄉愿。某一個人究竟是活用原則還是根本沒有原則，有時很難判定。像周恩來這個人物，是中庸還是鄉愿？恐怕一時還不能作結論。孔子也寧取狂或狷，有明朗性格。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以政權言，中庸是政策定得恰到好處，不能「一面倒」。我個人認為只有眞正的民主政治才是中庸之道，這是中國從過去到今天都未能達到的境界。

鄭愁予：從政治制度上探討，「團隊精神」是

否缺乏，與農業的經濟制度有關係，自給自足，自顧不暇，保護自己的一小塊土地的小農民經濟。我想，基本文化還是儒家傳統，但必須摒棄過去兩千年的專制意識，建立起一個新的政治哲學來。

台灣奉行三民主義，我認為孫中山寫三民主義是很匆忙的，比如「耕者有其田」的靈感，絕不是來自中國文化，而是西方思想以至馬克思主義。民權思想完全是從英美的民主思想中引來的。民族主義則很像中國的王道精神，又與馬克思主義無關，當然也不是從西方帝國主義得來的。孫中山是匆忙地將中西思想並用，寫了三民主義的體制，以現代眼光看來，尙有很多缺點。

李怡：中國人尤其是農民的極度貧困和缺乏教育，同他們接受共產黨的說教和統治，是否有必然的聯繫？

余英時：中國人容易接受社會主義型的思想也是有傳統的。中央集權制在漢朝同時就有鹽鐵專賣，也就是大企業國有化。田制則一向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觀念，王田、均田都是傳統的理想。政府一直是在同大地主爭土地和農民。這一源流長遠的傳統使得中國近代人很容易為社會主義所吸引。中國傳統社會又重農輕商，歧視商人，因此也就自然地厭惡資本主義。

鄭愁予：中共現在不是實行馬克思主義。李怡訪問郭松棻也提到這點。西方各國對馬克思的研究已進入現代社會結構和科技對人類生活的影響的層面。馬克思主義實在只是一種政治哲學的靈感。它本身沒有政策性，任何人可用此靈感制定自己的政策。不幸的是，中國革命時，正遇上列寧把馬克思主義搞成了列寧政策，毛澤東就跟着列寧斯大林走，而沒有把馬克思主義變成自己的政策，他們用剛才余先生說的封建傳統中的那部分東西去代替列寧斯大林政策中不適合中國的部分，而造成「毛澤東思想」，打一個馬克思的牌子。

所以，中國沒有一個救國的思想，毛澤東思想絕不是救中國的思想，因為它沒有把馬克思思想與中國文化和人民的需要結合好。

余英時：馬克思主義在今天是個大問題。蘇聯

官方還有幾個人研究馬克思主義，中國恐怕沒有人認眞地研究馬克思了，毛澤東生前就説過這類話。其實毛在一九四九以後也未嘗再碰過馬克思主義。至少找不出任何證據，説中共仍然努力作這一方面的工作。這本不足怪，馬克思的東西和中國情形很難眞正接上頭。

鄭愁予：馬克思主義在現在西方學術界還有相當的地位，很多知識分子還相信在科技發展到某種程度，種族宗教的影響削弱到某種程度，它可能是世界大同的理想境界，不管用什麽方法去達到。但大家相信絕不是列寧、斯大林的方法和俄國、東歐沒有人權的不民主的方法可以達到的。

馬克思主義最基本的要求是建立民主，先在產業工人中建立，因為他們比較有知識。但是，中國還沒有這樣的工人，或者很少，最多的是農民。因此，怎樣在農民、知識分子和新萌芽的現代工業的基礎上建立一個民主的政治哲學，是很值得討論的。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中，有不少儒家的傳統道德，他的做法可為借鑒。

余英時：大體説來，孫中山先生的路線沒有錯，他想結合西方和中國的好東西，他是否已結合及完全成功當然可以討論，但它比「五四」以來的「全盤西化」、本位文化，以及馬克思主義，都要合乎中國的實際。它的大方向是不錯的。

馬克思主義問題很多，我不認為馬克思主義是人類未來的希望所在。馬克思主義的高潮已過去了，以後只有逐漸退潮，它的影響已溶化在學術思想的各部門之中。但作為一個政治綱領它從來沒有成功過，所有試驗社會主義的國家，沒有一個完成了社會主義的建設任務。反而造成了很大的問題。比如波蘭，工人直接對抗共產黨。（鄭愁予：這是對馬克思主義最大的諷刺。）這可以看出，文化傳統大於政治力量。波蘭是天主教文化傳統，天主教至今仍佔最高的精神領導地位，波共也不敢碰它，如果不是蘇聯武力撐腰，波共早被推翻了。

鄭愁予：孫中山曾説，「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雖然有宣傳性質，但這句話不能忽視。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的靈感卽來源於此，應予適當的解

釋，這也是打擊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的好武器。

李怡：孫中山對共產主義究竟怎麽理解？

余英時：孫中山說馬克思是社會病理學家，而不是生理學家，可見他不贊成共產主義。但他說過「民生主義即共產主義」的話，他那句話是在國民黨容共時說的，意思很明顯他是對共產黨人說：你們何必還搞共產主義？我的三民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嘛。這句話不必費九牛二虎之力去解釋，完全是個策略，他表示：我可以包容你們，你們的共產主義不過是我們的三分之一，我還有兩個主義，你們沒有。

> **馬克思主義作爲一個社會批判的武器是非常有力量的，可是一落到實踐層次，使它制度化時，就成問題了。它可以革命，不能建國，也就是可以「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

鄭愁予：保護發展民族資本，這同現時的馬克思主義政權的政策完全不同。

余英時：馬克思主義作為一個社會批判的武器是非常有力量的，可是一落到實踐層次，使它制度化時，就成問題了。馬克思主義經過建制化之後就成為一黨專政的機器，壓得人透不過氣來。所以馬克思主義只能作為一個抗議性的、批判性的東西存在，這時它是有生命力的，有價值的。它可以革命，不能建國，也就是可以「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

鄭愁予：台灣三民主義的主張雖然在本土具有準則作用，可是三民主義在國際政治哲學上沒有應有的地位。美國專欄作家巴克雷說，台灣是個資本主義小島，經濟取得很大成就。所有西方國家，包括西歐，拉丁美洲，我碰到一些人都認為，台灣的經濟成就是依附於資本主義而取得的，他們把台灣看作是大資本主義之下的小資本主義公司。我覺得，台灣基本上不是資本主義，雖然它用了些資本主義的手法，但它有很多國家計劃經濟的產物，例如對私人企業有相當節制，納稅重，政府嚴格控制

外滙，很多事都要經主管官府的批准，所以本質上它不是資本主義。如果它是純粹的資本主義，可能還不會有這麼多的外滙積存，不會有現在的發展。

台灣一直在政治哲學上建立不起全世界認可的模式，也許叫做孫中山主義或孫逸仙模式的社會主義較能受到開發中國家的注意、效法而爭取到更多的友國。

余英時：問題不這麼簡單。台灣並不是社會主義的制度；另一方面，政府對私人企業的干預很多，因此也不是完全的自由經濟。台灣經濟有很大一部分是資本主義形態的，不過它受到節制。另外，從經濟學來說，國營企業頗不成功，很有問題。

李怡：在我同多位學者和朋友們討論中國民族文化這個命題時，總是或多或少給人以困惑之感，那麼，我們是否可以看到未來的某種突破呢？

余英時：突破首先是我們自己在觀念上的事。我們必須對中國文化採取分析的態度，不能籠統的肯定和否定。事實上，文化傳統不論你喜不喜歡，是丟不掉的。我們所能作的只是自覺地、分析地、批判地加以選擇和改造。無論是全盤西化或馬克思主義化都行不通。

把「公」和「私」放在絕對對立的地位是中國傳統思想中的一個不甚可喜的趨向。宋明理學末流把「天理」（公）與「人欲」（私）加以絕對化。毛澤東的「破私立公」是這一思路發展的頂峯。

李怡：是否只要是「中國式」的，如民主，社會主義，就對了……。

余英時：「中國式」三個字要小心注意，不能用來掩飾某種不光明正大的企圖。譬如說「中國式」民主可以事實上是一黨專政，「中國式」社會主義可以變成一黨獨佔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我認為我們着眼點應該放在社會上的每一個個人上面。在這一觀點下，民主必須是社會上每一個人的人權都獲得充分的保障，社會主義作為一種原則而言則必須保證每一個人的經濟公平，即所謂「各盡所能，

各取所值。」「公平」（fairness 或 justice）的觀念最近受到西方分析哲學家的注意，提出了新的問題。從個體着眼，一個合理的社會體制必須是「人人各遂其私以成天下之大公」。「公」和「私」在這裏是一種辯證的關係，是互相補充的。把「公」與「私」放在絕對對立的地位是中國傳統思想中的一個不甚可喜的趨向。宋明理學末流把「天理」（公）與「人欲」（私）加以絕對化對我們今天仍有影響。毛澤東的「破私立公」是這一思路發展的頂峯，其眞實涵義（至少是其具體結果）乃是毀滅人人之小私以完成一人或一黨之大私。中國人對「私」字缺乏健全的理解。「破私立公」是「天理人欲論」的現代化身，與馬克思主義無關。這又是毛澤東發展了中國傳統中比較不健全的一面的眞憑實據。原始儒家的大同小康理想對公私的看法反比後來合理。所以小康是「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而大同則是「天下為公……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不獨」兩字便表示不全廢「私」，不過要超越「私」而已。事實上，「大同」永遠是人類的理想境界，「小康」才是現實。無論民主或社會主義都只相當於「小康」的局面。宋明理學以後，中國思想家早已反省到「私」的重要性。由於章太炎以來的宣揚，我們今天都知道十八世紀戴震有「理存乎欲」的說法。我曾指出這是中國式的人權論，即每一個人都有權利去滿足他的正當的「情」和「欲」。現在我還要特別指出，十七世紀有一位陳確，對「私」字有突破性的見解，一直到今天還沒有人注意過。陳確有一篇「說私」，正面肯定「私」的價值，認為「惟君子而後能有私」。並且說：「彼古之所謂仁聖賢人者，皆從自私之一念，而能推而致之以造乎其極者也。」這是對儒家思想的一種重大發展，更可以看作中國人權論的理論基礎。這也是上面所說的，從每一個個人的觀點來看社會體制。我們如果善於發揚傳統中這類健全的思想，便可以摧破「破私立公」那一類的邪說。

中國如果有一天眞正實行民主，其形式必然與英、美、法不同。事實上英國與美國的民主形式便

大有不同，這也和社會文化背景分不開。中國眼前還不易出現兩黨制或多黨制。一黨獨大的局面是歷史上既成的事實，且不僅中國為然。日本、新加坡也是如此。但無論開始時的形式如何，民主必須是眞民主，選舉必須公平公開。民主只有一種，其他所謂「民主專政」或「指導民主」都是假貨色。馬列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說是不能成立的，是現代的政治神話，我們決不可隨便附和。

就實際情況說，台灣近三十年來出現了一個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批判聲音也很大，因此地方和部分中央選舉已有了初步基礎，這是可喜的發展。但黨禁尚待開放。大陸上也在改變之中，一時還不易看出其歸趨。大陸上還不可能出現中產階級，不過知識分子的政治比重必然越來越大，青年一代的知識分子已普遍要求民主了。「四個現代化」如果有成就便必然會逼出「第五個現代化」（民主）；如果失敗，可能會引發政治逆流，那決不是中國之福。從樂觀的方面看，我們只能期待「革命特權階層」過去之後，國家的領導權逐漸轉移到比較理性的、具有現代知識的新一代之手。等到新一代的知識人深刻地認識到馬克思主義的公式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之後，他們也許能重新正視會通中西的任務。中國這樣一個悠久的文化傳統，不是一兩百年的變亂所能毀光的。這個傳統中的合理成份必須被重新發現、重新肯定，只有在這個民族文化基礎之上才能發展出「中國式」的民主和「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現在中共官方仍然供奉馬、恩、列、斯四大洋神，一切都無從談起。

李怡：一個主義能否解決世界上這麼多問題？

鄭愁予：沒有任何主義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如西洋的資本主義也是慢慢發展出來的，資本主義的條件在中國是難以實現的。

李怡：西方也沒有資本主義聖經。

余英時：資本主義的產生沒有任何聖經，不過與基督新教的倫理有關。

中國的信心危機表現在老在想找一個新的哲學，新的萬靈藥來解決所有問題，來代替舊的一套。這是完全錯誤的想法。馬克思不行了，想換一套牛

克思。許多大陸來的留學生跟我談這個問題，我說，我不相信有任何一個哲學信仰能解決所有中國的問題，世界問題亦然。

李怡：能否說這是一種沒有信仰的自由主義？

余英時：不是完全沒有信仰，有一些基本原則，基本價值，那就是人的尊嚴，人的生存權利，人的一定程度的私有，這是不能放棄的。共產黨的公有制是一黨私有制而不是國家公有制，因為一切生產資料和產品都控制在一黨手中，黨領導人就是老闆，工人農民能控制什麼？人要是不能掌握自己的生存權利，還有什麼尊嚴？不過分發展資本主義我們都贊成，但如果完全沒有私有，你就無處可躲。某種限度的私有——即個人衣、食、住、行所必需的財產——是人的生命的基礎，起碼限度的私有制是非要不可的，否則，你飯都沒有吃的，人格尊嚴怎樣保持？

中國現在個人的尊嚴沒有保障，一切靠黨，不聽黨的話就沒有飯吃，這還有什麼人的尊嚴？人的生命權利是最基本的東西，決不容許剝奪的。中共過去最荒唐的口號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哪有政府公然鼓勵人民去受苦和死亡的道理？老子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如果全國人都不怕死，那就是造反的時候到了。

李怡：馬克思主義產生一百多年了，並成了一些執政黨的理論依據，今天，我們對它可以作一個怎樣的估計呢？

余英時：首先，我覺得應作一個客觀的、全面的基本清理，看看它的好處和作用在哪裏？它是不是解決中國問題的萬靈藥？我們不能接受馬克思主義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大前提。

蕭鳳霞：先要弄清馬克思主義的含義是什麼？它的辯證方法？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如何利用它？一提到馬克思，很多人就想到政治意識形態，而不是哲學理論。

鄭愁予：有許多人不從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和理想去作探討，而把它當作爭奪權力的工具，因此便越弄越壞，沒有人正確地對待它，比如關於它的人權思想……（余英時：它本身包含一些矛盾。）可

用它的精神，採取有用的一部分，勇敢地拋棄一部分，批判它在實際上造成的混亂和社會不安定，對人的尊嚴的損害。

余英時：比如它的歷史唯物論便不能成立。

蕭鳳霞：西方自由主義者對馬克思主義已有很多批判，但批判的是它的政治意識形態，而不是哲學思想。

中共過去最荒唐的口號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哪有政府公然鼓勵人民去受苦和死亡的道理？如果全國人都不怕死，那就是造反的時候到了。

余英時：基本哲學上要批判的地方實在太多了，比方說以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和《反杜林論》來說，這仍是十九世紀的科學觀，今天已經過時了。其中合理的部分則與馬克思主義無特殊關係，是一般科學史上的常識。這不是我的意見，是一般講科學哲學的人說的。馬克思主義的好處，說來說去還是有批判力量。

中國人為什麽容易接受馬克思？我想關鍵之一是因為馬克思主張哲學的任務是改變世界而不是解釋世界，這同中國哲學的基調一拍即合。中國哲學的精彩處不是解釋世界，正是要改變世界，所以合中國人的口味。西方哲學主流從柏拉圖到今天的分析哲學則基本上都在解釋世界，所以，馬克思來到中國正好幫了倒忙，中國需要的是補上解釋世界這一環節。西方的科學（包括人文、社會科學）當然更是以解釋世界為其主要任務的。

李怡：愛因斯坦說，我只能告訴你事情是怎樣，而不能告訴你應該怎樣。

余英時：馬克思理論的重點便在告訴人應該怎樣，這是改造世界的立場。不過馬克思畢竟源出於西方傳統，他在「應該」之中仍有「是怎樣」的一環，如唯物史觀、辯證唯物論之類。在今天看來，他的「是怎樣」的部分實在失之偏頗，我們已無法接受了。「應該怎樣」則可以說是馬克思主義最吸引人的部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能大行其道就是靠這

一部分。中國思想傳統也偏於「應該怎樣」，在這一點上和馬克思主義是屬於同一性質的。所以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不幸而為「以水濟水」，甚至使中國舊傳統變本加厲，因為它反而加强了中國思想的傳統傾向。「應該怎樣」是價值問題，「是怎樣」是事實問題。以前大家把這兩者盡量分開，最近西方思想的發展則使我們瞭解事實與價值之間的關係非常複雜，尤其在人文社會科學的領域之內是如此。但無論如何，事實與價值之間最後終有界線存在，否則便沒有客觀學術研究可言了。

現在有少數人仍談主體性，對客體性一面表現出輕蔑。這種極端態度頗令人擔憂。中國大陸三十年來的災難，其思想上的根源便正因沒有客觀精神。

儒家思想當然也是以「應該怎樣」為重心，不過其中又分為兩派。程、朱一系講「格物致知」，比較注重「是怎樣」的問題。尤其朱子强調「先知後行」，把解釋世界放在改變世界之前。這種觀點是可以引導上科學的途徑的。陸、王一系講「先立其大」，把「德性之知」或「良知」提升到絕對性的位置，講到極端便成為輕視知識、反知識，甚至有人說知識是毒藥，不但無助於道德，而且追問「是怎樣」到底反而使人懷疑「應該怎樣」了。本來儒家這兩派都是追求個人道德修養的，因此兩者儘管立場各異，尚無大問題，我們可以說二者殊途同歸。但是一到近代，整個思想情況變了。中國現代化不能完全不要客觀精神，講到科學，我們固然要發揮程、朱一系「窮理致知」的精神，即使講制度化的民主，我們也不能不注重客觀精神。陸、王的道德主體觀念當然也不可缺少，然而它的應用範圍畢竟要比程、朱狹小多了。科學研究不是主體性的用武之地。以民主而言，當然每一個個人都必須成為一政治主體，陸、王精神在此有其重要意義。但是民主首先要有客觀制度才能搭成立體的架構，否則個人的主體性根本無所依附。在客觀架構沒有建立以前，只有少數有權力的人才能表現主體精神。

過去三十年大陸上只看見毛澤東一個人的主體精神，這眞如黑格爾所說的，東方只有一個人有「自由」。黑格爾的話用之於中國古代歷史上並不正確，但不幸卻成了現代的預言。

「五四」所提倡的民主與科學仍是今後中國人所要走的正途。不過「五四」反傳統太過份，對道德主體一面的確缺乏認識。但是矯枉不能過正。現在有少數人仍然大談陸、王的主體性，對客體性一面表現出輕蔑，甚至武斷地說如果道德主體性不先建立，則一切文化——科學、藝術、宗教等——都無價值。這種極端的態度頗令人擔憂。中國大陸三十年來的災難，其思想上的根源便正因沒有客觀精神，使得一個獨夫的主體精神可以橫衝直闖，所向披靡。

我在別處早曾指出，中共特有的「紅」與「專」的問題便是淵源於程、朱和陸、王兩個不同思想系統。程、朱要在「道問學」、「尊德性」之間取得平衡，這就是主張又紅「又專」的一派人的根源；陸、王要「先立其大」，說「不能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這便主張「紅」才能「專」，甚至「紅」即是一切的一派人的老家。但這種現代化身早已與程、朱與陸、王的本來面目無關了。這只是思想上庸俗化的墮落罷了。我曾請教過許多研究蘇聯和東歐的專家，他們都說「紅」與「專」的問題在那些地區並不存在。可見這又是中國傳統的惡化，與馬克思主義無關。

目前中共領導階層特別强調「實事求是」的口號，表現了向客觀性轉化的傾向，在我看來是好事，問題在於能不能認眞地做到。

李怡：不過，從社會上說，兩派存在也是有思想根源的。中國人常不面對現實，所謂阿Q精神。

余英時：不重客觀精神，特別强調主觀、主體，這就是陸、王派的特點。這一派講到極端，只剩下一個虛脫了的精神，其他都不重要，這就變成了阿Q的「精神勝利法」。

三、知識分子與抗議傳統

李怡：余教授前面談到應形成一種對共產黨有制約作用的批判力量，我也想過，在中國不說搞反對黨，就是搞團結工會也不可能，建立某種批判力量也許比較現實，那麽誰來承担這個使命呢？

余英時：是的，知識分子是一個力量，如果共產黨有了新的生機，願意讓知識分子成為一種批判的力量，那是一種進步。

鄭愁予：知識分子的影響力，對於一個理性的政府是可以發揮的，但如果是一個具有狂熱性的或另一種哲學理論的政府，它對知識分子的影響力便可以採取有用的加以宣傳、無用的則置之不理的態度。除非知識分子構成一個威脅性的力量，若不理就會使政權發生動搖，這時知識分子才會產生眞正的壓力。

過去海外知識分子不談或少談基本的政治哲學問題，都是談具體的事件，就事論事，進行批評，比如四個現代化，批評它過急，它可以接受，緩下來，許多項目下馬，但是，它的基本政策，它的專制，封建意識的制度，主宰一切……都沒有改變，民主越來越微弱。政權腐敗到一定程度，民主制度不能建立，就可能發生激變。然而，知識分子一直對這個政權施加影響，使它不斷地改正缺點，卻不改變它造成這些缺點的基本性質和政治哲學，政權因而得以維持下去，而且它不到不可救藥的地步，革命也不會發生，民主也沒有希望。所以，我覺得，海外知識分子一方面要批評把老百姓傷害得太厲害的現行政策，同時，要建立和整理出一個新的政治哲學，至少可供某種試驗之用。我們應尋找一

個新的出發點。

余英時：如果思想上沒有新反省，客觀制度不能建立，再來一次革命，新政權上台還是照舊，以暴易暴，不解決問題。

李怡：所以，要從民族文化上着手。

余英時：伊朗就是個以暴易暴的例子，假若現在的馬克思派推翻霍梅尼政權，那情況會更厲害，更「暴」。當然，伊朗也是東方專制主義系統，古代波斯就是如此。東方專制有霸道和王道兩種，中國是王道，算比較好的。儒家、道家在中國文化裏提供了一些溫和的合理的東西，講仁道，比較顧及人民利益，規勸統治者不能做得太過，人道主義應該說是儒家的思想基礎之一。

李怡：但為什麽知識分子從未担當過社會批評者的角色？

余英時：在專制之下，他沒辦法表達意見。西方 intellectuals 一詞是法國人十八世紀首先使用的，俄國人、西方人也用了。中國古代叫士大夫，也有批評朝政的，但始終不能形成一種組織力量，只是個別的，也沒有進行過對制度和政權的本性的批判。

李怡：是否因為科舉制的束縛太長了？它使許多知識分子醉心於功名，追求權勢，而忘掉了以天下為己任，放棄了作為批評者的責任。所謂「讀書做官」，確是中國沿襲已久的仕途。

鄭愁予：中國文學作品中，對社會的不平，貧富的不公，對勞苦人民的同情心，對天災人禍的憐憫，知識分子的這種情操一直是有的，甚至是强烈的，只不過以前沒有大衆傳播，不可以充分表達，發揮它的社會功能。關心國家大事，像鄧拓說的事事關心，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

余英時：像鄧拓歌頌的東林黨，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抗議傳統，它實際上是中國的反對黨，是知識分子的積極表現，大學生運動從東漢就開始了的。但是這種傳統不容易持續下去。

鄭愁予：《儒林外史》中描寫過鄉民關心國家大事，朝廷每次有快報傳下來，大家就傳閱，對什麽人罷了官之類都甚有興趣，讀書人在這種從京畿

至鄉村的傳閱中是起主要作用的。

余英時：抗議是有後果的，朝廷是要抓人的，你沒處可躲，只有流淚，當亡命徒，像譚嗣同的絕命詞寫的「望門投止思張儉」沒處可跑，跑到哪裏哪裏受連累，社會上沒有一種力量保護你。像美國有法律保障報章電視的批評權利，政府把它也沒有辦法，但是，中國一直沒有。中國知識分子集體地在政策上同政府對抗，在人類歷史上是最早的，這是光榮的傳統。可是在大一統的專制下很容易被各個擊破，擊破後幾十年，幾百年也難以恢復。

鄭愁予：余先生提到知識分子在民主化中的作用，我想到國民黨當年推行十年「訓政」，當然也是要靠知識分子。關於文化傳統中壞的部分如何去掉？記得我小時候參加過解放小腳和新生運動，這都是反對舊習慣的工作。中國的一些老毛病，都與農業社會的落後有關，很多人早就想過，但後來就忘了，只想到如何取得政權。鞏固政權。改造中國文化的建設性工作就做得越來越少。五四運動的破壞性比建設性大，只是在文藝上有所建樹，在政治上完全沒有建樹，沒有提出一個完整的方案……。

余英時：我們對五四時的知識分子也不能要求太高，他們沒有組織，是不起作用的，一旦有組織後，他們就變了，就不是知識分子了。

鄭愁予：最近讀了傅斯年的信，感到他的愛國情操是很值得敬佩的。如果一個政權知道要保持它的新生、活力，就應該重視知識分子的作用。抗戰時，國民黨搞過參政會，請有學養的知識分子參加，除了不能攻擊最高當局，什麽話都可以講，成為一個自由論壇，這是傳統觀念中發展出來的措施。

余英時：國民黨對知識分子還保留了一些傳統做法，尊重士大夫階級有學問的人，請他們講學，有些像「經筵講座」的樣子。但毛澤東不同，他一方面看不起知識分子，另一方面在知識分子面前又有自卑感，知識分子的命運就慘了。

李怡：究竟當前知識分子在中國應扮演什麽角色？

余英時：首先必定是批評者的角色，其次是以專業知識促進現代化。

鄭愁予：我覺得光批判不夠，有些政權為了自己的穩固，歡迎知識分子有限度的批評。

余英時：不批評，組黨嗎？台灣都不允許，大陸可能嗎？放棄了批評的責任，那就枉為知識分子了。（蕭鳳霞：批評什麼？）什麼都可以批評，不一定都在基本問題的層次上批評。當然，根本性的批評是最重要的。

李怡：如果一個政權不容納批評，批評便只有願意作出犧牲的人才敢於去做，而願犧牲的人是很少的……。

鄭愁予：而且，在那種情況下，不能通過公共傳播進行批評，批評的影響力就很小。

余英時：我認為，情況會發生變化，以後權力會逐漸轉移到有知識的人手中。中國現在也在要求幹部知識化，要利用知識分子的知識。不過那時會出現什麼情況？比如電腦在人們生活中的作用，我們不能想像。將來的遊戲只能是有知識的人去玩的。現在的政治局還是長征幹部在玩，將來老的死了，加上科技發展，沒有專長的人想玩也玩不了啦。

鄭愁予：那時，知識分子就不止是批評，而是要參與，在內部發生影響。

余英時：西方宗教是耶穌不管撒旦的事，中國讀書人就要管，治國平天下，這是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國革命同西方不同，都是知識分子領導。俄國、東歐和中國都不一樣。中國知識分子確確實實是站在第一線的，這個傳統沒有死掉，包括現在不成功的民主運動。

鄭愁予：一個政權穩固時，它對批評就不愛聽，不但不聽而且動不動就抓人，所以最後不起作用。像《七十年代》在海外影響力很大，但對大陸政策就沒有影響。（余英時：間接地有影響。）除非是它覺得你《七十年代》說的話預示了它的某種危險，它就不得不去聽，否則，就置之不理。

余英時：中國文化根源深廣。毛澤東所用的不過是中國的一套帝王權術，特別是明太祖，是他的正宗祖師爺。四九年我就聽說毛對吳晗的《朱元璋傳》提過很多意見，當時我沒在意，沒想到「文化

革命」全暴露出來了，連口號都搬來了，「深挖洞，廣積糧」。他唸古書，不像讀書人是享受，欣賞，他確是「古為今用」。他知道怎麽利用人、整人。你駡兩句他也不在乎，他五七年搞「陽謀」估計錯了，他以為人們只會小駡，知識分子已經臣服於他了。可是一下子爆發了抗議式的浪潮。這是我樂觀的地方，卽中國知識分子抗議的傳統是不會斷的，野火燒不盡。中國文化傳統中的理性成份終會制服權謀詐術，這是我個人的信念。

中國知識分子抗議的傳統是不會斷的，中國文化傳統中的理性成份終會制服權謀詐術，這是我個人的信念。

鄭愁予：知識分子缺乏對現實的分析能力。如三十年代的某些作家把中國兩千年的封建罪過都要國民黨負責，直到今天還沒有理性的區別。

李怡：中國有個簡單化的做法叫「歸類」。可以因一句話把你歸入右派，親國民黨一類，又可以因另一句話把你歸入美國革命共產黨一類。總之，是先强調你的「立場」。先判斷後分析。

余英時：西方人對這種「歸類」稱之為 name-calling，以惡名加諸人，最無聊。西方人沒有「名教」傳統，他們總是先把事情搞清楚，然後再下判斷。中共則是先有喜惡判斷。站穩立場，然後才面對事物。這種倒置的思維，不可能產生科學，民主也不會有。

李怡：討論問題不是注意它本身，而是先研究討論者的立場，出發點，甚至什麽「來頭」，是不是來幹我了？這樣，在爭辯時就帶上了情緒的痕迹，損害了討論的客觀性。

鄭愁予：西方人吵完了就完了，事後就忘了。他們眞是對事不對人，與人不相干。

李怡：那麽，海外知識分子對中國能做些什麽呢？

余英時：我認為，海外知識分子是很關鍵性的。它應該提供一種聲音，這種聲音在國內還不能直接說出來，因為在香港至少可以說十五年。把共產黨

的眞面目說清楚，看它是不是代表工人階級和人類最美好的未來。中國是可能有美好的未來，但希望不在他們身上，尤其要戳穿他們拿中國文化中的壞東西維護自己的私利的本質，促進他們由此而引起的反省。他們之中有些人是能夠進行反省的，應該相信這一點。

當然，問題不是那麼簡單，不是像五四時代喊幾句打倒孔家店就完了。但五十年之後來反省，會看得更清楚。像魯迅說，你若要知道將來尊夫人是什麼樣子，你就到中央公園去看看那些老太婆，以後尊夫人就是那樣。他很懂得時間的力量。你看，毛澤東現在顯相了，同明太祖非常像，他畢生嚮往的就是秦始皇、漢武帝這些人物，明太祖也是他心中的英雄。

李怡：魯迅揭穿假面具的本領是令人敬佩的。

余英時：他揭得還不夠，因為時代不同，他以為共產主義一來，便可以解決所有問題，這是他後期相信的。他說，中國書可以不讀或少讀。但他讀的外國書也有限。我認為，不讀中國書不能了解共產黨，沒有中國書就等於沒有鏡子，怎能照得出醜惡美善？做知識分子等於做一面鏡子，讓人照去。

鄭愁予：我們仍然希望他們把壞的政策去掉，讓人民多得一點福利。

余英時：共產黨像他們常說的從「量變到質變」不是不可能的，我們希望如此。不能說他們絕對不會變，四人幫打倒了，學術自由恢復了一些，情況還是比過去好多了。我常向大陸來的學者說，這三四年是中共當權以來學術思想最自由的時代，比「文革」前還要好。但以我們海外的標準說，當然還大有距離。

我對共產黨的看法，基本上是不相信它會很快地變好，但我也不願意相信它絕對不會變好。可以肯定的一點是，中國再經不起一次革命，而且革命沒什麼好處，換一批新人可能更壞，因為他們有銳氣，保持權力的本事也更大。

鄭愁予：我想眞正的革命沒有那種條件，兵變政變之類的事則無法預測了。

李怡：若有兵變那就更糟了，可能更專制。

余英時：也不一定，可能造成分立局面。搞政治避免不了 compromise（妥協，折衷）無論蔣經國、鄧小平都非如此不可。不能罵政治家妥協。那樣批評就落空了。作為知識分子，我們同大權在握的人必須保持一個距離，我們並不怕他們，也不躲避他們，但是不能依附他們或作他們的代言人。知識分子必須在自己與權力之間劃一條界限，不能不講原則，不能隨便妥協。

作爲知識分子，我們同大權在握的人必須保持距離，我們並不怕他們，也不躲避他們，但不能依附他們或作他們的代言人。

李怡：我想我們的討論可以告一段落了。我們談到了中國的民族性、民族文化、哲學傳統、現實政治和當代知識分子的抗議精神等問題。這些大問題都是一下子談不完的。不過，也許這是《七十年代》探討中國問題的根本所在的一個開始，以後還要請各位深入寫點文章。

余教授能不能為我們的討論作一簡單的小結？

余英時：我們這次是古今中外無所不談，很難用幾句話作總結。但是大體也可以看出幾點共同的傾向：

第一是我們都感覺現實有歷史文化的背景，關心中國前途的人不能沒有歷史文化的深度，西方也沒有現成的萬靈藥，可以供我們取用。

第二是我們都感到思想上的反省工作還得繼續深入去作。

我們非保持一種完全開放的心靈不可，不能作抽象的名詞概念的俘虜。西方人叫 the tyranny of concept（「概念專制」）。在思想工作中沒有不能懷疑的「天經地義」，但是懷疑又必須有根據，不是撕破一切的虛無主義。這兩種態度是相輔相成的，所以必須隨時隨地下功夫，思想問題無法偷懶。

「天下為己任」是傳統士大夫的說法，現代知識分子則是社會的良心，要說出自己能心安理得的話。在目前階段，中國知識分子尤其應當發揮批評

的功能。但我們又不能自以為是，發現自己的錯誤之後便應毫不遲疑地自我糾正。知識分子容易流入「自我中心」的格局，這是我們大家都要引以為戒的。



昨日之路

七位留美左翼知識分子的人生歷程

寫在前面

這一個專題，包括七篇訪問稿，是在八二年五月間在美國進行訪談後寫成。七篇訪問稿都是獨立的，但合起來則使我們看到，七位早年受愛國主義或社會主義思潮所吸引的高級知識分子，分別走了怎樣的人生道路，經歷了怎樣的心路歷程，以及他們今日如何檢討昨日之路，如何觀察現在，以及如何展望未來。

引起我去發掘這些訪問題材的動機，不能不說是由於劉大任寫的《知識分子的窄門》（刋於《七十年代》八一年十二月號）他在這篇文章中，誠懇地回顧了保釣運動時所有積極參與者的熱誠，肯定了「老保釣」中儘管不少人對政治感到幻滅，但「對於深刻影響衆人生活的政治現象與中國的前途這個大問題，甚至關於人類的良知與未來，我想所有『老保釣』從來就沒有放鬆過自己的關懷，也沒有放棄觀察和分析。」「他們在社會批評者的人格承担上是首尾一貫的。」

劉大任的這種認識，是我決心進一步發掘這方面題材的出發點。趁這次應邀到紐約聖若望大學開會之便，進行了有關的訪問，並在雜誌上以「昨日之路」的專題方式刋登。

由於時間及行期所限，除了這七位朋友之外，還有一些我覺得應該訪問的人未能接觸，這就只有期諸日後了。

七位被訪者合起來看，頗有一些有趣特點：七位被訪者當中，四位有博士學位，另三位在放棄學業時正在攻讀博士班。因此，都是留美的中國高級知識分子。

兩位曾經同屬於威斯康辛（麥廸遜）保釣會的人，一位十年後成為紐約的工商界名人，另一位則

在美國工人運動中從事反對美國資本主義的鬥爭。

兩位台灣省籍的人士，一位是實行家——十年如一日地全職從事在海外支援台灣民主運動的工作，另一位則是思想家——十年來為求眞理而不停地刻苦鑽研馬克思主義的理論。

兩位福州人，外加一位半個福州人，在自然科學方面都曾經成績超卓，都有博士銜，而都因為當年的左翼思想而放棄了不少個人的東西，走上一段相當崎嶇的彎路，儘管三個人的彎路各不相同。

不過，以上這種概括也許是拙劣而無益的。每一個人的人生歷程是如此不同，還是讓他們自己來告訴讀者他們對過去的回顧、對人生的感嘆、對國是的唏噓以及對事物對世界的認識的心得吧。

訪問時有錄音，也有筆錄，但限於整理這些訪問稿的時間緊迫，所以不能每一句準確記錄下來，只能盡量用不直接引述的方式以筆者的文字記下。倘有記錯之處，希望有關的被訪者來信更正及補充。

此外，我所做的，基本上是盡量照被訪者的意見如實照錄。被訪者的高見，有的是我不能企及的，有的是我未敢苟同的，因此，他們的意見絕不等同於我的意見。鑑於數月前有過混淆訪問者意見與被訪者意見的對我的無聊的攻擊，故不得不作此聲明。

但不管被訪者的意見是否與我相同，他們始終是我的朋友，而且是在不同的地方，共同走了一條漫長而曲折的思想路程的朋友。不同意見不能影響我們的友誼。經過這次訪問，我更以我能認識這些朋友而感到自豪。

有七年回歸體驗的段世堯



第一位我要訪問的對象，是段世堯博士。訪問他的主要原因，是由於他是台灣留美學生中最早的左派，是第一個要求回中國大陸服務、並在大陸生活了七年的學者。一九七三年底他一家子離開中國了。這以後，他的妻子陳秀美（若曦）寫了不少以文革為題材的優秀文學作品，並因此蜚聲國際。而段世堯，卻從來沒有在公開場合吐露過他對這一段難忘的人生歷程的眞正的心聲。

五月八日下午，在美國加州柏克萊的段世堯家中，他答應接受《七十年代》的訪問，對他過去的經歷作了一次回顧，並表達了他對人生的一些感慨。

回歸中國七年，離開中國後又經過七年的周折，段世堯一家人的生活才安穩下來。

這是我第一次認識段世堯，儘管在這之前早就知道了他的不少事情。他給我的印象是：一個老實到有點木訥的中年人。他講話緩慢，不怎麽有條理，但那副誠懇的神色使人對他所説出來的話無可

置疑。

我首先請他簡要地談談他的生平。他是福建福州人，一九三五年出生。父親是國民黨的軍統，長期負責看管張學良。一九四九年，他隨家人到台灣，一九五七年台灣大學土木系畢業。當兵一年後，於一九五九年拿獎學金到美國。一九六四年與陳秀美結婚。一九六五年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獲流體力學的哲學博士學位。一九六六年九月一日夫婦二人到歐洲，在巴黎的中國大使館申請囘國服務。在法國等了一個半月，於十月十八日到上海，十月二十日到北京。在中國七年，兩個兒子在中國出生。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全家離開中國大陸到香港，在浸會學院教了一年書。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全家移民到加拿大。先在溫哥華的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做超博士。一九七八年九月全家又移居美國，陳秀美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中國研究中心做研究，家居柏克萊，而他本人則在佛羅烈達州的邁亞米大學當助理研究員。直至一九八一年，他才在加州找到穩定的工作。現正在一家著名的工程顧問公司——Bechtel Power——担任高級工程師，負責地震工程的研究。在中國的七年是文化大革命的混亂時期，夫妻二人有五分之三的時間不在一起生活；離開中國後的七年又為求取一份穩定的工作而經過許多周折。十四年以後，全家人才生活在一起過長居久安的日子。

當初放棄在美國發展專業的機會，放棄在美國申請永久居留，走了許多彎路，終於又囘到美國，在美國發展專業，申請永久居留。段世堯囘顧這一段往事，自己都覺得是對人生的一大諷刺。

像他這種性格的人，即使當初不回歸，往後也會回去；這一段人生道路總要自己走一下。

然而，段世堯是不是悔恨自己所走過的路呢？他說，像他這種性格的人，即使當初不囘中國大陸，往後也會囘去；這一段人生的道路如果不是自己親自走過，是不會相信的，總要自己試一下。

他囘憶他在台大同班的同學蘇紀蘭，雖然有段

世堯的經驗作殷鑑，他還是在一九八〇年全家回中國服務去了。

「蘇紀蘭是幸運的，」段世堯說，「他在文革之後國家實行開放政策並大力發展現代化的時期回去，現在任職杭州海洋局第二研究所工作。做得有成績，也有意思。中共對他很禮遇，薪金高，回國兩年被派出國三次。」段世堯並不因為自己離開中國，而否定他的好朋友回國服務的成功。

但他自己是不幸的。回國時正值文革，待遇低，沒有貢獻自己所長的機會，加上中國的現實使他失望，遂使他在人生中走了一條大彎路，又回到十多年前的出發點上來。

當年為什麽會回國服務？

段世堯回想起來，愛國的動機還是主要的，對社會主義並沒有太多的了解。在台灣時，他就不相信國民黨的反共宣傳，常常偷聽中共的對台廣播。他記得當聽到中共建成了寶成鐵路時，他自己也感到作為一個中國人實在值得驕傲。一九五九年到美國後，因為一直拿獎學金，不用打工來維持學業，因此有更多的時間看書。埃德加·斯諾的書《紅星照耀下的中國》，菲利克斯·格林的電影《中國》，激起了他的嚮往中國大陸的熱情。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時，他與楊振寧的弟弟楊振平同住。一九六〇年，在事先計劃安排下，楊振寧、楊振平到瑞士，與他們的父親——在上海的數學教授楊武之——及家人團聚。回到美國，楊振平跟段世堯談中國的事情，使他更感興奮。此外，在美國看到貧富不均，個人競爭激烈，更使他嚮往中國社會主義的平等。於是很早就下決心要回中國服務。在東部，段世堯與蘇紀蘭等搞了讀書會，一九六五年串連到柏克萊，與西岸的左派聚會，在互相鼓勵下更加强他回國的決心。

陳秀美當時的想法是不是同他一樣呢？

秀美的「進步」要遲一些，段世堯回憶說。他們是一九六四年結婚的。在這以前，由於想回國服務，他拒絕過一次婚姻的機會，也拒絕了多次職業的好機會。在一九六四年結婚前，他與秀美取得協議：秀美同意不回台灣；但如果要她去大陸，她說

還要考慮。於是在結婚後，他和其他「志同道合」的朋友就努力幫助秀美「提高認識」，直至她在一九六六年同意一起回歸中國大陸。

為什麼要離開中國？

主要是中國的現實與他自己原先的想法相距太遠。具體來說，一是自己在中國毫無貢獻，二是中國的制度與政治氣氛使他失望。

在中國七年，個人對國家的貢獻幾近於零。

段世堯是十月十六日出生的，因為到中國大陸那天是十月十八日，因此他在中國所填的出生日期是十月十八日，以此來表達自己的「新生」。他抱了很大的希望要在中國貢獻自己的力量。在「個人意願」一項下，他甚至塡了只要對祖國有利、願意夫婦分開兩地工作。然而，在中國七年，他回想起來，個人對中國的貢獻是幾近於零。他除了走五七道路、下放勞動之外，眞正使用過他原來的學識的，只是摘要翻譯過一本《有線單元化》的書，並且是供內部印刷傳閱用的。他的專業是大氣物理，與海洋、氣象有關，但海洋局與氣象局都是保密局，當時中共是不放心讓他這種出身的人去參加「保密」工作的。（現在的情形自然有了改變，蘇紀蘭就在海洋局工作。）至於秀美，在中國七年的貢獻也只是教了一年的英文，她的中文寫作的才能是完全用不上了。

至於中國的政治現實，以段世堯的七年經驗來說，則是赤裸裸的權力鬥爭。原以為共產黨是比較有朝氣的，從斯諾的《紅星照耀下的中國》也看到這種朝氣勃勃的吸引力，誰料眞正接觸，才知道是掛馬克思主義的羊頭，賣封建主義的狗肉。原來非常崇拜毛澤東，到最後發現他是一個封建帝皇。去中國時，他不知道蘇聯發生什麼事，只知道那裏出了技術官僚，而文革是反官僚階層的。於是在中國看到一些自己不能接受的現象，也千方百計為中共解釋，努力要說服自己。然而，客觀現實使段世堯逐漸醒悟了。他越來越對中國的制度失望，覺得受

了毛澤東的騙，對共產黨也沒有信心。尤其是，當毛澤東提出文化大革命十年後要再搞一次，這個世紀內要搞兩三次，段世堯不能不恐懼地感到這種鬥爭的生活不能再過下去了。他說，「我們這些知識分子無論如何放不下臉來」。於是，在回國一年後又申請離開的郭子家擠開了來去自由的門以後，段世堯一家也申請離境了。

另一個要離開中國的因素，是在中國沒有什麽朋友。可以通信的朋友只有三個人。一九七一年，他給周恩來寫信，希望調動工作。信封上寫「國務院周恩來總理」，寄掛號時，郵局的人見到也毫不驚訝，反而面無表情。冷漠、呆滯，已使許多人對新奇的事毫無反應了。寫信給周沒有結果，段世堯又寫信給楊振寧的父親楊武之，但同樣沒有回信。是的，楊武之也沒有辦法，而且一九五七年以後，知識分子大部分都傾向於明哲保身了。

自然，生活的艱苦也是因素之一。那時候，段的工資是七十四元人民幣，陳秀美六十四元。現在，蘇紀蘭回國每月工資是二百元。子女受教育的機會，那時是講「工農兵學員」，知識分子的子女是沒有什麽希望的；現在的政策是改了。

離開中國時，心中痛苦，好像自己做了逃兵一樣，不想回顧往事，只是自求多福。

儘管段世堯一家在中國的經歷如此，但他離開中國時，是心裏十分痛苦的，他覺得自己好像做了逃兵一樣。當時主要是段世堯堅決要走，秀美反而說離開中國還要掙扎，對離開有所顧慮。不過不管怎樣，他們還是離開了。

當秀美以「陳若曦」的筆名發表文革的悲劇性小說時，海外一度傳言段世堯不贊成他妻子寫這類作品，甚至有人說他們夫婦為此幾乎反目。是不是有這種事呢？段世堯對陳若曦寫的小說抱什麽態度呢？

段世堯表示，剛離開中國時，心中痛苦，不想回顧往事，甚至與朋友也不想說，說起來總是滿腹傷心事，覺得自己似乎自甘受毛的騙那樣。秀美的

小說像是在挖自己的瘡疤，在粉碎自己的理想，在寫自己的醜事。而他抱着痛楚的心情，只望找一個安靜的地方，過穩定的生活，自求多福。所以，秀美開始寫小說時，世堯是反對的，在香港爭了很久。但後來，他看到這些作品對中國的正面意義，他就沒有阻止了。不但不阻止，而且為了求得一個更加安全、與中國更加隔離的環境，他放棄香港理工學院的聘書（一份穩定而高薪的工作），移居加拿大，使秀美更能放心地寫作。秀美的字跡很潦草，很多稿件還是段世堯幫她抄寫的。其中如《歸》、《向着太平洋的彼岸》，段世堯都提供不少意見，實際上是參加了陳秀美的寫作。

對於中國，段世堯是不是已到了「哀莫大於心死」這個地步了呢？他是不是還在關注着中國呢？

「儘管個人遭遇如此，但還是對中國抱有希望，究竟還是自己的國家，還是吾土吾民……」

剛離開時，的確是有點「心死」的感覺；其後他支持陳若曦的寫作，說明他還是把中國的事放在心上，還是保持關心。

「儘管個人遭遇如此，」段世堯說，「但從國家民族的前途來看，還是對中國抱有希望，它究竟還是自己的國家，還是吾土吾民，還是世界上的一個大國。但對中國的體制，實在很懷疑能不能好好運作，是不是要大大地改變一下。我們一直關注中國的事。香港大專學生為王希哲被捕的事上訪，我和秀美都簽名支持。對民主化的進程，應加以鼓勵，幫助中國的民主力量的成長。」

有沒有想過再回中國講學或者訪問呢？

「我們原來工作的單位——華東水利學院的統戰部曾要求我們回去，但我個人沒有這個打算，」段世堯說，「主要是因為我在美、加的工作一直不安定。現在安定下來了，希望在抗震專業方面多吸收一點新知識，以後到中國大陸或者台灣去介紹一下。我是一直有心為中國做些事的。現在回台灣介紹專業、講學的學者多，相比之下，去大陸的人就

很少了。此外，對於一些華人專業人士在美國搞的促進中國科技發展的『科技教育協會』，我也支持。」

有沒有想過回台灣？以及對統一中國的看法怎樣？

「台大土木系曾找過我回去，」段世堯說，「開始時我不想回去。我覺得自己過去對台灣有愧，對父母、弟妹也沒有盡自己責任。回中國大陸，受到他們的抱怨。一九七九年，我的大兒子回台灣看我家人，以後秀美也回過台灣。父親退休後，去年父母來美國團聚過。將來我當然是有可能去台灣的。

「至於統一，我原則上是贊成的。原先回中國大陸，是以為秀美是台灣本省人，可以作為與大陸溝通的橋樑。但現在看來，談統一還不夠條件。大陸與台灣，應在民主與法制方面好好競爭一下，不要你判魏京生十五年，我判黃信介十四年……。」

人的一生中，像段世堯那樣經歷的人也許不多。在走了那麽大的一段彎路以後，你看這老實人有什麽地方改變了呢？我雖然是第一次見到他，第一次與他談話，但我可以想像他十四年前的情景。那麽，讓我下一個簡單的結論：對中國的熱誠，他是並沒有改變的，所改變的是對中國的認識，他是比以前實際了。

「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負責人林孝信



林孝信，十多年來在關心國是的留美華人中是一個爭議性的人物，是直到現在為止還是全職從事運動的人，是被國民黨吊銷了護照。自己也放棄了專業而居留權又發生問題的人。大體而言，給人的印象是放棄了個人的一切，把全部時間投入在海外促使台灣民主與進步的工作的人。

儘管許多人都認為，林孝信這種全心全意投入對國是的關懷、並且身體力行的人非常難得，而且甚至可以說這樣的人獨一無二，但是林孝信並不以為他這十多年所做的事有什麼了不起。他不以為自己「偉大」，甚至他認為他所做的事大部分是形勢所迫所以他才會做的。也是為了這原故，他從來不願意接受任何大衆傳播媒介的訪問，即使是學生刊物的訪問。

《七十年代》要搞這個「昨日之路」的訪問專題，如果少了林孝信，就是很大的缺陷。然而要說服他接受訪問，實在比訪問本身更艱難。

要說服林孝信接受訪問，實在比訪問本身更艱難。

林孝信是台灣省宜蘭人，一九四四年在台北出生，自小在宜蘭長大。一九六六年台灣大學物理系畢業。當兵一年後，於一九六七年拿獎學金到美國，一年後在芝加哥大學通過了物理系哲學博士資格的考試，但沒有拿到博士學位。考試完他就一頭栽進搞台灣《科學月刊》的工作中，負責在海外組稿及聯絡工作。從此放進專業的時間就少了。一九七一年，林孝信參加了保釣運動。除了一月二十九日在芝加哥的示威和四月十日在華盛頓的示威之外，他從保釣一開始就投入了《芝加哥釣魚台快訊》的編輯工作。這份刊物是保釣學生刊物中壽命最長的一份。從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七年，共出了一百五十多期。

一九七四年，林孝信因為參加芝加哥的保沙運動（保衛南沙羣島的運動），而被國民黨政府吊銷了他的「中華民國護照」，於是他的居留與學業都成了問題。在這種情形下，林孝信就沒有再在芝大註册，他的每月三百多美元的研究費也再拿不到了。而居留方面也成了美國一個「黑市居民」。他靠着積蓄和朋友的幫助，以及到各地演講所得的演講費、旅費維持生計，另方面仍投身於關心台灣問題的運動中，聯絡各地的人，收集、分發資料，對台灣的民主運動、人權運動以及進步事業進行海外的聲援。到一九七八年，有人發動定期捐助林孝信從事的支援台灣民主運動的工作，並由他發起並組織了「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他等於在一批熱心人的支持下受薪全職搞運動。當然，以美國的準標來看，他的生活是非常簡樸了。

林孝信從小對科學有興趣（大學三年級時，他就在台灣《新生報》編「中學生科學月刊」），在台大物理系及芝加哥大學（他搞運動以前），他的成績都是突出的。是什麽因素促使他放棄專業而投身於關懷國是的運動中呢？

林孝信由於是台灣人，因此剛來美國時，很快就接觸到台灣同鄉中反對國民黨統治及要求台灣獨立的思想傾向。儘管在台灣時他也與同學在私下談過台灣人被外省人統治的問題，但是到了美國可以

公開討論，他才領悟到台灣人痛恨國民黨之深。在感情上，他覺得這是很容易共鳴的，然而在理智上，他不覺得有必要的因素海峽兩岸要分離。這也許同他從小就對一些流行的東西反感，比較傾向於獨立特行有關。他回憶說，他關心台灣之心越來越深切，卻並沒有像許多台灣同鄉那樣傾向於台獨。

一九六八年辦《科學月刊》是一個很好的經驗，這使他在美國能夠聯絡到許多人，並被台灣及美國一大批關懷國是的華人知識分子所認識。

一九七〇年底的保釣運動，使林孝信同芝加哥其他搞《科學月刊》的人，立即投身入芝加哥保釣會以及《芝加哥釣魚台快訊》的工作中。林孝信認為，一九七一年的四月十日的華盛頓示威，是保釣運動的第一個里程碑。第一個里程碑的出現完全是自發的。在四月十日的華盛頓大示威中，台灣人參加的很多。其後，由於國民黨的昏庸無能的表現，使許多人對國民黨失望了。為什麽國民黨那麽令人失望？於是大家開始探討國是，研讀近代史，國是研究社紛紛成立。就在這時候，發生了基辛格訪華的事件，更促使許多人從保釣轉向對中共的認同。到九月的安娜堡國是大會，因為大勢所趨，自然就產生了倒向中共、反對台獨、反對一中一台這樣的方案。這是保釣運動轉向統運的里程碑。這樣一來，釣運開始時那種對台灣問題關切的色彩減弱了。台灣人，特別是對外省籍的國民黨不滿而對中共又缺乏正面認識的傾向台獨的人，都紛紛退出了統運。

林孝信表示，這是釣運從一個自發的愛國運動轉向對一個政權認同的錯誤發展。他在那時就決定，不能像其他台灣人那樣從運動中退下來，而要力求糾正向統運發展的錯誤。為此，他在《釣魚台快訊》中寫了許多反映台灣人受壓迫的感情的文章。他認為，釣運不應導致反台獨，這種反台獨而實際上是損害大多數台灣人感情的運動發展的錯誤方向應有人指出及改正。由於芝加哥也有和他志同道合之士，所以他的文章能登出來。

七一年以來，以林孝信為代表的芝加哥《釣魚台快訊》，就獨樹一幟地沒有在對中國的介紹方面

「一面倒」，而是以關心台灣為主。起先是對台灣各方面的關心，其後，由於一九七五年台灣選舉所帶起的島內民主運動，遂使林孝信的關注較集中在台灣的民主運動方面。直至一九七八年成立「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

「我的理想是台灣人民能眞正當家作主。而無論獨立或統一，都要首先增進海峽兩岸的人的更密切的了解。」

林孝信這種獨具一格的做法，長期受到傾向中共的統一派和以台灣本省人為基礎的台獨派的兩面夾擊。統一派指責林孝信是台獨，或至少是在反對統運主流，而台獨派則指責林孝信是併吞派。兩大派的人都企圖說服林孝信，但沒有人能成功。有人說林孝信頑固得像一塊石頭，於是背後就叫他做「林石頭」。

「我覺得我是擇善固執，」林孝信說，「我認為我看到了一些問題，而這些問題，尤其是搞釣運、統運的人，看到的並不多。因此我覺得我有一種責任去提醒人們關心台灣問題，不要忽視台灣人的利益。如果說我的這種看法已經形成一種力量了，那麼我也許就不必再堅持去做了。我不認為我一直以來所持的態度有什麼不對。曾有人說過，一個人在野的時候，比較不容易犯錯。也許上台變成當權派以後會有所不同吧。不過，我始終沒有處於人多勢衆的時候，並且始終沒有跟任何政治權力發生關係，我一直是在野的，因此我也始終不覺得我有過什麼根本性的錯誤。當然，技術上的錯誤是常有的。」

既然林孝信如此自信他的看法、做法符合大多數台灣人的利益，那麼他這一派的勢力為什麼不能壯大呢？

林孝信提出幾種因素：首先是一般人都願意選擇比較簡單的道路，統一，獨立，認同中共，都是簡單明瞭的，而他的關心台灣的民主與進步，卻沒有一個明確的目標與方向，因此不易被人接受；其

次是，正義的事情，民主的力量，從來不是很容易得到發展的，統治者常常要用各種方式加以控制，眞理被少數人認識以至發展壯大，往往要很長的時間；其三是，他認為他本身並不是一個適合搞政治的人，口才不好，文章也不好，在政治方面的領導能力是比較低的。他說，「我從小到釣運以前，根本做夢也沒有想過要搞政治。搞政治非我所長，對我來說實在是一件痛苦的事，是不會感到快樂的事。」

既然這樣，他有沒有想過放棄，或者有沒有後悔自己丟掉專業呢？

「林石頭」表示沒有什麽後悔，主要原因是他覺得既然他對台灣人的命運感到關切，而他又看到釣運轉向了一個錯誤的方向，因此他有責任「擇善固執」下去。

他這種「擇善固執」有沒有價值呢？他的努力與「献身」有沒有產生效果呢？

「林石頭」表示，如果效果不那麽好的話，不是因為他努力的方向不對，而是也許他自己沒有做好。不過，他認為他的努力是有成績也有價値的。過去他比較多花時間在說服統運人士這方面，而近年來，在他的朋友中，已有相當大的比例改變了看法。所以不能說他的工作完全沒有效果。至於台獨方面，由於過去他與台獨方面的溝通少，所以台獨對他的誤解較大，說他是併吞派。不過，老林認為，台灣人原沒有先天的台獨傾向，他們傾向台獨是基於對國民黨的統治不滿，中共的表現又令他們失望，海外統運人士與他們的對立也使他們更不願與統運人士溝通。老林不否認台獨中有帝國主義力量的影響，但多數人傾向台獨並不是要靠向帝國主義，把台獨說成是「帝國主義走狗」是不對的。林孝信說，「台灣人本來也是開放的，他們比較容易受理想所吸引，因此我的主張也不是他們不能接受的。」

說了半天，林孝信的基本主張是什麽？理想是什麽呢？

林孝信說：「講起來像是口號，但我確實很是認眞的。我的理想是台灣人民能眞正當家作主。我相信社會主義是人類的前途和方向。在海峽兩岸的關係上，我覺得無論獨立或統一，都要首先增進兩

岸的人的更密切的了解。我覺得台灣人與中共不存在根本的敵對關係。台灣人的傾向台獨應該説同中共的政績及缺少對台灣人的反抗壓迫的鬥爭的了解有關。長期來説，我認為海峽兩岸的某種形式的合在一起，是對雙方有利的。」

而林孝信所從事的工作，就是在海外支援台灣民主運動，並藉此增進大陸人對台灣的了解。

為什麼林孝信不强調對中國的關注，以及不談支援中國民主運動，甚至不熱心中國的事呢？

林孝信表示，他不是不熱心，也不是不關注，只是他覺得海外華人對中國的影響和可以發揮的作用太小。中國的發展變化主要靠中國大陸的因素，海外只能起觸煤的作用。中國太大，政治制度與西方教育背景的人不一樣。海外一些人對中國抱很多希望，覺得中國應該這樣，應該那樣。但中國是不可能這樣那樣的。海外一些人的批評態度也未必正確，往往帶着個人的主觀成份。即使是正確的意見，中國也不可能照海外的正確意見去改的。中國的事只能由中國大陸的人自己去改，我們海外的人不必過份期望。否則就會心理上受挫折，很洩氣。在海外談中國問題，重點在使海外華人對中國有符合實際的了解認識，而不要冀求對中國有什麼影響。

「在海外談中國問題，重點在使海外華人對中國有符合實際的了解認識，而不要冀求對中國有什麼影響。」

那麼為什麼在台灣問題上，海外華人又可以發生影響呢？

林孝信認為，台灣的情形有所不同。一來是海外華人中有台灣背景的人相當多，二來由於台灣地方小，一向對外界的聯絡較多，對外界的反應也比較在乎。台灣每年來美國留學的人有五千到一萬人，而大陸來的留學生這麼幾年加起來才一萬人左右。加上兩岸人口與土地的比例，海外華人要對大陸有影響，的確要理解到我們的能力與條件的局限。近年來畢業後回台灣工作的人很多，從台灣到

美國或從美國回台灣短期訪問的來來往往的人也很多，即使留在美國，也會與台灣的進步力量有所接觸，因此對台灣的體制改革可以發生作用。

那麽，沒有台灣背景的海外知識分子，比如說香港來的留學生，是不是也可以為台灣的民主與進步貢献力量呢？

林孝信表示，沒有台灣背景的人，如果長期關心國是，還是可以對台灣的民主化起促進作用的。具體來說，比如陳明忠案，芝加哥地區參加反對國民黨政治迫害的人士中，香港同學就佔一半以上，出的錢也很多，對台灣的人權、民主，作了一定的貢献。另方面是自釣運以來，香港同學由於沒有顧忌，不怕有什麽人打小報告，所以敢出頭，確實具備有利的條件。

林孝信說，台灣由於國民黨封鎖，及海島的局限，使一般人的胸襟不容易寬廣，許多人的眼光比較只看到台灣。但一個人如果要着力於進步事業，即使只是從事一個小地方的進步事業，也應該具備世界性的眼光，對全人類的進步與前途都要關懷。在這方面，香港同學的參與，可以使台灣出來的人產生更廣濶的胸襟與眼光。

對中國大陸與台灣的前景，林孝信有什麽看法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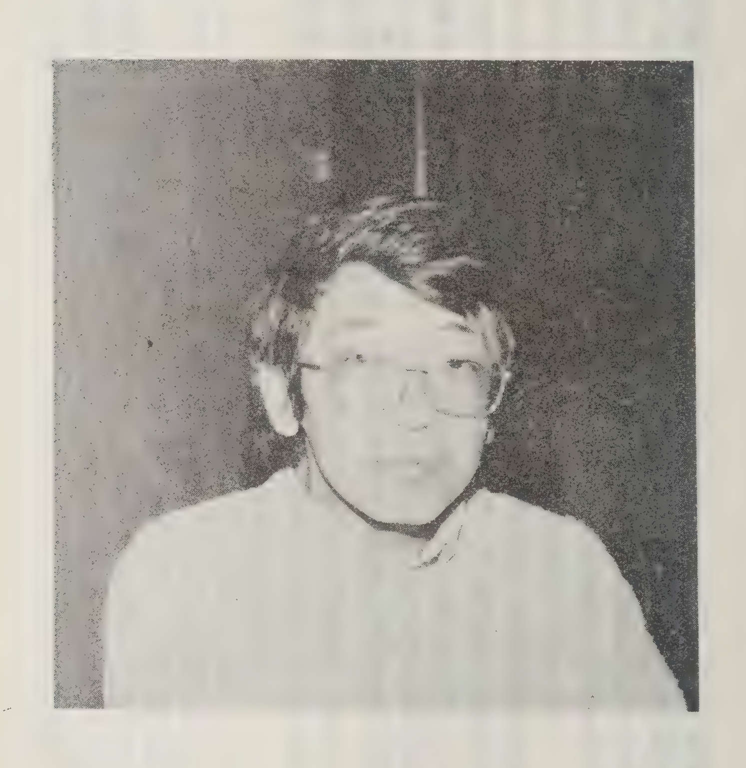
林孝信表示，他對中國大陸的前景，比目前一般海外華人知識分子也許樂觀一點。中國由於封閉太久，加上文革後遺症，有許多不良現象是突然開放之後的短期現象。比如說特權問題，相當一部分官僚是文革受害者的補償心理，這批人過些時候就會過去，不會永久存在。當然，中國有些根本問題，比如說現在常講中國的美好童年，也就是五十年代時候，其實那時已隱藏不少根本問題，只是當時感覺不到。因此，現在說中國的前景樂觀還是悲觀，都不是很有根據的。老林說，「現在雖然有不健康現象的湧現，但長期來說，健康的力量是不會永久壓抑的。我還是相信健康的力量終究可以克服許多不健康的現象。」

至於台灣，林孝信認為，台灣幾年內會由於蔣經國的健康惡化，而產生嚴重的權力轉移問題，加

上經濟的困難及中共的壓力，台灣將會歷經一個歷史性的改變。中共領導說八十年代解決台灣問題，林孝信認為不完全是一句空話。台灣的權力轉移如果順利完成，中共的「統一大計」至少要拖延二十年。三、五年內，蔣經國可能去世，中央民意代表也差不多死光了，不能不作徹底的改變，如果中共不能利用國民黨這種困難而發揮作用的話，一旦權力和平轉移，台灣局勢趨於平穩，新的掌權者更沒有願望和歷史感要與中共和談了。因此，這三五年將會是中共解決台灣問題的關鍵時機，中共對台灣的壓力這幾年將會加强。但由於中共對台灣現況及台灣人民强烈要求當家作主的認識不夠，中共急切的推動統一將會受到極大的阻力。

最後，林孝信表示要在這次訪問中强調他對釣運的正面看法。他認為，一九七一年的保釣運動，儘管有不成熟的地方，有後來轉向統運的方向性錯誤，但當時參加釣運的絕大多數人都是有理想的，熱誠的。參加者當時都從高貴的動機出發。現在有些對釣運的描述，把當時參加者的動機與貢獻抹煞，並不符合歷史事實。對當時的參加者也不公平。甚至台獨，起先也是支持釣運的。後來，一方面由於對中共的認同以及中共領導的介入，另方面是與台獨的對立，使運動放棄了對台灣的關懷，使大部分台灣人都退出了運動，這可以說是釣運發展到統運的極大的錯誤。但即使有這樣的錯誤，釣運對海外華人知識分子的影響也是正面的。它促使許多人保持對國是的長期的關心，以及對社會、對人羣、對人類進步事業的關心。如果沒有釣運，就沒有那麼多人關心國是。此外，參加過釣運的人，在分析問題的深度及辦事能力方面，都經歷一段磨煉。釣運所產生的這些正面影響，在許多年以後，仍會發生積極作用。

長期鑽研理論的
郭松棻



與林孝信這位日日夜夜從事「運動」的實行家完全不同類型的，是另一位釣運期間美國西岸的活躍分子郭松棻。郭松棻自一九七四年以後，即完全退出了「運動」，一切與羣衆運動有關的場合都見不到他，辦雜誌、寫文章等等似乎也沒有他的份。有人說，郭松棻自一九七四年去中國訪問回來後，由於對中國的失望，已完全沉默了，「龜縮」了，什麽事情也不幹。這句話一半對一半不對。七四年到中國訪問使他失望、沉默是事實，然而他並非什麽都不幹，而是非常忙碌地進行革命理論的探索。

這八年來，他日夜閱讀及思索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由於用功過度，去年患了嚴重的神經衰弱，既不能睡，也不能服安眠藥(胃病及引起第二日的暈眩)，體重減輕到只剩下九十磅。冬天回聯合國上班，有時在進大門的風口處，人被風刮得往往要進一步退兩步。今年以來，健康才恢復一些。

早已聽說郭松棻在從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探索，但一直沒有機會聽他談談心得。這次要做「昨日之路」的專題，也很快地想到要訪問他。在電話上，他表示同意了，也約好了時間。但他聲明：由

於去年害病，有關的理論探索已經擱下了，現在跟我談，也只能泛泛而談。其中有些理論的原句比較精確，但不能一一找出來。要筆錄的話，他覺得不夠嚴肅。但由於要趕時間，這份筆錄連給他過目的機會也沒有。蒙他同意，先讓我發表。如有錯記之處，只好以後請他糾正了。

從小他就是在「亞細亞孤兒」的心態中長大的，使他較傾向於譴責性，對事物的批判性較強，當然也希望對事物的譴責可以導致社會的改變。

郭松棻是台灣省台北人。一九六一年台大外文系畢業，當兵一年後，一九六六年任台大外文系助教（其間教的是「英詩選讀」），一九六六至七二年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任研究生（曾獲比較文學碩士學位），一九七二年進聯合國任翻譯迄今。

在台灣及加大時，郭松棻曾參加過《劇場》和《現代文學》的編輯工作。七〇年底保釣運動開始，郭松棻即積極投入，與劉大任等創辦《戰報》。七一年他和許信孚、周尙慈、劉大任等在柏克萊組成教學小組，在校內教授「中國近代史」，基本上採取中共的近代史觀點。其後又辦《東風》雜誌。一九七三年開始，他用羅安達的筆名在《抖擻》雙月刋上寫關於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文章。一九七四年夏，他曾到中國大陸訪問了四十二天，這也是他生平唯一的一次在中國大陸的經驗。這以後，儘管聯合國的工作給他每兩年提供一次到遠東來探親的假期，並由聯合國負担他一家的來回機票，但他八年來都沒有在假期離開紐約。

是不是一九七四年他去中國四十二天的經驗，促使他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進行探索呢？

他承認這是因素之一，但還有其他的因素。從個性上說，他從小喜歡看書，是傾向理論、傾向抽象思維的人，在台大時他大部分時間是修哲學系的課，儘管他在文學方面的情操還是很濃。其次，是他

的台灣人背景。從小他就覺得台灣人是被欺負、被蹂躪的，也就是說，他是在吳濁流所說的「亞細亞孤兒」的心態中長大的。這種心態，使他較傾向譴責性，對事物的批判性較强，當然也希望對事物的譴責可以導致社會的改變。初中時，他在文學中找到魯迅，覺得魯迅的作品是他所需要的東西。在西方文學方面，他一直尋找到卡繆，才找到了自己要的東西。後來，他看到有一個人反對卡繆，這個人就是沙特。從接受卡繆，到沉迷沙特，直至後來接觸到沙特後期所信服的馬克思主義，應該說是郭松棻在保釣以前的「左派」背景。沙特晚年的一句話，說馬克思主義到現在仍然是活的思想體系，而且是唯一的思想體系。這句話說得那麼重，使郭松棻很早就覺得不能不弄懂馬克思主義。

保釣以後，郭松棻一九七四年到中國訪問了四十二天。他形容從進海關開始，整個經驗像「一場惡夢」。以前他看《人民畫報》，看《中國建設》，對中國的進步很自豪。當時他指着《人民畫報》上的民兵實彈演習的圖片與人辯論：你看，連槍彈都能發給人民，這個社會的人民多麼有權；想想在台灣當兵，正式入營受軍訓，槍彈還是受管制的。然而，到中國大陸看看，才發現滿不是這麼一回事。他看到中國的落後，看到中國基本上仍是農業社會，特別是他以在中國大陸生活的設身處地的角度去考慮，敏感地感受到人民的生存權利和自由都不被尊重。去中國之前，他在《抖擻》發表過一篇文章，介紹沙特與卡繆的辯論，他原來對卡繆的譴責很厲害；從中國出來以後，他的看法也改變了。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也許應該深入探討、重新認識吧。

另一個因素是保釣運動向統一運動的發展。儘管林孝信說從釣運向統運發展的里程碑是一九七一年九月安娜堡的國是大會，但郭松棻卻自認「中國統一運動」是由他積極參與的「加州柏克萊保衛釣魚台行動委員會」發起的。他說，儘管在這之前，美國有些地方已經存在着認識中國（大陸）及呼籲統一的活動，但正式要求把保釣運動發展為統一運動，要求各地保釣會中的部分成員另組「中國統一

行動委員會」的，是加州柏克萊。一九七一年底，柏克萊保釣會寫成書面文件，向各地發動「統運」，這就把本質上是衛土的、民族主義的保釣運動，推向本質上是政治的、意識形態的統一運動了。

郭松棻回想當時他們發起中國統一運動的主要原因，「不能不說是受到中國宣傳品的統戰，而對中國社會產生不實的看法。其實，那時候中國大陸的人民正陷於四人幫時代的絕境。」

在中國大陸訪問四十二天的經驗，以及對發起「統運」的反省，使郭松棻得到的教訓是：我們對由政府壟斷的宣傳永遠要採取置疑的態度。四人幫時代應該這樣，四人幫之後也應該這樣。因為現在資料還是被當權者一手壟斷。

在中國大陸訪問的經驗，以及對發起「統運」的反省，使郭松棻得到的教訓是：我們對由政府壟斷的宣傳永遠要採取置疑的態度。

這幾年來，郭松棻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上，大體而言，他探尋過一些什麼問題呢？

第一，他探尋馬克思本人的起點是什麼？馬克思生活的社會環境對他的學說有什麼影響。郭松棻發現，馬克思學說的世界主義觀點和他的猶太血統大有關係；另一方面，馬克思的起點是西歐中心論。西歐國家基本上沒有什麼國界，因此，馬克思斷言資本主義必然滅亡，工人階級沒有祖國等等，同他的生活環境是有關的。這種西歐中心論的學說，不僅是中國不能套，連中歐、東歐都不能套。

其次，他從探尋中了解到，要真正了解馬克思主義，應先釐清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的差異。現在大家講「馬列」「馬列」，其實「馬」是「馬」，「列」是「列」，並不是一回事。從馬克思生前跟俄國民粹派的交往中，可以看出馬克思並不贊成俄國單獨鬧社會主義革命。後來由於歷史發展所逼成的列寧的一套理論，即「一國社會主義」，是違反馬克思主義中的國際性的考慮的。俄國的錯誤造成日後「社會主義」國家中一連串怪乖的政治行

為。列寧及他的追隨者批評西方馬克思主義為修正主義，其實把原始的馬克思主義修正得最厲害的，應該是列寧主義。我們追溯歷史，看到俄國當時有一個像瞿秋白那樣的人物，就是俄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普列漢諾夫，他在一九一七年看到俄國革命背離馬克思主義了，就有了退志。這是我們追溯歷史時值得注意的重點。郭松棻表示，他說「退志」而不說「退意」，是因為他覺得「退」是要有勇氣的，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中國人說「急流勇退」，就强調了「勇」氣。這段俄國的歷史，再探尋下去，他看到蘇聯從列寧主義到斯大林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原點已越離越遠了。

其三，是從蘇聯回到歐洲，看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變化發展。剛才說，馬克思主義源於西歐，是西歐本體論的想法。到第二國際（一八八九－一九一四）的失敗，標誌着西方馬克思主義臣服於蘇維埃馬克思主義的開始。西歐正統讓位，俄國偏號當道。從此馬克思主義經歷整整半個世紀的被曲解和被誤用。由於列寧、斯大林得了政權，西方的馬克思主義者一個一個在俄羅斯面前屈膝稱臣。從被列寧指為修正主義的考茨基、伯恩斯坦，經過葛蘭姆奇（A. Gramsci）、盧卡奇（G. Lukacs）、柯爾施（K. Korsch），到布洛赫（E. Bloch）和列飛伏爾（H. Lefebvre），每個人都或多或少在蘇聯的陰影下編織他們的思想，他們沒有苟同蘇聯的意識形態，他們比較接近原始馬克思主義。經過點滴的努力，到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沙特、葛爾曼(L. Goldmann)、阿爾杜塞爾(L. Althusser)、科雷蒂（L. Colletti）再進一步推進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

西方馬克思主義在現實政治上的成果就是歐洲共產主義的出現。歐共的特色是慢慢恢復以西方為主位的思想，恢復了自信心，從而擺脫蘇聯在思想上和行動上的控制。我們看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在俄國取得政權後，自信心消失，向俄國俯首稱臣，經過半個世紀的迂迴，才恢復自信心，才知道俄國的東西原不是我們要的東西，從而否定蘇聯，否定東方搞的一套，而要接上第二國際以前歐洲馬克思

主義的傳統，恢復眞正的馬克思主義，恢復原來的馬克思主義精神。

馬克思主義經歷整整半個世紀的被曲解和被誤用，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才知道俄國的東西原不是他們所要的東西。中國要考慮的，恐怕是中國的特點和背景。

最後，郭松棻的探尋回到自己的祖國。從馬克思主義源頭，經過俄羅斯革命，再看中國為什麽會有這樣的革命？以後為什麽會有這樣的創傷？在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傳播中，他發現原來中國這麽少馬克思主義者。在對馬克思主義的了解關鍵上，陳獨秀算是馬克思主義者；在對蘇聯的觀察上，瞿秋白也算一個，但理論上不夠細密。那麽，中國搞了半天，搞的是不是馬克思主義呢？正如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發現蘇俄的一套不是他們所要的一樣；中國要考慮的，恐怕是中國以至整個東方的特點、背景。中國與蘇聯不同，但也有相同處。

經過這一番探尋，郭松棻是否認為，馬克思主義被蘇聯、中國所曲解和誤用了，而西方馬克思主義才是出路呢？

郭松棻表示，他研究歐共的理論是有戒心的，因為歐共都有政黨。有時候，理論不能不屈從於政黨利益的策略性考慮（例如，倘這個政黨同蘇共修好時，就不能把蘇共的理論批得太厲害），而在學術上不那麽可靠與準確。歐共的主要成就是在於思想上和心態上擺脫蘇聯的控制，準備恢復原來的馬克思主義精神，但是，西方馬克思主義本身的發展還沒有大的突破。郭松棻說，普蘭扎斯（N. Poulantzas）、密立邦（R. Miliband）對國家理論的闡發有點小進展；盧卡契、沙特、威廉斯（R. Williams）對藝術理論下過深功夫，但他們的見解經常是窒抑多於誘發藝術創作的生機；辯證法方面，盧卡契和沙特有點建樹；而目前馬克思主義最弱的一環是經濟問題，被公認為較有成績的孟德爾

（E. Mandel）、羅茲多斯基(R. Rosdolsky)和德依契爾（I. Deutscher），其理論都是停留在十九世紀政治經濟學的框框裏，對當代資本主義的經濟運作了解不夠，這是決定今日馬克思主義能否成為大型社會學理論的關鍵處。除了經濟以外，其他方面，西方馬克思主義仍有過份沿襲傳統而難以創新的僵勢。

就古典馬克思主義來看，對這種學說的弊病和優點，郭松棻又有怎樣的認識呢？

弊病方面，郭松棻列舉了以下四點：

第一，馬克思主義對人性作單面性的了解，只看到人受壓迫後要求翻身的進取心，而低估了人受壓迫以後更屈從卑微的一面，他對無產階級的神聖化帶有濃厚的烏托邦色彩。這種脫離現實的看法一旦作為政策落實時，往往造成劣幣逐良幣的混亂。

第二，馬克思主義重視整體性，而忽視構成整體的每個個體。它亟待重新建立一種意識哲學，確定個體的價值，這樣以個人－家庭－社會連鎖而成的整體才可能健全。

第三，關於國家理論貧乏而多謬誤。馬克思所說的「工人沒有祖國」，經不起歷史的考驗。反之，現實的發展是民族主義勝於工人的階級意識。二十世紀走的是與馬克思主義背道而馳的道路。這是一個民族主義的世紀。儘管有些國家號稱建立了社會主義，其實那些國家的政權特質和動力是民族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只是它們的旗幟。

第四，經濟理論的過時，加上過分强調平均主義，結果在經濟上實行往下拉的齊頭主義，而不能往上提升。羅素曾說：乞丐最平等。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實施的往往就是這種丐化原理。最不能取信於人的是：它唱了將近一個世紀的資本主義必亡論，而沒有把資本主義打倒，反而把自己搞得貧窮困頓。

至於馬克思主義的優點，郭松棻認為：

馬克思主義是西方智慧到目前為止所能設想出來的較完備的社會思想體系。關於這一點，只有以前的基督教思想可以與之相捋。

其次，馬克思主義較之其他社會思想體系所冒現的最大特點就是它指出了人類的未來，而且把未來置於歷史發展的線索上去預想。這一點，它與空想主義有別。而也就是這一點，它引發了人們長期的注意力。韋伯（Weber）所導出的各派現代社會學說多半只能分析現在，不能指陳未來，即使韋伯本人對資本主義的歸宿也不能像他對資本主義的興起那樣津津樂道。韋伯對人類未來的悲觀和對之茫然無言，是他的偉大思想的一大缺陷。

其三，是馬克思主義對人類前景的樂觀，對生活於現在苦難中的人們一直是一個解脫的指標——至於它的指向是否眞確，那是另一個問題。五十年代末以亞倫(Raymond Aron)和貝爾（Daniel Bell)為首的意識形態終結派(End-of-Ideology School）間或也論及未來的社會，但他們又不像馬克思主義那樣把人間的自由和正義問題一一納入思想體系內作為主要問題考慮，從而鼓舞人們向前的生趣。因此，馬克思主義，儘管目前已經可以看出許多紕漏，甚至被落後國家拿去當作建國的旗號以掩飾其法西斯專制的本質，但人們仍然願意在危機當頭時轉身問它。

應該説的是，八十年代，馬克思主義消沉了，但它並沒有死。認為它已經壽終正寢、難以死灰復燃的人未免太一廂情願了。在歷史面臨新的危機時，它將經過一番修正，應運而生。

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目的之一或許就是，當某些政權以它為旗號，而引述它的經典為聖旨時，人們已有對這方面的更多更好的了解以辨別它的眞僞。

郭松棻的理論探索是否已經初步有結論了呢？還沒有，而他已經病倒了。沒有結論的理由是，因為他覺得要納入其他學說，才能解釋從馬克思到俄國革命、再到中國的創傷的歷程。他認為最重要的，是要納入韋伯的學説和黑格爾的學説。他看中韋伯的歷史的觀點和比較的觀點，韋伯認為應把每一個國家的形態，加以個別的考慮，這種方法學是繼承馬克思的。黑格爾——馬克思——韋伯，這三個德意志人是有師承的。黑格爾在《歷史哲學》

中談到中國，很多話仍然有效。例如，他覺得中國人沒法達到一個知識水平（「知識」這個詞他是大寫的），以確認每一個個人都是自由的。中國只有一個人自由，就是皇帝。這是講當時的情形，用來審視現在，還大體相似。中國人不能獨立特行，中國人須要羣居，然後在羣居中須要有一個領袖，生活才可以安頓。現在的情形不還是大體如此嗎？

黑格爾是以生物的眼光來看人的。生物體所發展出來的一種意識，這意識是本能的，就是要吃，以此來維持生存。但人類除了生存意識之外，還有另一種意識出現，就是要求自由。能不能發展自由，是釐定是不是人的界線。

要納入黑格爾和韋伯的學說，才能解釋馬克思主義及其發展的歷史，才能解釋為什麼中國會有那麼多創傷。而在這方面，郭松棻表示還沒有深入研究呢。

談到中國的未來，郭松棻認為很可能是先發展出一種與過去三十二年不同的社會形態，這種社會形態也許較與資本主義相近。進一步的發展，則未敢預測。

至於他個人的未來計劃，郭松棻表示，他這一生最想做的事就是寫幾本書。至於是什麼書，他因為還未有具體計劃，因此也就不願多說。

從爾十一年的程明怡



最近幾年，在海外從事對華貿易的人是越來越多了。許多知識分子都改行（或兼職）搞旅遊或者貿易。然而，在美國，對華貿易是直至一九七〇年尼克遜宣佈對華新政策之後，才成為合法的事。一九七〇年底掀起保釣運動，一九七一年七月基辛格秘密訪華，同年九月，一間由保釣活躍分子所開辦的「四新商店」，乃成為全美國第一家賣中國產品的商店。它的創辦人程明怡，當時以化學博士的身份從商，不僅領導潮流，而且可以說相當成功，現在身兼中國土產公司、四新國貨公司、珠江國貨公司的總裁，並且即將在美國愛荷華州開設「珠江罐頭有限公司」，以廣州「珠江橋」牌為商標，與中國合資經營，將成為中國在美國設立的第一家工廠。

程明怡既是保釣活躍分子，又是在紐約唐人街中的名人，他成為「昨日之路」專題的訪問對象是很自然的事。

程明怡於一九三九年生於江西重慶。十二歲到台灣，中學大學都在台灣完成。二十三歲離開台灣。在台大是學化學。在多倫多大學拿碩士學位。一九六九年在芝加哥大學拿博士學位。其後，在威

斯康辛大學當了兩年超博士。七〇年底參加保釣，七一年九月在紐約唐人街開辦「四新商店」，一直從商至今。

程明怡回想當時從商的動機是很單純的。受到愛國運動的衝擊，原始動機是民族主義，是對中國的熱愛和回歸，覺得有須要在美國介紹中國的產品，使一般的美國人對中國有些認識。「四新」這名字象所周知，是根據「破四舊、立四新」這口號而來的。當時受中國國內運動的影響，覺得中國的舊東西太多了，有機會要立一些新的東西。這是當時很多朋友的意見，於是取了這個名字。

四新開辦時有一定的困難。程明怡回憶說，中美雙方由於政治體系、經濟體系、歷史原因加上朝鮮戰爭，雙方都隔絕得太久了，互相不了解。雖然四新只是商業性的公司，但由於這公司偏重介紹中國大陸的產品，所以一般華僑或美國人都認為程明怡他們是共產黨。他們解釋也沒有用，所以也就只好不了了之。程明怡强調說，「基本上我們是一個商業機構。」

股份在開始時大約是四萬美元左右，由五位華僑一起湊出來。在此之前，大家都是互不認識的，只是把這個意思談起來，談了一兩個月，就開辦了。這在美國是第一家賣中國貨的商店，開辦時是七一年九月。第一批貨物是從香港轉來的。

中國貨第一次到美國港口時，大家都覺得這些貨物是從月球上來的那麼好奇。

程明怡回想第一次去取貨的時候說，碼頭上的人聽說這些是中國貨，大家都覺得這些貨好像是從月球上來的那樣的好奇。海關把每一箱都打開來檢查，因為這是中國貨第一次進入美國。

開辦時有沒有想到以後的發展？

當然沒有，程明怡說，當初我們都沒有什麼長遠的計劃，只是有一種使命感，要將中國的東西介紹到美國來，至於反應的好歹是不知道的，反正不好就洗手不幹。這種心態一直維持到七六年。在七

六年的時候，覺得既然做生意也做了好幾年了，除了介紹之外，也應該從純生意角度來擴大業務。於是重新招股，擴大零售批發，資本超過五十萬，股東也增加了一些。程明怡說，「現在每年營業額有四百萬，利潤每年增加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我們剛開始時，組織就比較健全，不像唐人街的一般商店，是以家族形式來做。我們是唯才是用。現在來說，我們是按照美國的一般經濟規律辦事。近年來儘管美國的經濟不好，但我們的增長率將會更好。這跟我們的眼光、計劃及員工的合作有很大的關係。」

談到在愛荷華州設立罐頭廠的計劃，程明怡說，在兩年前，即八〇年初，他們與廣東省商談合作搞一罐頭廠，經過了兩年多的洽商，最近簽定了二十年的合約。主要是生產肉類罐頭。規模剛開始時會小一些，但有發展希望。投資約一百萬，四新這一方佔百分之五十一，其餘百分之四十九是來自中國及其他華僑等。如果順利的話會在今年年底開始生產。這是第一個中國生產公司在美國設廠。中國將會有五名技術人員來美，其他的工人會在當地請。

程明怡預料罐頭廠會在三年內收回成本。他說，這個計劃引起很多人的興趣，其吸引人的地方，就是中國的食品在美國是應該有市場的。他說，愛荷華的州政府給他們一百八十萬的工業債券，用來支持他們買工廠、設備等，所以資金充足。

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一個化學博士，程明怡在剛開始經商的時候，有沒有過抗拒情緒？那時候他是否想過回中國？

「抗拒情緒是有的。我來美的時候，就根本沒有打算要留下來。六八年的時候，很多朋友都回台灣教書，我也想回台灣教書，一點也沒有要留在美國的打算。我在威斯康辛做超博士的時候，我跟學校的辦公室說：我是一個外國人，我是不願意留在美國的，我要求不要扣我的『社會安全金』。因為我既然不留在美國，扣我的『社會安全金』就完全沒有意義。後來他們也同意，就不扣了。接着在愛國運動的衝擊下，我覺得回中國大陸會更有用，因

為中國大陸更需要人。剛開始做生意時是有抗拒情緒的，當時只想到向美國人介紹中國，是一件有意義的事。七六年業務擴大後，就不再有抗拒情緒了。那時認識到做中國生意，還是可以有一定的發展的。」

在美國發展商業、企業，越大越賺錢就越好，就越有幫助中國的機會。

當時是不是有人對程明怡走從商的進路提出批評？

「在保釣運動中比較偏激的人，開始時對我們有意見。現在有意見的人是越來越少了。大家都比較實際一些。其實，在美國工作只有兩種，一種是替自己做，一種是替別人做。我們是替自己做，這是一個謀生手段，是沒有什麼好批評的。從對中國的幫助來說，我們的想法是，在美國發展商業、企業，越大越好，越發展、越賺錢，就越有幫助中國的機會。因為我越有錢的話，幫助的力量就大了；如果我是很窮的話，我的幫助只能是在口頭上空談而已。我現在入了美國籍，是認為在一定的程度上，對中會有所幫助。」

他這麼說，是否意在鼓勵人去賺錢？或比較傾向於個人事業上的成功呢？

「我認為假如要留在美國的話，就要越奮鬥、越成功越好。」程明怡說，「在美國社會只有這條路。華人應該要走這條路，不要有什麼保留。美國是一個競爭很強的社會，要勇往前進才可以。這是唯一的路，在目前這個條件下，你只有發展你個人的事業，其它都不過是空談。」

程明怡是釣運的積極參與者。釣運發展到統運，他仍有參與。近來參與愛國運動較少的原因，一方面是活動少了，另方面他覺得自己的年紀越來越大，想法就比較實際。他認為現在的參與與十年前的參與方式不一樣。比如，「五．四」運動在街上搖旗吶喊，這只能是在那個時期造成的一個高潮，

但參與的人不可能每天都有同時期一樣的高潮。因為經過這個高潮之後，人們就會分散到社會各個階層中去發展。

他並沒有後悔參加釣運和統運，也沒有後悔走上從商的道路，他認為海外的愛國運動是一件好事情。他表示，最近曾接觸到一些台灣當權的人，他們問他是不是走錯了路，他說他沒有走錯路，他從來都是民族主義，不單止是對大陸，對台灣也是民族主義。現在回過頭去看，覺得社會主義也還是一個外來的東西，最核心的是民族主義，這是一個根。

從放棄他的化學專業的角度來看，他會不會覺得惋惜呢？

程明怡表示，一個人只要他自己認為所做的事有意義、有目標，認為自己是對的，那就是對了。因為一個人的一生，要做很多事，要走很多路，有各種各樣的機會，有各種各樣的選擇，你很難說走什麼路是對或錯。有些人放棄了自己的專業，但在另一些事情上也非常成功，你不能說這是浪費。例如他自己，如果他當初走去教書，並不就會覺得比做生意好，或比做生意的清高。專業在美國來說是一個訓練。這個訓練只是到一個階段，以後的事情就要自己去決定，並沒有說一定要按所訓練的來做。在美國學工程的，後來去做生意，學科學的走去搞政治，這樣的例子很多。而他覺得愛國運動也是個很好的訓練，如練了胆子、組織能力等，對他後來的事業發展有很大的幫助，不能說這是一種浪費或是一種損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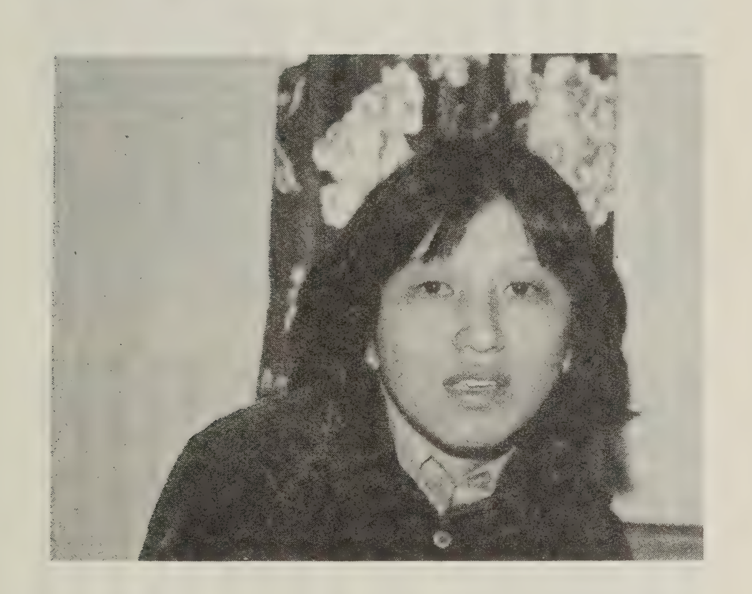
對中國的認識，他這些年來有沒有什麼改變呢？

「有。」程明怡邊想邊說，「當初是膚淺，其後較能深入一些去認識。對中國的認識越深，我對中國的民族感情就越深。」

對海峽兩岸的政權，程明怡覺得兩邊都有心要把經濟搞上去。對台灣，他已離開二十年了，當然沒有很深的認識。四新商店三年前賣台灣貨物，近來程明怡也有意去台灣走走，他說他是很希望能夠對台灣有多一些的了解。他說：「雙方好的方面，我都肯定。我不是站在某個政權上來說話，我只是

站在一個民族主義者的立場上來看問題。我對中國的整個民族前途，是非常樂觀的。……中國大陸解放了三十多年，這期間雖然走了不少彎路，也有不少動亂，但三十年就加以蓋棺論定未免是太早了。我覺得現在沒有任何人有權可以蓋棺論定中國。中國還是在向前走，當然是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假如中國能夠吸收教訓，是會越來越好的。」

參與美國共產工人黨活動的王春生



保釣運動時，曾與程明怡在同一個保釣會（麥迪遜威斯康辛保釣會）的活躍人物王春生，今天站在美國工人階級立場反對美國的資產階級。王春生於一九七一年作為第一個保釣團（五人）到中國大陸訪問，並獲周恩來總理接見，回到美國後不久即投身於美國的工人運動。長期以來，她與中國人的愛國運動脫離，積極參與美國共產工人黨（Communist Worker Party, 簡稱 CWP）的活動。而我自從一九七一年她去中國前，在香港見過她一面之外，十一年沒有見過她，也沒聽在美國的朋友談到她。

我到美國後，有人告訴我，王春生目前是CWP的副主席，而她的丈夫 Jerry Tung 則是主席。但這傳言，已在我訪問王春生時，被她當面否認了。CWP不設主席，Jerry Tung 是黨總書記(Party General Secretary)，不是她的丈夫，而她本人也不是CWP的黨員。只不過，她承認直到現在，她還是積極參與CWP的工作，並且也願意向我談論CWP對革命、對中國、對世界的觀點。問她為什麼不入黨，她回答說是私人問題。

顯然，王春生走的道路與大部分留美中國知識分子不同。她很少參與中國人的事，她搞運動的對象是美國人。卽此一端，就可以知道訪問她實在有一定的代表性。

王春生於一九四五年生於四川重慶，在台灣長大。一九六五年台大社會系畢業。在台灣時已非常活躍，既是學生領袖，又是運動健將。她作為中華民國的代表，參加過在日本舉行的反共學生會議，又曾獲得全省田徑賽女子五項全能亞軍。一九六五年獲獎學金到美國麥迪遜城的威斯康辛大學，攻社會學。獲碩士學位後，正在修博士學位時，保釣運動發生，她積極投身於運動中，一九七一年從中國訪問回美後，就離開了校園。起先她在紐約市立大學亞美學系教書，同時從事學生運動。一九七四年因為拿不到大學的長期聘約而離開校園。這以後，她在紐約做過車衣廠女工，做過百頁窗簾工人，並積極從事工人運動，協助編輯CWP的報紙。目前，她改行從事商業活動。

談到CWP，王春生說，這個黨的前身，是一九七〇年開始的學習小組，到七四正式建黨。目前與美國革命共產黨（RCP）及老牌的美國共產黨（CP）鼎足而三，是美國三個不同的共產黨。據王春生說，老牌的共產黨人數最多，老的工會領袖還有一些，但大都年紀大了，眞正領導工人運動，可以說完全沒有地位。至於革命共產黨，則人數很少，沒有在羣衆中生根。而CWP，則是人數較多的（具體數字她也不肯透露）。

王春生表示，CWP的主要黨綱，是在美國幹革命，最終目標是在美國建立馬列主義的政權，走社會主義道路。日常工作則是做工廠、工會和社區與工人福利有關的工作。她說，CWP對少數民族（黑人、華人、波多黎各人等等）的權益照顧得多些，但在工人當中，白人仍是大多數。因此，CWP的成員，仍以白人為主。

根據馬克思的理論，資本主義的發展，將使無產階級的隊伍越來越壯大。但是，在美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卻使中產階級佔了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在這種情形下，CWP怎樣估計在美國幹革命的前景

呢？

王春生解釋說，「工人」的概念，就是做工的人，受薪、被僱的人，因此包括我所指出的百分之八十的中產階級，甚至包括小生產者。從這個角度來看，美國是無產階級最壯大，物質基礎最發達，因此也就是最有可能發展社會主義的國家。CWP認為美國革命的形勢很好，因為凱恩斯主義已不能為美國的經濟找出路，只有社會主義可以救美國。她說，CWP從成立學習小組到現在，十年來的發展很快。未來掌握政權的可能性是有的，可能性多大多小，要看鬥爭。因為美國的民主體制也最具備靈活性。

CWP是不是合法的組織呢？

這正是王春生要解釋美國體制的靈活性的地方。一般來說，任何組織在美國都是合法的。包括宣傳暴力的黑豹黨和法西斯的三K黨在內。但是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在背後觀察着整個安全局勢，如果它認為危險的，它就會對付。例如前幾年有五名CWP的領導人被三K黨殺死，CWP認為背後就是FBI的縱容。利用反動組織與革命組織的矛盾，彼此牽制與削弱，就是美國民主體制的靈活運用。此外，在美國申請工作，常要你填寫有沒有加入共黨組織，如果知道你加入了，就會影響被僱。因此，組織表面上並不是違法，而實際上發展組織卻受到很大限制。

自有馬克思主義以來，已經發展成許多家，CWP究竟傾向哪一家？它是否基本上屬於毛的路線？

王春生表示，CWP認為，從馬克思、列寧、斯大林，到毛澤東，都基本上是對的，儘管在理論上有不同的修正，不同的認識，實際上只是馬克思主義的不斷發展。毛的路線，對中國是正確的；一般來說，列寧主義更適合美國。但美國也有自己的情況，應與美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目前，蘇聯是變修了，中國近幾年也變修了，共產主義運動受到了挫折。但不能因為過去沒有成功，或者犯了嚴重錯誤，就斷定以後也不會成功，就否定馬列的理論。要認識到，社會主義在全世界實現是不可避免

的，這是世界的潮流。而美國，尤其因為資本主義的發達，而提供了很好的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物質基礎。

王春生既認為中國最近幾年變修了，她是不是仍然肯定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呢？

社會主義在全世界實現是不可避免的，這是世界的潮流。而美國這個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國家，提供了很好的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物質基礎。

王春生表示，文化大革命開始時，她已經在美國參與政治活動，一九六七年她參加麥迪遜的反戰中心，也參加第三世界學生的學習小組。那時他們總是以中國為榜樣，用毛的理論作指導。四人幫事件發生後，開始時CWP擁護四人幫及文革的路線政策。但現在，他們承認四人幫犯了嚴重錯誤。儘管CWP有理想主義的傾向，但也不能否認社會主義要建立在高度發展的物質基礎上。文革以來，只講思想鬥爭，不講物質基礎，錯誤犯得很大，也陷得很深。但儘管如此，文革還是基本上應予肯定的。對社會主義，對革命，對過去的錯誤與正確，要加以總結，而不是以悲觀的態度來批判，使人失去信心。中國的文革應該肯定，問題只出在一九七三年中共第十次黨代表大會以後沒有實現黨內的團結。現在鄧小平對文革的否定態度，以及所實行的資本主義化的經濟政策，對外關係上的過份親美，不大支持第三世界國家(最近的做法稍有改變)，王春生認為這路線基本上是修正主義路線。至於蘇聯，她認為不能說蘇聯是帝國主義，只能說是修正的社會主義。而中國也是修正的社會主義。CWP認為，中、蘇兩國在修正主義方面都是錯誤的，不同的是，蘇聯在物質上比中國進步得多。

許多留美的華人知識分子都面向中國，為什麽王春生獨獨走了面向美國的道路呢？

她重複她在六十年代時已參加美國的反戰運

動，她一向是主張為自己的居留地工作的。對中國，過去只是民族主義的認同，在這種基礎上參加保釣。一九七一年到中國訪問時，與中國工人座談，中國工人表示，如果美國發生社會主義革命，對世界的貢獻就很大了。這些話一直記在她心中。從中國回來，她更肯定社會主義才是人類的前途所在。中國的今天，仍須肯定社會主義，儘管實行起來需要更大的靈活性。否定社會主義是不對的，因為沒有別的可以代替這種社會形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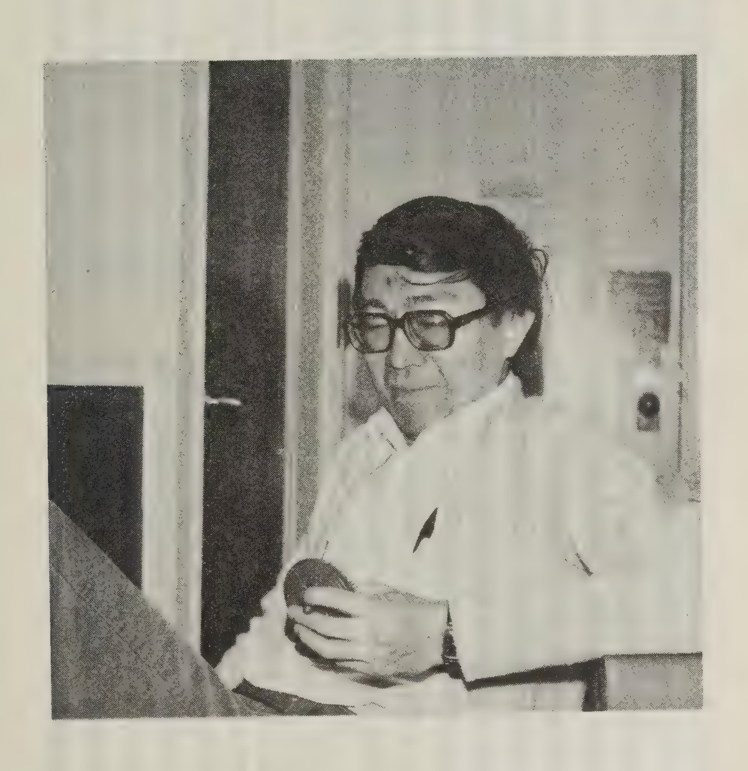
王春生說，海外知識分子面向中國，應可以對中國有一些影響，但中國的事要靠中國國內的人去做，中國的發展靠國內的因素起作用。自己由於在美國立足，很早就參加美國的羣衆運動，對美國社會了解較多，也有更深的關切，因此偏向於在美國搞革命，這是可以對美國的社會發展起作用的。

CWP是不是主張在革命中使用暴力？他們怎樣看待恐怖主義問題？

王春生表示，CWP是反對恐怖主義的，至於暴力不暴力，則似乎不能由主觀意志去考慮。因為資產階級是不會放棄權力的，因此即使利用選舉而和平轉移政權到共產黨人手中，眞正要鞏固政權，要實行社會主義，恐怕還是得用暴力。但以目前來說，CWP是很重策略的，對黨員的安全必須顧及，決不能冒險。而且，他們還看到有中年生活危機(Midlife Crisis)的問題。很多人到了中年，不得不考慮個人問題，家庭問題。要照顧這些個人問題。搞革命，一定的犧牲是有的，但弄到一點個人積蓄也沒有，恐怕也是不對的。

王春生送了幾本CWP出版的刊物《八十年代》給我。其中兩本，在翻開來的第一頁，就刊有黨總書記 Jerry Tung 的照片。那幾本刊物的主題，分別是「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與教訓」、「波蘭往何處去？」、「第三世界與美國」、「八十年代的無產階級革命」等等。大量文革期間的圖片（包括毛澤東的照片和第三世界革命的圖片）刊登在封面上，內頁中，使我們彷彿回到了那個時代的中國大陸。

《七十年代》前編輯人員
崔少明



把崔少明放在我們的「昨日之路」的專題中，作為訪問對象，是因為：一，他是早年參加保釣並一直關注及參與從釣運到統運、到國是研究的香港留學生，也許是保持這種關注或參與的時間最長的唯一的香港留學生。二，他曾是虔誠的基督徒，曾在專業上深深鑽進牛角尖，又曾在《七十年代》編輯部工作過四年。三，以他的學歷與才能，這些年的遭際可以說是並不如意，甚至可以說是頗有坎坷。

作為一個舊同事，我們的交談可以說是比較熟悉。然而，不知是何原故，過去我們一起工作時，談的時候很少，甚至後來還有點隔膜。現在，當我發掘「昨日之路」這個專題時，不但不覺得可以把他的一切順手寫來，甚至還覺得從他的身上，從他的思想變化中，可以找出不少引人深思的見解。

崔少明一九四五年在廣州出生，父親是安徽人，母親是福州人，五二至五三年隨父母往上海，五七年來香港。一九六三年畢業於香港培正中學，六七年畢業於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化學系。一九六七年往美國，先在布朗大學讀了一年研究院，六八年

轉往芝加哥大學化學系。一九七五年一月完成博士學位的考試，後即回港。一九七六年憑論文獲芝加哥大學的哲學博士學位。

一九七五年回港後，二月開始在《七十年代》月刊工作，到一九七九年一月離去，離開時的職位是副總編輯。七九年二月到美國，在普林斯頓大學任超博士研究。八〇年三月，患結核性腦膜炎，病況一度危殆，結果住院三個月。八〇年八月離開普林斯頓，往華盛頓的美中貿易服務公司，任技術性翻譯。八一年五月往紐約唐人街做事，現任職於一份華文報紙，担任經濟版編輯。

從懷疑上帝爲什麼不公平，到傾向社會主義的理想，是他參加釣運的思想基礎。

回顧崔少明參加政治運動，有兩件事是與別不同的：其一是他的宗教背景，其二是他在《七十年代》的四年工作。在談論他的思想歷程時，也許不可避免地要圍繞這兩件事，儘管後一件事可能會引來他對我担任總編輯的雜誌的批評。

保釣時所激發的政治熱情，與他的宗教背景有沒有關係？現在回想起來，他是不是曾經（或甚至現在仍然）把政治等同宗教一般看待呢？這是我提出的第一個問題。

他先談他的宗教背景。他在高中後期開始信基督教，大學四年和研究院兩年也篤信，積極參加宗教活動。培正中學屬保守教派，而崇基大學的主流是開明派。當時崇基主辦的團契是開明派團契，於是保守派成立一個非正式團契，崔少明是這個非正式團契的負責人。宗教背景對他的參加釣運，可以說無任何影響。記得在芝大研究院時，他開始對宗教有疑問，他的疑問是：如果眞有上帝存在，那麽神對於祂創造的世界，就不是那麽公平。儘管《聖經》有講過，不公平正是上帝的旨意，但他對這不公平的上帝逐漸有了抗拒的意念，於是慢慢疏遠了宗教活動。到六九年，他就基本上沒有參加任何宗教活動了。

他參加釣運的目的很單純，只覺得這是一件愛國的事，就去參加吧。因為他是從香港來的，沒有受到政權的壓迫、控制，不像台灣學生那麽有顧忌，自己沒有什麽好怕的，理應參加。大多數參加者是基於民族主義，崔少明表示，他個人是社會主義的傾向多一些。當時香港的一般學生不會想中國，特別是一九六七年他離港時，香港正發生暴動，他對香港的左派一度非常反感。

一九七一年一月廿九日他參加芝加哥的示威，四月十三日又參加華盛頓的大示威。經過這兩次，他的深刻印象是：國民黨在保衛釣魚台的事情上，表現得昏庸無能，一副媚外嘴臉，徒然喪權辱國。同年七月基辛格訪華，整個美國輿論對中國的報道從反面擺向正面。七一年九月第一個保釣團(五人)訪華，其中三個人是在美國中西部的，同崔少明很熟。這些人回美後作過演講，其中一個人與崔深談過。這時候，他對中國的初步了解，可以說是全部屬於正面的。他十三歲離開中國，對這之前的中國生活的印象是既不好也不壞。父親是做洋貨生意的，三反五反時曾經被鬥爭，父親還告訴他說有不少朋友跳樓自殺。但這些經驗都不是他直接體驗的。從生活來看，解放後他家過的是中等生活，因此並沒有壞印象。

在愛國運動中，崔少明一直沒有牢固地屬於某一個團體或組織。他投身運動，但不是核心人物。後來他担任了《七十年代》通訊員，就自己獨立地觀察一些事情。當時許多人談中國，但他的通訊員的職責主要是寫美國。他參加團體，但從來不是首領，而且不是中堅分子，這樣做的好處是避免了介入團體當中、或者團體與團體之間的矛盾。

當初爲什麽要參加《七十年代》的工作？四年以後又爲什麽堅決要離港來美國？

當了幾年《七十年代》的通訊員之後，崔少明在即將取得博士學位之前，要求回港參加《七十年代》編輯部的工作。我曾一再請他三思，而他回港

的意向卻很堅決。但過了幾年，他終於還是要回美國。現在回想一下他當時的抉擇，他會不會後悔拋棄專業呢？

崔少明的看法有一點是同程明怡相同的，就是他不認為讀完了這個專業就必須從事這個專業的工作。他甚至舉出孫中山和魯迅的例子，指出過去放棄專業而改行的人實在很多，只不過現在這樣的人是少了。他說他從七一、七二年開始，對專業已沒有多大興趣。主要是他所學的是理論化學，抽象到不但不用做實驗，甚至不必使用計算機，只是像數學那樣有紙有筆就行。那時候他開始想，做這麽抽象的東西，對人類、對中國，究竟有什麽用。即使發明了一個方程式又怎麽樣？既改變不了社會上不公平的現象，改變不了貧富懸殊，也解決不了國與國之間的爭鬥。那時候，他覺得對社會的研究，更加為人類所需要，而且逐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這方面，又由於幫《七十年代》當通訊員而有所加强。於是，花在總圖書館看美國雜誌的時間越來越多。到一九七五年，他每天只花一、兩個小時在專業的研究工作上，其他時間全部泡在總圖書館。當時的想法如此，現在回想起來也不覺得有什麽不對。

一九七九年崔少明要離開香港，再來美國，我曾一再挽留，他為什麽又堅決要走呢？

當時他也曾跟我談過離去的理由，但現在他是講得更清楚了。首先，是經過四年的觀察，他覺得《七十年代》始終不能打破所有框框，暢所欲言，排除各種的限制；他當時感到《七十年代》不能在四人幫下台之前批判四人幫，不能不為了國策而有所顧忌，使他感到不很自在。他覺得言論如有一定的限制，眞理就很難追求了。不過，他又補充説，《七十年代》現在的言論尺度，比他離開時要好，主要是限制少了，在一些關鍵的問題上敢於提出挑戰性的看法。

其次，他感到香港是處在中國和英國兩個强大政權之下生存的。中國政府不體恤任何民意，自然也不體恤香港民意。英國鑑於是殖民政府，只是基於利益的考慮才留在香港的，在國際鬥爭中也鬥不過

中國。因此，他不相信中、英兩國政府在考慮香港前途時會考慮香港民意。中國對香港的控制已越來越大。所謂「反華」的東西，如電影「皇天后土」、「在社會的檔案裏」等等，基本上不會在香港出現。這種對香港整體的控制和影響的現狀，不是求生存的《七十年代》或任何報刊可以改變的。既然自己在香港做不了什麽，倒不如回到更加適合自己生活的地方。

回美國並不是想在專業上有什麽發展，儘管當時中國號召四個現代化，很多朋友以為他是。回美國主要是覺得在美國的生活方式，有幾點是香港達不到也不可期望達到的。第一，是美國的圖書館，書多而且方便，隨便你看，任憑個人選擇。第二，是美國的博物館，豐富而充滿了知識的樂趣。他是一個喜歡知識的人，從這個角度來看，香港是一個相當苦悶的城市。第三，是美國的居住環境好，生活得安詳，有利於讀書和思考。

離開香港的最重要原因是經濟的考慮。他出身於中下層的家庭，對父母有責任，而他在《七十年代》所得的薪金，不足以解決他負担自己的家庭和供養父母所需，而且看不出以後有可能達到這樣的工資水平。這是和他的出身有關的。也許家境好一些，就較容易留下來。

對於中國的認識，他現在的看法是不是與十年前有所不同呢？

當然有。崔少明簡要地說，十年前他認為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現在認為中國基本上沒有實行社會主義，而是一個實行國家資本主義的國家。最基本的問題是，他認為，一個眞正的社會主義國家，除了生產資料公有制之外，工農大衆還必須有權去決定和支配他們所生產出來的成果。很明顯地，今天中國的工農大衆沒有這個權。中國實在是一個超級大公司，因而是國家資本主義。這一點是大家都看到了，只不過沒有人講出來吧了。

自己仍有心為中國做些事。現在有人做生意，有人搞科技教育交流，也有人在促進中國的民主。後一點，也許同崔少明上述對中國的基本認識有

關。但他認為，中國仍然很貧窮，很落後，如果靠幾個知識分子去鼓吹民主，他不相信會有什麼效果，尤其是中國目前的權力是如此的絕對。他認為有一件事可以做，就是普及文化、知識和思想，把新知識和新思想廣為傳播，讓人民掌握知識，有了判斷能力，而形成中央不可以抗拒的力量，從而推進民主化。做普及工作的目的，是提高人民的判斷能力。

在《七十年代》那幾年，似乎不很得意，但回到美國以後，崔少明的景況也一直不妙。回顧這一段人生歷程，他覺得有沒有個人選擇的錯誤呢？

當然有。崔少明說，來美國以後，換了幾次職業，有的是被迫換的，比如老板把他辭退，自己不得不換；但有的是自己選擇的錯誤。不過，現在回想當年進《七十年代》工作，卻不認為個人有選擇的錯誤。當然，他當時沒有考慮後果的問題，沒有考慮一生的生活出路和職業出路。但在《七十年代》工作使他結識了一些海外各地的朋友，也帶來以後的一些方便，總的是有利也有弊。

那麼，經過這十年的坎坷，他有沒有再反省到宗教呢？

也不錯，他曾重新考慮過宗教的問題，崔少明說，現在他對神的看法，是「不可知論」，即不能知道上帝是否確實存在。他不是「無神論」者，因為他不認為科學上已證明上帝不存在。人只要未到達宇宙的盡頭，又怎能知道沒有一個神存在呢？但另一方面，他又不是「有神論」者，因為科學上也未能確定有神的存在。只是有時他會想到，以前是基督徒，現在，從宗教的觀點，他可以說是背叛了基督教，那麼他多年來的坎坷是否可以說是一種懲罰呢？不過，雖然有這麼想過，但並不嚴重，因為即使懲罰，也不算重，至少他現在仍能生活。

他現在的人生目標是什麼？有什麼未來計劃呢？

從理論上說，他相信如果有社會主義的話，應該比資本主義好，至少較資本主義接近完美。問題是：人們能否達到眞正的社會主義？至少到目前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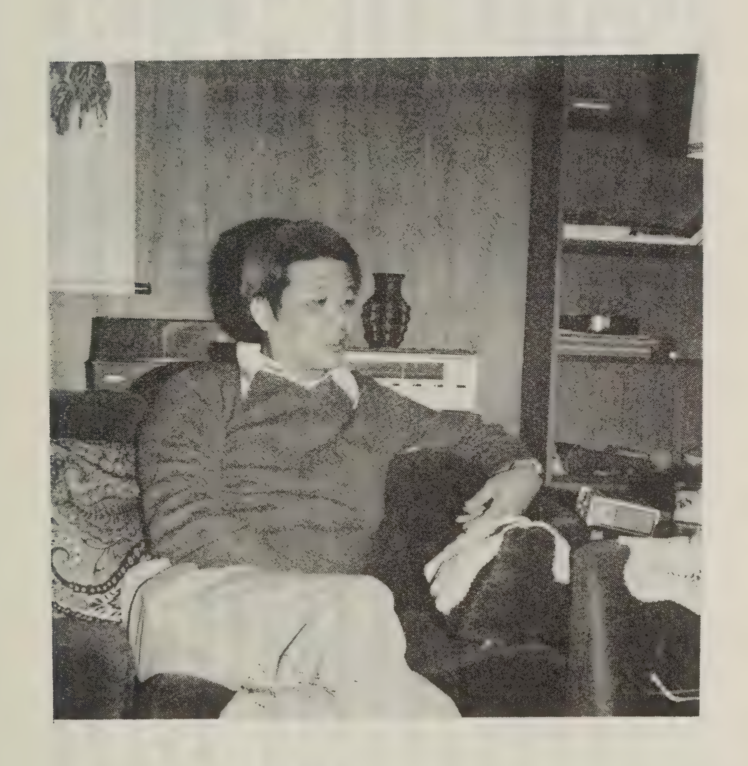
止，他還沒有見到一個自稱是社會主義的國家，搞得比資本主義還要好。但當然也不能得出這樣的結論，就是以前沒有做到的事，以後也不會做到。

他知道有所謂「西歐的人道社會主義」，他個人比較接近這類想法。有生之年，願多做一些知識普及的工作。

他表示，如果有餘力的話，願意盡量為人類多做些事。因為他是中國人，所以願盡量為中國做些事。他知道有所謂的「西歐的人道社會主義」，他個人比較接近這類想法。知識分子面對強大的國家機器，如不掌握生產資料，是永遠無法改變社會現狀的。可以做的事，恐怕就是在知識普及方面。他說，在《七十年代》工作幾年對他的人生態度最大的影響，就是過去一向生活在象牙塔裏，受良好教育，接觸同一階層的人，儘管理論上知道有窮人，但對下層人的處境沒有切身感受。參加《七十年代》工作以後，接觸到一層經濟生活和教育水平與自己不同的人，這些人在社會上永遠無法達到與他自己同一層人那樣的地位；而他們之中，不乏有才智之士，只是限於條件，永無發揮才智的機會。因此，他決定日後多花些時間在知識普及方面，讓這一類人得到學識，得到機會。

從懷疑上帝為什麼不公平，到對中國的認識的改變，以及他現在的人生態度的取向，崔少明似乎仍在追求人類向更加公平、更加平等、更加人道的社會邁進。

因信念而影響生活路向的陳治利



與上面所訪問的六位朋友相比，陳治利也許是最容易使人覺得平凡的一位。我要把這篇訪問放在「壓軸」的位置，正是想要顯示，保釣運動前後的左翼留美知識分子中，還有不少人像陳治利那樣，在平凡中顯示出他的不凡。

我認識陳治利是一九七一年九月，他和另外四位保釣的積極分子，組成第一個到中國大陸的訪問團，路過香港時，匆匆地在九龍尖沙咀陪他們辦手續和買東西。這以後，我們沒有通過信，也沒有再聯絡，直至一九七八年在香港和一九七九年在美國，我們才又碰過頭。但這幾次都是在許多人一起的場合。印象中他很少說話，但講到一些惹笑的話題時，他笑得很大聲。幾次印象，淡淡地、直覺地感到他是一個樸實、沉靜、豪爽、直率的人。如果有機會與他接近，我會信任這樣的朋友。

陳治利不拒絕我的訪問，只是奇怪我為什麽要訪問他，一個普通的、平凡的人。也許，訪問他並不能得到關於他的很好的資料，因為很多事他都覺得沒什麽好講。而如果訪問跟他接近的人，說不定還可以取得更多對他的了解。事實上，我早就聽不

少人談過，為了理想，陳治利放棄了很多個人的東西，包括兩個博士學位的優越資歷。在從釣運到統運的愛國運動中，任何事情他幾乎都是出錢出力最多的人之一，而且許多他認為有意義的事，他都會全身投入、全家投入。還有，為了在「運動」中的政治見解不同，他一度與他的妻子王育梅鬧得幾乎要離婚。他的工作，他的生活，一直為了從事愛國運動而沒有好好地安排。……然而，所有這些，他都不大會跟別人說，問到他的時候他也許會坦率地講講。不過，不管怎樣，我已沒有時間在他的朋友中進行關於他的生活道路的採訪，還是直接了當地去他家登門造訪吧。

陳治利生於一九三六年，福州人，於一九四八年小學畢業後為逃避內戰烽火而全家到了台灣，家境清貧。一九五四年台灣第一屆高中聯考，他的成績優異，但因為沒有錢上學，而去投考海軍軍官學校。在那兒三年，沒有畢業。因為不願 加入國民黨，而自己又是從小就文科不好、理科很強，所以覺得不適宜在宦海浮沉，於是故意考不及格，蓄意退學，離開了海軍軍官學校。不久考入東海大學物理系，一九六一年畢業。一九六二年入台大物理研究所，碩士學位也沒有唸完，六三年九月就得到獎學金到了美國。五年半以後，他在麻省伍斯特（Worcester）理工研究所獲物理系哲學博士學位。隨後到德克薩斯教了一年書，又到伊利諾大學研究所攻電腦科學的博士學位，兩年後，一九七〇年底，保釣運動興起，而陳治利的學分也修完了，但還沒有考試和交論文。一九七一年九月到中國，在中國八個星期。年底回到美國，就放棄了學位，跑到西部去開了一個電視修理店。（這就是別人傳說的放棄兩個博士學位的事，陳治利說，事實上第二個學位還沒有拿到。）一九七八年陳治利與一些在美國的朋友籌辦電子工廠，並為這事於年底去了一次中國。一九七九年回美國後，電子工廠的計劃也告吹了。一九七九年八月，他進入一家叫 Kentex 的公司，業務是專門為中國選擇和收集美國的大學和研究機構公開發表的科技研究報告。一直工作到現在。

七一年從中國回來，即放棄學位，在窮人區中開設電視修理店，要為窮人服務。

在陳治利的人生歷程中，有兩三件事情是值得談談的。

第一件就是：他七一年底從中國回來，為什麼放棄學位去做電視修理工人？

最早參加保釣的動機是愛國。陳治利說，保釣以後才開始接觸一些左傾的思想。那時候，美國缺少關於中國的書籍，於是他特地跑到加拿大多倫多的長城書店，買了一大批有關新中國的書，回來越看就越傾向中國，傾向社會主義，受文革所宣傳的知識分子要改造自己、同工農結合的思想影響，覺得在象牙塔攀登知識的高峯沒什麼意思，想做勞動人民。七一年到中國，看到的都是樣板。雖然覺得中國貧窮，但因為他本來也出身貧窮，因此完全接受了中國方面的宣傳，自己也儘往好方面為中國設想。從中國回來，更加强了自己的左傾思想，書也就唸不下去了。離開伊利諾，原打算到西部與另外一些保釣的朋友辦一份《華聲報》，結果報紙沒辦成，七月就與朋友在屋克蘭開了一家電視修理店。當時的想法是為窮人服務，所以店設在黑人區，生活環境比較差。同時還辦《東風》雜誌，担任經理。這份雜誌出版了九期。不過，其後電視店的生意還不錯，因此生活方面不成問題。而且，他不自覺地還算開了風氣之先，因為接着在這一區的電視修理店就多起來了。

這是他人生歷程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放棄了學術上很好的資歷，去當一個電視修理工人。

第二件事是一九七七八年辦電子工廠的事。一九七八年中國提出要在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並開始實行了對外開放的政策。這時候，陳治利曾一度想重新拿起自己過去所學的專業知識。第一個計劃是想回歸中國，進厦門大學教書。然而接着又有第二個計劃，就是有些在美國的科技界朋友，想與

辦一家電子工廠，生產集成電路，賣給中國。這第二個計劃使陳治利更感興趣，於是他賣掉了經營多年的電視修理店，全力投入籌劃與辦這個工廠。七八年底，他為此事第二次到中國。經過長時間的談判，終於沒有談成。陳治利一九七九年初囘到美國，失業了約半年，到八月才找到現在的工作。

這是他為了追求理想所作的另一次犧牲——放棄了經營多年的生意，想為中國的現代化作一些貢獻，而結果是兩頭落空。

一生對功名事業看得很淡。投身運動的出發點，就是人民的立場，就是從中國人民特別是台灣人民的利益來看問題。

第三件是一九七六年差一點鬧離婚的事。這件事雖屬私事，卻與他的思想傾向有關。

陳治利與王肖梅是一九六九年結婚的。當時王是虔誠的基督徒。保釣開始時，他們兩夫妻都在做事，經濟情況較好，於是兩人就比賽捐款。王捐給教會，陳捐給保釣會。其後兩人的想法就趨於一致，都傾向新中國了。一九七四年，王肖梅到中國參加國慶，鄧小平以國務院副總理的身份與他們談話。囘美後，她更傾向中國了。

一九七一年到西部以後，兩人一邊工作，一邊也積極參加了西部的愛國運動。他們出錢多，出力也多。搞「日出劇場」時，他們一家全部投入，抱着小孩半夜三更排戲。

一九七五年，兩人的想法就有點距離了。先是陳治利看到了《李一哲大字報》，感到很興奮，覺得大字報提出來的中國必須實現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確實是民族命脈的所在。他影印了幾十份給其他人。然而，卻受到一些緊跟當時中國路線的人所反對。一九七六年初，西部的左派圈子搞批鄧，陳治利不主張批，於是與當時的「緊跟派」更矛盾了。不幸，王肖梅當時贊成「緊跟派」的意見，於是成天在家中為政治問題爭執。

與此同時，更大的分歧是一九七五年的柏克萊

「台灣問題討論會」。當時陳治利反對以統一作為這次討論會的主題，他認為統一與獨立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保障台灣人民的利益。他的說法被當時的「緊跟派」指為台獨思想。其後，在「台灣問題討論會」過後的檢討會中，陳治利又與「緊跟派」的意見發生衝突。他說，「你要問這個會成功不成功，應問問台灣本省人。這次來參加討論的聽衆中，台籍人士很少；現在開檢討會，我算半個台灣人，其他人都不是。他們把其他支持我的人都排除。」最後，「緊跟派」向陳治利施壓力，施到家中來了。而王肖梅贊成他們，於是又成天爭論，鬧到幾乎要離婚。不過，事情終於很快過去了。一九七六年中國政局的變化，同時也解決了陳治利夫妻之間、以及他與其他左派之間的矛盾。現在，他們的看法越來越趨於一致。

有些人願意為理想奉獻一點力量，個人作一點小小的犧牲，然而，像陳治利那樣誠實地為了信仰而影響自己生活路向的人，終究不多。現在回顧起來，他所追求的理想不少已經落空了。他會不會後悔過去所作的犧牲呢？

「沒什麽後悔，」陳治利斬釘截鐵地說，「我一生對功名事業看得很淡。當初我投身運動的出發點，就是人民的立場，就是從中國人民特別是台灣人民的利益來看問題。一九七一年我們五個人從中國回來，我和陳恒次都偏重台灣問題，回來就提出台灣自治區的構想，當時受到不少左派的攻擊。他們認為台灣必須納入中國大陸的體制中，才有前途，人民才能當家作主。七五年台灣問題討論會中，我提出台灣人民的利益才是要義，也是基於台灣人民的立場。我認為要解決台灣的前途問題，必須了解台灣人民現在怎麽想，將來怎麽想，應該走什麽道路才符合台灣人民的利益。我想，我自始至終，出發點都沒有改變，改變的是對事物的認識。」

那麽，他對事物的認識，具體來說，對中國的認識，有什麽改變呢？

陳治利說，對中國，過去沒有深刻了解，基於

愛國，基於反國民黨，以為中國大陸眞正實現了人民民主。現在看來，講民主，不能不講人民的自由度。那麽從這個角度來觀察，說不定台灣由於實行資本主義的經濟，自由度反而比大陸更大一些。社會發展的具體表現，在解放生產力。從封建社會，必須經過解放個性，開拓了人民從事經濟活動與社會活動的自由度，才能發展生產力。中國大陸一下子從農業封建社會躍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實際上只是農業社會主義，沒有經過資本主義解放個性的階段，生產力就發展不起來。

陳治利還表示，中國目前最大的問題就是人民沒有權，甚至無產階級也沒有權。幹部是上面派下來的，不是人民選出來的。怎樣使黨的權力縮小，使基層人民能直接對黨政幹部進行監督，是中國政治改革的努力方向。經過文革的浩刦，他相信中國付不起代價再一次鬧革命了。他只希望中共能認眞地改革，能堅持三中全會的發揚民主、解放思想的路線，不要再反反覆覆。

他對個人的未來出路有什麽看法呢？

如果只是生存的話，在美國，活下去是不困難的。至於思想出路，他表示他們一家現在生活在美國，子女也在美國出生、長大，對於認同中國還是認同美國的問題，他認為作為人來說，怎麽樣都可以。對於未來在美國、在中國大陸還是在台灣生活，他表示暫時沒有什麽計劃。不過，他强調，無論在什麽地方生活，就要爭取那個地方的民主與人權。

陳治利不大擅於講話，沒有見過他寫文章，也許他有更多更好的意見，卻不愛表達或不知如何表達。是的，他是一個很少出頭露面的人，一個不願做領袖、也不把自己看成是什麽人物的人。十多年來他只是默默地做着他認為該做的事，為中國，也為人類的進步。

・七十年代雜誌社出版・

再版

從認同到重新認識中國

李　怡

這本書的出版跟我過去所出的書不一樣，它並沒有給我帶來愉快、欣慰的感覺。手裏揑着一把校稿，就像是揑着一團火一樣，炙手，傷痛，而且即使到了寫「自序」的這一刻還在矛盾着：究竟要不要把它付印？

這本書不算是一本分析中國問題的書，而是一本關於一個香港知識分子在寫中國問題的文章時的心理活動，是一些對中國問題的基本認識和基本態度。作為一個在香港的中國知識分子，我們的身份和處境自有其特殊性。我是中國人，我愛中國，希望中國社會不斷進步，人民生活走向民主、康樂、幸福。在這裏，我可以看到許多在大陸和台灣一般老百姓都看不到的資料，可以接觸到一些有親身經歷而又無須顧忌「講錯話」的人；在這裏，左右派的思想互相衝擊，言論自由，人們可以比較各種不同的報道，可以自由地與不同的人交換意見，作出自己的公正判斷；在這裏，一個知識分子可以憑良心講話而不會損及自身安全，可以自由地講出中國老百姓想說而不能說的話。

在事實不斷被謊言掩蓋的世界裏，極有限的眞話也必須要有人講出來。我珍惜在生命中有這麼兩年，憑勇氣，付出個人的代價，寫下了這十篇文章，說出了極有限的眞話。

——作者自序

・臻善文化事業公司出版・

浮游群落

劉大任

劉大任，江西永新人，一九三九年出生，一九四八年到台灣。一九六〇年畢業於台灣大學哲學系。一九六二至六四年任夏威夷大學東西文化中心哲學研究員。文學創作先以新詩開始，隨後從事各種文學形式的嘗試，作品散見《筆滙》、《現代文學》、《文學雜誌》等刊物。一九六四至六六年在台灣參加《劇場》雜誌編輯工作。一九六五年與陳映眞、尉天驄創辦《文學季刊》，即專志於短篇小說的創作，一九七〇年出版小說集《紅土印象》。一九六六至七二年，劉大任在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政治研究所獲碩士學位，並攻讀博士學位。一九七〇年底保釣運動興起，即投身運動中，編輯《戰報》。一九七二年參加聯合國中文組工作。近年，他開始構思寫一個三部曲的長篇小說。《浮游羣落》是第一部，寫的是六十年代中期台北知識分子的思想、情感、心理和活動。第二部《溯河洄游》以七十年代初期海外保釣運動爲背景。第三部，作者表示要寫海外左翼運動的分崩瓦解。

以《浮游羣落》開始的三部曲，是作者觀察、體驗和醞釀已久的作品，它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這一代海外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爲歷史留下見證，在文學方面刻下標記。

·臻善文化事業公司出版·

香港青少年問題探索

邱誠武等編

近年來，社會輿論隨着大衆傳媒的焦點移動，對油脂熱、的士夠格潮、青少年犯罪、自殺、「魚蛋檔」、電子遊戲機、青春電影等事件甚爲關切，議論滔滔，更熱衷於尋求解釋現時青少年的行爲和心態，因爲人們對處處表現「離經叛道」的青少年大惑不解。對青少年的認識，我們只見資料零散，議論紛紜。

爲此，幾位大學生搜集了近年有關香港青少年問題的狀況報道和分析，把具代表性的輯錄成集，並將有關的文章與報告，編成一完備的文章目錄索引。全書分四部分：

一、邊緣的一群；

二、青少年文化與次文化；

三、社會建制與青少年；

四、青少年心理發展和成長。

這是第一本有關香港青少年問題的專集，希望有助於負責青少年工作的教師、社會工作者、傳播媒介工作者及所有關心年青一代的人認識青少年眞實的面貌。

·臻善文化事業公司出版·

科學常識問答

曹宏威編

問答是一種靈活的學習方法，它有助於訓練思考和記憶。在繁忙的社會裏，除了大規模的正規學習之外，這類輕騎出擊的學習方法，不可多得，頗值得推廣。

這本書收集的題目，大部分在一九八一年校際常識問答比賽中使用過，深淺適中，內容跟初學科學(中學和專上)的讀者的水平合拍，都是經過幾位老師精心選擬的。

這些題目有以下的特點：(一)問題盡量圍繞着香港中學課程接觸到的知識，從這個出發點去發問，使讀者心目中有一個底碼，進行推理，引導思索；(二)問題着意地去補充教科書疏於照顧到的新知，使讀者既溫故，也可探新；避免蹈落在一般複習問題乏味的覆轍上；(三)數、理、化、生、地五科的問題共列，發問的角度很有姿采，使讀者不會感到沉悶；(四)有些問題，是典型的速答題，作答不宜超過五秒鐘，讀者可藉此培養出一種解決問題的機靈應對的方法，放眼去捕捉門路，磨練出一套避免錯陷在死胡同的本領。

這本書的出版，對普及科學教育的工作，應當是有裨益的。





HK $16.00

Published and printed in Hong Kong.

「從1979年到1982年，我先後訪問了十五位知識分子。當我把這十五篇訪問記彙編出版時，我重讀一遍，不能不感到，它是我過去所出的書當中，最有價值也最有意義的一本。十五位知識分子，對中國都是如此關切和了[illegible]、不凡的[illegible]也不一定要同意每一位的見解，但他們以自己的學識和閱歷凝聚而成的智慧的語言，不少是值得我們深思的。」